

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八月出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资料



追忆平型关血战
战斗在狼牙山上
华中反攻的序幕战
——车桥之战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五十五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年·北京

责任编辑：汪新 刘昌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五十五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9

• ISBN 7-80023-869-5

I. 中… I. ①中 ②中…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史料 IV. 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5093 号

中共党史资料(第 55 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1929 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35 号

电话:(010)2581570 传真:(010)2581532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飞达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7.25 印张 150 千字

199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ISBN 7-80023-869-5/K · 799

定 价:5.50 元

目 录

回 忆 录

- 从“九一八”到“七七”…………… 温济泽(1)
- 毛主席关怀我们办抗大…………… 莫文骅(6)
- 追忆平型关血战…………… 孙 毅(18)
- 人民自卫军的诞生…………… 吕正操(26)
- 回忆抗战时期山东解放区的货币斗争…………… 杨 波(33)
- 工人干部在抗日烽火中锻炼成长
- 忆抗战时期党对工人干部的培养…………… 马洪等(40)
- 战斗在狼牙山上…………… 葛振林(49)
- 突破日军的“铁壁合围”…………… 曾思玉(57)
- 美军观察员多兰上尉在一次惊险的
- 地道战中…………… 高存信(68)
- 华中反攻的序幕战——车桥之战…………… 叶 飞(78)
- 用胜利迎接大反攻
- 记 1945 年冀中我军夏季攻势的
- 第二阶段作战…………… 李 健(86)
-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延安的学习
- 生活…………… 王兆相(95)
- 抗日烽火中的晋察冀妇女…………… 田秀涓(110)

1938年长沙抗战文化中的“三报六刊”…… 张生力(119)

专题资料

烽火摇篮育新人

- 记“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 黄金轩(130)
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 董福庆(138)
香港沦陷前的抗战文化运动…… 袁小伦(155)

人物介绍

伟大的反法西斯战士陶行知…… 周 毅(173)

会议介绍

1941年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

代表大会…… 袁武振 梁月兰(181)

大事记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外交活动

大事记…… 王 真(189)

史实考订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全面沦陷时间考…… 宋德玲(219)

小资料

救亡名曲《松花江上》的诞生与传播…… 宋新勇(227)

从“九一八”到“七七”

温 济 泽

九一八事变时，我 17 岁，正在上海读书。1931 年 9 月 18 日晚，日军制造柳条湖事件，旋即以此为借口悍然攻占沈阳。第二天，我们就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惊人的消息。接着，日军又占据本溪、安东、辽阳、营口、抚顺、长春等近 20 个重要城镇。此后仅 4 个月，日军即占领了我东三省大部分国土，3000 万同胞遭到残酷的蹂躏和野蛮的屠戮。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都是中国人啊！

当时中国东北驻军大部执行了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即便如此在日军进攻沈阳的当天夜里，仍有部分官兵和警察、公安部队违令奋起抵抗。此后，日军铁蹄所到之处，反抗侵略的义师如潮，烽火四起。几个月内，东北爱国军民组织起 30 多万抗日义勇军和其他形式的武装。张学良将军受着“不抵抗”命令的压力，也暗中从北平军分会批拨枪弹、现款、物资援助义勇军。中国人是不可侮的！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激起全国人民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各地各界纷纷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抗日。学生抗日运动的声势尤为浩大。规模最大的请愿是 1931 年 11 月 26 日那一次，上海、北平等地请愿学生约两万余人集中于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这次请愿，我也参加了。我们这些从各地来的学

生代表在国民政府大门外的广场上，我在前几排上海复旦大学学生的队伍中间，在凄风苦雨中站了一整夜，到第二天下午一点钟，蒋介石才出来接见。在激愤的群众面前，他敷衍地答应“三天之内出兵”。学生要求他写下字据以便带回去出示广大同学，他借口“回去写”就退走了。一会儿，送出一个“手谕”，以“对于诸生请愿，自可接受”，“望转告各同学，安心求学，拥护政府”等空言搪塞，只字不提出兵抗日。学生知道上当，到12月17日，又有两万多人集中到南京，这次不再是请愿，而是各地学生联合大示威。国民政府竟派军警开枪镇压，在南京珍珠港桥造成流血惨案。上海文生氏英文专科学校学生、共青团员杨桐恒当场牺牲，伤百余人。我亦是现场目击者之一。

日本帝国主义在强占我国东三省之后，为了转移国际视线，掩护它炮制“满洲国”，把我东北变成它独占殖民地的步骤，又在上海制造事端，于1932年1月28日晚，发动进攻，企图占领上海，这就是一二八事变。

当时驻在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和军长蔡廷锴的率领下，奋起抵抗。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在促使蒋介石认可后，也率部参加了作战。在我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下，日军屡战屡挫，伤亡惨重，被迫三易统帅，并不断增兵，使其侵略上海的兵力从数千人增加到六七万人。而我军人数不足四万人，要求增援，竟被蒋介石拒绝。这样，我军经过一个多月的浴血抗战，终因敌众我寡，被迫于3月1日撤退。国民政府从战争一开始就惊惶失措，开战两天后迁都洛阳，并暗中与日本妥协，经过谈判终于于5月5日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

在淞沪抗战期间，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热烈支援。各地各界参战的义勇军就有 5000 多人。其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众反日救国义勇军有 2000 多人，它的前方办事处设在十九路军前线指挥部的隔壁，在执行救护、运输、募捐、宣传、慰劳等任务中，同十九路军配合得很密切。全国同胞和海外侨胞捐助现款、食品、日用品、药物、器材等也非常踊跃，仅捐款一项，就达 700 多万元，而军政部欠发十九路军的军饷竟达 600 多万元，蒋光鼐将军曾感慨地说：“淞沪之役，我军得民众莫大之帮助，近者笔簞食壶浆，远者输财捐助，慰劳奖励，永不敢忘。”

淞沪抗战失败以后，群众抗日运动继续高涨。运动的中心内容是反对上海停战协定和继续援助东北义勇军。5 月，上海市各界成立民众反对停战协定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简称“民联”）。我这时是共青团复旦大学支部书记，被选为民联青年部部长。6 月，由上海市民联等 80 多个抗日团体联合成立全国和江苏全省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自由市代表大会筹备处，我又被选为筹备处的青年部部长。接着，筹备处又于同年的 7 月 17 日召开了民联的江苏省代表大会，但事机不密，当场被捕 88 人，我在其中。被捕后，经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押解到国民政府军政部军法司转南京警备司令部，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决，萧万才、曹顺标、邱文治等 13 个同志牺牲于雨花台，70 个同志被判处无期和有期徒刑，除两个女同志留在南京坐牢外，其余都被囚禁到苏州军人监狱。政治黑暗如此，爱国竟然有罪！

我们身陷囹圄，心系祖国命运，被锁在高墙囚室之

内，仍不时伺机买通看守，高价秘密地断断续续地买进报纸。这使我们零星地得知：1933年初，日军侵占热河和进犯长城各口，当地军民奋起抵抗；同年11月，福建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宣布反蒋抗日，不久失败；1935年，签订“何梅协定”，致使河北和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日本帝国主义又策动汉奸搞起“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使华北形势危急达到极点；在这种形势下，北平学生于12月9日爆发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我们得到这些消息，片片断断而不连续，隐隐约约而不清楚。狱中生活，浑如隔世。然而，我们的心却时刻系念着祖国的安危。

1937年8月，狱中仍是一片死寂，但监狱上空不断有作战飞机飞来飞去。我们开头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后来向看守打听，才知道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八一三事变中国军队在上海也同日本侵略军接火了。这时狱外带进信来，暗示我们“大哥二哥多年不睦，近已握手言和”我们猜想国共两党可能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了。

国共两党谈判的条件之一，是国民党释放全国政治犯。当时我们党的谈判代表是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同志。在达成协议之后，他们到南京监狱里看望过一些同志，这些同志当即释放了。其他同志也很快释放了。我们在苏州的，要晚一些。此时关在苏州军人监狱的政治犯约400人，是按刑期长短分批释放的。我的刑期较长，在8月30日第三批释放。5年多不曾呼吸新鲜的空气，没有见到明亮的阳光，一朝除去脚镣，走出囚笼，还感到不大适应，但毕竟获得自由了，顿觉心花怒放。

上海一带正在炮火纷飞，交通受阻，我和另一位出狱的同志克服种种困难，绕道嘉兴，回到上海。我找到了半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很快同江苏省委取得联系。当时党的组织正在恢复中，省委决定我留在上海，同省委单线联系，负责党内文件和党刊的发行工作。11月初，上海将沦陷，省委为做好准备，决定只留下少部分同志隐蔽起来，把多数同志分散到上海以外去开展工作。

当时我的叔父温崇信在昆山，后又到太仓当县长，因支援八一三抗战有功，被调往安徽六安，任安徽省第三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李宗仁先生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时，省政府迁到六安。党便利用这个关系，派我到叔父那里参加抗敌后援会的工作。其后，我在六安参加创办了抗战训练班，招收当地男女中学生 100 多人，接受抗战的政治和军事训练。当时，当地的党组织还没有恢复，我就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同志联系，训练班用的政治形势、游击战争、战地服务、战时救护等教材，也都是董必武同志寄给我的。当时年轻学员的那股抗战热情，两党合作和全民团结抗战的那火热的局面，今天想起来仍令人兴奋。1938 年 2 月，李宗仁先生去职，我的叔父也去职往重庆北碚复旦大学教书（他原是复旦大学教授），我则直奔革命圣地延安，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火热的敌后抗战中去。

值此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我回忆这段经历，是想敬告同胞，特别是青年和后人，永远毋忘从“九一八”到“七七”这段屈辱和悲壮相交织的历史。

毛主席关怀我们办抗大

莫文骅

抗大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倡导和主持创办的一所专门为抗日战争储存、培养、输送军政干部的学府，是革命的大熔炉。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抗大创办 9 年，由最初的数百人，直至发展成为拥有 12 所分校，数万名学员先后为各个抗日根据地输送了 10 万余优秀儿女，他们中既有能征善战、统领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也有战斗在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基层干部。在抗大创办初期，我先后担任过校党总支副书记、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当时学校的领导人，于今在世的仅剩我一人了，我有责任将这一段历史写出来，藉以深切地纪念那些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中建立了功勋，血洒疆场的热血青年和抗大学员们！

毛主席的战略眼光

1936 年，是一个非凡的年代。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苏维埃根据地，刚刚立足。日本侵略者占领我东三省后又把魔爪伸向了华北，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全国人民把期盼的目光聚焦到了陕北，把拯救中华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党中央、毛主席没有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早就把

这一历史的重任担在了自己的肩上。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预见到抗日高潮来临，将需要大批的干部去领导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5月14日，毛主席在黄河西崖的大相寺主持召开了一个会，决定成立红军大学。毛主席将她定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当时，战事频繁，前线很需要干部，一些领导同志舍不得送干部去学习。会上，毛主席亲自做工作，说服一些领导同志，为了抗日，把眼光放远一点，送优秀干部到红军大学去学习。

6月1日，陕北瓦窑堡旧庙堂前红旗招展，歌声嘹亮。数十名优秀的红军干部会聚在这里，举行“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会场布置得庄严简朴，庙墙上贴着红绿标语。临时搭起的一个土台上，悬挂着红布横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学校的几位负责人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开门见山地说：我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了促进和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学校创建初始分3个科，第一科大都是红军师以上干部，有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陈光、张爱萍、彭雪枫、陈士榘、杨成武、谭政、周建屏、彭加伦、王平、耿飏、刘惠农、边章武、许建国、苏振华、张纯清、张树才、张经武、张达志、宋裕和、赵尔陆、贺晋年、郭述申、黄永胜、谭冠三、张文彬、杨立三、邓富连、刘鹏、吴富善、罗

保连、贾力夫、符竹庭、童小鹏、肖之玖，还有朝鲜的武亭和越南的洪水同志。我原是西北红军大学的政治部主任，经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杨尚昆同志批准，也成为第一科学员。学校由毛主席兼任政治委员。其他职务均由学员担任，林彪为校长，罗瑞卿为教育长，我任校党总支书记，当时不设政治部，就由校党总支书记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1937年1月的一天，毛主席找林彪、刘亚楼和我3人去谈话，要我们到延安办“抗大”二期。我们2月到达延安后不久，学校即更名为“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林彪任校长，刘亚楼任教育长，我任政治主任，后改为政治部，傅钟任主任，我任副主任（傅钟到前方后，我任主任）。学员中四方面军的多一点，也有红一方面军和二方面军的干部。有陈赓、杨得志、余秋里、姬鹏飞、许世友、胡耀邦、倪志亮、王维舟、王建安、陈再道、洪学智、詹才芳等；女干部有贺子珍、康克清、蹇先润、蹇先佛、李坚贞等。还有一些国民党军队系统的高级将领，大都是杨虎城和张学良将军部队里的进步军官，他们化名来学习。也有一些来自国民党将领的家庭，如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国民党师长赵寿山的儿子赵元介、女儿赵元炳。但大量的是满怀抗日救亡激情的热血青年，他们中有来自平津和东北沦陷区的青年学生，有东南亚新加坡等地穿着翻领西服、旗袍、高跟鞋来到延安的华侨青年。这些进步青年三三两两，男男女女，背着行李，掂着小包，日夜不停地投奔延安。从西安到延安有800里路，路上有国民党的严密封锁，荒山野岭常有豺狼、狐狸出没和嚎叫，无数青年靠两只脚星夜赶路，有的要走半个多月，

到延安时，脚肿得连鞋都脱不下来，那种情景是非常感人的。

抗大就像一颗在沉沉黑夜里闪耀的北斗星，把大批的革命青年、抗日志士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异国他乡召唤到黄河之滨、宝塔山下。

在战争环境里，创办这么一所大规模的学校，抽调这么多高级将领来学习，充分证明毛主席具有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和革命家的宏才大略。他深知，在革命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我们党和军队的任务、策略、斗争方式及工作方法都将有所改变并复杂起来，这就需要干部重新学习并掌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主动地适应这种战略转弯。更需要吸收大批新的干部，增加新的血液。

毛主席给我们当“教授”

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为我们抗大的创办倾注了满腔心血，给予了极大的关怀。抗大创办初期，主要课程都由中央领导同志担任。毛泽东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凯丰和吴亮平讲政治经济学；秦邦宪讲授联共（布）党史和辩证唯物主义；杨尚昆讲授各国论；李维汉讲授党的建设等。苏联顾问李德也给我们讲过课，主要是讲兵团战术。为了帮我们在时局转换的关头转弯子，毛主席也殚精竭虑，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备课。给我们讲政治形势、党的政策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的演讲既高瞻远瞩，又细致入微，针对性强，分析问题精辟入理。

毛主席这些大“教授”非常平易近人，他们来讲课，既不兴师动众，也不戒备森严。有一次，他和张闻天、秦邦宪、徐特立等同志来到我们一科驻地。当毛主席等领导同志走进教室时，大家站起来热烈鼓掌，毛主席微笑着摆摆手，让我们坐下。他先介绍了跟随他来的几位领导同志，然后说：“我今天帮你们请来几位教员，有洋的，也有土的，我就是土的一个。”当介绍到徐特立时，说：“他不仅是你们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接着，他说：“我们前一段时间，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孙悟空会腾云驾雾，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我们不会腾云驾雾，也走了两万五千里。要是会腾云驾雾，就不晓得会走到哪里去了。现在，我们红军从过去几十万减为两万多人，要不是刘志丹帮我们安排好这个落脚点，我们不知要到哪里去呢！反正我不到外国去。中国的地方大得很，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还有北方。当前，党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把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就是要逼蒋介石走抗日的道路。”

在我们第一期学员即将毕业时，西安事变发生了！消息传来，我们欣喜若狂。

事隔几天，中央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对这一决定，我们有些人在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觉得蒋介石杀了我们那么多人，又一向奸诈刁滑，不能轻易放虎归山。

为了把学员和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上来，12月26日，即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第二天，毛主席又亲自来红大，给学员和中央机关干部作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他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杀了蒋介石

石,会使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何况杀了一个蒋介石,还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蒋介石。诸葛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我们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他风趣地说:陕北毛驴很多,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用对付赶毛驴上山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这就是我们党“逼蒋抗日”的方针。

我们听了毛主席的报告,茅塞顿开,思想豁然开朗。

后来在抗大毛主席又给我们讲了《实践论》、《矛盾论》和《论持久战》,使我们受益匪浅。

毛主席的办校作风

抗大是毛主席亲手**创办起来的,也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成长壮大起来的。毛主席办学校有一套独特的作风。他既总揽全局,又放手让学校干部大胆工作。抗大刚开办时,他兼学校政治委员,后来又兼任抗大的教育委员会主任,但一些具体工作都由学校干部去做。抗大刚开办时,他让我们几个学员担任学校领导工作,这在我军和世界教育史上是从没有过的。**

在办学中,毛主席注重抓干部,特别注重干部的培养和使用。抗大的一些主要领导都是毛主席亲自挑选并任命的。1937年5月,胡耀邦同志到我们抗大学习,并任一队支部书记。有一次,我陪毛主席参加他们的支部大会,坐在边边上,胡耀邦那时才22岁,朝气蓬勃,说话很有条理,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毛主席问我这么小的同志是谁?我说是胡耀邦,是一队的支部书记,从这时起,毛主席

记住了胡耀邦同志。那时，抗大校长林彪到前方，罗瑞卿教育长和我俩具体负责抗大的工作。我还兼政工作课，工作很忙，想找个人来分担一点我的工作。过了两个月，我提出让胡耀邦同志任副主任兼总党支部书记。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罗瑞卿同志，请他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对胡耀邦同志印象不错，很快就批下来了。

毛主席很重视学员的作风培养，特别是艰苦奋斗作风的锻炼和培养。他常对我们说，学员的作风培养好了，到部队后就是一面象样的旗帜。

1936年7月，国民党军高双城部偷袭瓦窑堡后，学校还一度迁到了保安县（今志丹县）办学。保安，是陕北的一个偏僻小县。四面群山环绕，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物产匮乏。是一个“破庙比房多，菩萨比人多”的穷山窝。保安城外的山坡上稀稀拉拉长着几丛酸枣，石壁上露出几十个黑黢黢的洞口，远远望去，好象蜂窝似的。这些石洞，是哪个朝代开凿的，已无从考证，据说是供奉“元始天尊”的。长期没人居住，有的做过羊圈，有的是兔窟狼窝。这些乱石纵横、狼藉不堪的石洞，就是我们的校舍。

我们的教室选在一个最大的石洞里。它原是一个羊圈。我们把羊粪、杂草清除掉，打扫干净，用石灰水把洞壁刷白，在石壁上凿出一块大石板，用石头砌成了一个挺象样的讲台。在洞口，我们用石块垒成墙和门，用茅草编成厚厚的草门帘，平整了场地和道路。这样，一座以石洞为教室，以石壁为黑板，以石头为桌凳和讲台的大学课堂建成了。这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学课堂。

我们住的也是石洞，睡的是石头砌成的床铺。

生活虽然艰苦,但我们学习却很用功。除了听课,就是自学或讨论。石洞里很暗,我们便在外面看书,看书累了,就眼望蓝天游云,漫谈讨论。一次,有个同学对“货币”半懂不懂的。他想到有个同学借了他的钱,便跟大家说:“谁借了我的货币?”大伙笑了起来,也引起了一番争论,最后总算把“货币”弄懂了。徐特立先生给我们讲新文字(即汉语拼音),我们很感兴趣。我和彭雪枫、张爱萍等同学商量好用新文字通信。通了几次,问题就来了,原来我们用的都是方言,难以沟通。每天晚上,我们坐在石凳上,捧着书本,俯首石桌,在油灯和烛光下,啃得津津有味。大家总是把配给的油点光、蜡燃尽,才肯上床睡觉。

毛主席对我们这种一面学习,一面生产,艰苦奋斗的作风非常赞赏。一天,毛主席讲话,诙谐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这既是对我们的表扬,也是对我们的鼓励。从抗大开始,我们就把毛主席倡导的“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作为一种优良作风继承下来。

1937年3月,毛主席为抗大同学会成立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并把它作为抗大的教育方针规定下来,这是对抗大艰苦奋斗作风的又一次肯定。

毛主席身体力行,对学员关怀备至。在抗大时,我们学习很刻苦,星期天也不休息,毛主席知道后,特地派杨尚昆同志来传达指示,要我们注意劳逸结合,爱护身体,并硬性规定我们星期天不得呆在宿舍。

毛主席还多次为抗大题词,或者亲自给学员复信,勉励抗大的学员们。红军时期我们管军人俱乐部叫“列宁室”,抗日战争爆发后,抗大九队的学员将列宁室改为“救亡室”。毛主席得知后,亲笔给九队的学员写信:“九队的同志们:庆祝你们成立了救亡室,救亡二字就是你们及全国人民现阶段上的唯一总目标。达到这个目标的道路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你们学习这个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方法。唯有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救亡的目的。”有的学员碰到一些难题,不好解决,也直接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总是在百忙中给予答复。有一个同学因入党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给毛主席去信,毛主席给回了信,并要他拿着信去找组织解决问题。还有个叫于江的学员,也是碰到了难题,找到了毛主席,毛主席为其题词:“碰了钉子时,就向钉子学习,问题就解决了。”后来这个学员牺牲了,为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毛主席这种平易的工作作风,为抗大干部和学员作出了榜样。

毛主席倡导的抗大校风

抗大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校风,这就是毛主席倡导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1937年4月的一天,林彪从毛主席那里回来,给了我这8个字,字不大,是毛主席亲笔写的。我叫政治部的同志用红布把这8个字放大,剪了贴在校门口。从此,这8个字就成了我们抗大的校风。

在抗大,学员和干部不论来自何方,大家团结在抗日

的旗帜下,关系非常的融洽。一日生活也非常的紧张有序。抗大的校规也是很严格的。有的事情,毛主席亲自管。抗大来了很多男女青年,为了让大家集中学习,我曾向主席建议,学习期间不许谈恋爱,不许结婚。毛主席同意了。我们还专门发了一个通知。可是不多久,一位校领导和一个女生结了婚。当时,毛主席知道了,火了,要撤他的职,给他处分。我写信给毛主席,为他讲情,请主席“收回成命”。主席叫我去,把我训了一顿,说:“不许谈恋爱,不许结婚是你提出来的,现在讲情的又是你,都是你。我只好当面作检讨。”再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黄克功,他原是个团政委,六队队长,是个很不错的干部。有个女生与他谈恋爱,黄提出要与她结婚,女的不干,黄火了,拔出手枪把这个女生打死了。按照党纪和边区的法律应该枪毙他。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为他求情,主席不同意,亲自给雷回了一封信。罗瑞卿也找主席讲情,被主席狠狠训了一顿。后来还是将黄枪毙了。起初,一些女生是很痛恨黄克功的,但看到处理得这么重,反而同情黄了,有的女生都哭了。还有个叫吉司恭的,几个女青年在西安要去延安入抗大,没有门路,碰到了他。他说他是抗大的政治部主任,是来西安招生的。她们以为碰到了救星。有几个女青年被他哄骗奸污了。他知道闯了祸,跑到陕北公学上学去了。这几个女青年后来还是到延安入了抗大。当时抗大的政治部主任是我,她们以为换了人。一个星期天在延河散步时,她们无意中发现了西安的那个“政治部主任”是冒充的,就揭发出来,经法院公审枪毙了,我是陪审员之一。可见,抗大的纪律是非常严肃的。

抗大是革命的熔炉，也是青年人的天地。因此，课外生活非常的轻松活泼，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为了活跃文化生活，强调领导带头。有一次，为了欢迎朱总司令从四方面军回来，我们赶排了一个文艺节目，由罗瑞卿、张爱萍、宋裕和等同志自编自演。原来让高个子耿飏同志饰蒋介石，他执意不肯。罗瑞卿同志长的也比较高瘦，后改由他演蒋介石，演的还挺象。剧中还有一个小脚老太婆，由宋裕和同志扮演。当他穿上借来的老太婆衣服，认真地用脚后跟一拐一拐地学小脚老太婆走路时，惟妙惟肖，台下的观众连眼泪都笑出来了。除了文化娱乐外，我们还修了篮球场，在球场上埋下4根柱子，钉上几块木板，找两个桶箍代替球筐。尽管简陋，但玩的很开心。在抗大时，朱总司令打球的兴致特别高，休息时经常找我们打篮球。他一般是打前卫，我打后卫。我们看他年纪大，就有意让着他点，他带球跑几步，裁判也不吹哨，这样他觉得我们是另眼相看，嫌和我们玩的不过瘾。于是便和女同学一起打球。女同学可不管这些了，有时推他几下，撞他几下，还常常盖他的“帽”，朱总司令不但不生气，反而乐呵呵的，因此，女同学们都管他叫“老外婆”。我们还有一个自建的网球场，国际友人斯诺和马海德都曾来我们抗大打过网球。

在延安，最有名气的还是抗大的歌声。每天早晨，在延水河畔，在宝塔山下，都能听到抗大学员那高亢嘹亮的歌声。每次集会各学员队都互相拉歌，《大路歌》、《毕业歌》响彻云霄。特别是凯丰作词，吕骥作曲的《抗大校歌》，尤其有感召力。一批批优秀的中华儿女，一批批的热血青

年,正是唱着这首歌,奔向敌后,奔向前方,奔向了抗日的战场。

(冷博军 整理)

追忆平型关血战

孙 毅

1937年8月25日,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下达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下辖一一五、一二〇和一二九师。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主任罗荣桓。该师下辖三四三旅和三四四旅。我被任命为三四三旅参谋长,旅长陈光,政委周建屏。

未待改编就绪,一一五师即分作两个梯队,离开陕西三原地区,渡过黄河,奔赴抗日前线。由于正、副师长去参加洛川会议,第一梯队由陈光率领,所带部队为三四三旅和独立团;第二梯队由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率领,所带部队为三四三旅直属队和三四四旅。我在第二梯队,同三四三旅直属队一起行动。

洛川会议结束后,聂荣臻在侯马赶上了我们第二梯队,这时得知日军正兵分两路向太原推进,20余万蒋阎军节节败退。干部战士听到这个消息,一个个义愤填膺,恨不得插上双翅飞到前线。我们乘火车到达原平后,为了不让国民党军队的溃兵影响我军的行军速度和士气,改变了原定经代县沿大路向平型关的行军路线,绕向五台的山间小路前进。

9月22日,日军第五师团一部,进占平型关以北东跑

池地区。23日，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一五师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的日军。

我们第二梯队于23日到达上寨地区，先期到达的师长林彪等人刚刚看地形回来，在师部院子里，林彪和聂荣臻进行了交谈。林彪说，日军大队人马正向平型关方向运动，可以考虑利用这里的险要地形打一仗。接着，他摊开地图，同作战科长王秉璋、侦察科长苏静把平型关周围的地形和初步的作战设想作了说明，征求聂荣臻的意见。聂荣臻听后，果断地说：“打！为什么不打呢？利用这么好的地形，居高临下，伏击气焰骄纵的敌人，这是很便宜的事嘛。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在与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次交锋中，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给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一个振奋！”在平型关侧翼山地打一个大仗的部署就这样定了下来，并当即电告了八路军总部。

当天，全师连以上干部会在距平型关东南10公里的上寨小学召开，林彪、聂荣臻到会讲话，布置战斗任务。因师参谋长周昆未到职，我这时仍留在师部，聂荣臻对我说：“老孙，周昆到现在还不来，你不能走，你走了就没人了。”我说：“副师长，你放心开会去吧，我不走，我在家值班。”他们走后，我在家守电话，处理事情，并具体负责师直属队的工作，遂行师参谋长的职能。

会议结束后，一一五师主力连夜赶往平型关东南15公里的冉庄待命。

我从师部文件中看到了以下战斗部署：三四三旅两个团为主攻，三四四旅一个团断敌后路，一个团作师预备队。攻击部队全部在平型关东南山地设伏。同时，派出独

立团、骑兵营向灵丘方向活动，牵制日军，保障主力翼侧安全。

24日，林彪、聂荣臻又组织营以上干部进行了现场勘察。傍晚，师部接到阎锡山部队送来的一份作战计划，说由他们担任平型关正面的出击。

当晚，天降大雨，我同林彪、聂荣臻分别住在老乡家。睡觉前，林彪、聂荣臻根据侦察员得到的情报，叫我通知部队：今夜12时出发，天明前进入埋伏阵地。并强调：“暴露与否，是胜败关键。”我立即交待参谋电话通知，直到通知完毕我才回房休息。

睡到后半夜，外面的风雨声将我惊醒。我想着部队是否已经出发，出发后是否遇到了困难，是否已经进入埋伏阵地，想着想着，怎么也睡不着了。鸡叫时，我坐起来穿好衣服，轻轻来到林彪、聂荣臻住的房前，推开门一看，林彪的铺位空着，被子已经叠了起来，再朝里一看，煤油灯还亮着，林彪正戴着健脑器坐在桌前看地图呢。我轻轻走上前，小声说：“师长，你起得这么早？”林彪打了一个哈欠，又看了地图一眼说：“要熟悉地图，了解地形地物，才能指挥好。”聂荣臻听到我们说话，也匆匆起了床，对林彪说：“你看了这么久，该熟悉了。你到炕上睡一会儿，有什么事情我来处理。”林彪看看手表说：“时间不早了，不睡了。”

天亮了，雨也停了，雨后的山村显得宁静，清爽。早饭后，我们立即出发去师指挥所，一开门，一股凉风吹来，林彪打了一个冷战，警卫急忙拿来一件雨衣给他披上。

师指挥所和三四三旅指挥所在一起，位置选择在平型关东南方向石灰沟南山头一个小山顶上，那里长着几

棵树，站在山顶，用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沟底那条公路。我拿起望远镜向远处望去，但见群山之上，蜿蜒着古老雄伟的内长城，平型关座落在群山之间。这一带山势不高，但是山连山，峰接峰，利于部队隐蔽。从平型关山口至灵丘县东河南镇，有一条由东北向西南伸展的狭窄沟道，沟道两侧，是刀削似的危岩绝壁，再上面是比较平缓的沟岸。这时沟底空无一人，两侧的山崖上，凋零的树木在秋风里瑟瑟发抖，枯黄的草丛上，雨珠闪着寒光。

在十里长沟的东南山上，左面埋伏的是杨得志、陈正湘率领的六八五团，右面埋伏的是李天佑、杨勇率领的六八六团。徐海东的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奉命隐蔽地穿过沟道通路，占领了东河南镇以北的高地，以便切断敌人后路。六八八团作为师预备队暂未进入战地。杨成武的独立团和刘云彪的骑兵营已分别向平型关东北和以东开进，配合主力作战。

战前的十几分钟，林彪和聂荣臻对前来受领任务的六八五团团长江得志和六八六团团长江天佑讲明敌情和战场注意事项。两个团的指挥员便疾速地返回阵地。

上午7时前，鬼子来了。只见右前方先是出现一个小红点，慢慢地向前移动，后面黑压压一片，还能听见轰隆隆的马达响声。这是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的辎重和后卫部队。小红点越来越近，用肉眼也能看得清清楚楚。为首的高举着一面太阳旗，接着是三路纵队的鬼子，往后是载着日本兵和军用物资的100多辆汽车，200多辆骡马大车拉着九二式步兵炮、炮弹和给养跟随其后，压阵的是骑着大洋马的骑兵。日本兵脚穿皮鞋，头戴钢盔，身

穿黄呢大衣，晃晃荡荡，不可一世地走着。

伏击部队的报告同时汇集到师指挥所：敌军已经全部进入伏击圈。这时林彪喊：“发信号弹！”“砰，砰，砰！”三颗红色信号弹升上天空。顿时，沉默的群山怒吼了！满贮深仇大恨的枪弹和迫击炮弹带着啸音飞向敌群，手榴弹雨点般地飞进沟道，炸得日本侵略军鬼哭狼嚎，血肉横飞。日军汽车撞汽车，人挤人，马狂奔，指挥系统一下子就被打乱了。

当聂荣臻发现日军正利用汽车作掩护，进行顽抗，并组织兵力抢占有利地形时，连忙跟林彪研究，决定把敌军切成几段，分段吃掉它。随即命令部队出击，杀入敌阵地，并指令六八六团团团长李天佑派出一个营，冲过公路，抢占在设伏前因怕暴露目标而来不及占领的老爷庙制高点，以便两面夹击敌人。

山谷间骤然响起激昂的冲锋号声和惊雷般的冲杀声。八路军勇士呐喊着向敌人扑去，同敌人展开了白刃肉搏战。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我透过望远镜看见那群经过武士道训练的日军虽然失去指挥，被分隔开来，仍然利用汽车和沟坎，进行顽抗。八路军官兵前仆后继，以更加猛烈的攻势对付顽固到极点的敌人，只见枪托飞舞，马刀闪光，连伤员也与敌军官兵扭打在一起，互相用牙齿咬，用拳头打。六八六团副团长杨勇在激战中负了伤，仍继续指挥部队作战。六八五团一连连长曾贤生，带领战士们冲入敌群，在肉搏中壮烈牺牲。

战斗进行到大约8点多钟，林彪对聂荣臻说：“老聂，你亲自出马好不好？”聂荣臻回答：“好啊！”林彪说：“你到

六八五团去，督促他们把这一仗打好。”聂荣臻站起来说：“好吧，我现在就去。”说完，他拄了一根棍子，带了一个参谋，一个警卫员和一个通信员，大步朝山下六八五团阵地走去。聂荣臻走后不久，为了安全，林彪立即转移到附近山沟隐蔽指挥。在隐蔽部里，就我和林彪两个人，他守着电话，随时询问部队情况，我同他面对面坐着，不时地聊点别的闲话。

鬼子拼命地争夺老爷庙制高点。几架敌机在上空盘旋。由于敌我双方距离很近，敌机不敢扔炸弹。经过一番激战，老爷庙制高点等有利地形全被我军占领。

中午时分，被堵截在辛庄、老爷庙、小寨村一线山谷中的 1000 多名日军全部被歼灭。缴获敌人步枪 1000 余支，机枪 20 多挺，击毁汽车 100 多辆，马车 200 多辆。板垣组织的增援部队被独立团和骑兵营阻击在灵丘以北和以东地区。独立团还在灵丘与涞源之间的腰站，击毙了增援的日军 300 多名。林彪和聂荣臻遂令部分部队打扫战场，其余部队乘胜向东跑池之敌发起攻击。由于国民党军未按预定作战计划出击，致使东跑池的日军由团城口突围。

下午 2 时许，林彪说：“孙毅，辛苦你一趟，到山下电台去，给八路军总部并延安的毛主席发个电报，除报告目前战果外，告知我部队仍在积极围歼中。”我说：“好，我马上就去！”我走出隐蔽部，随后拿起一根棍子准备出发。林彪说：“你同聂荣臻一样，也爱拿根棍子。”我说：“我是从长征开始拿的。”林彪好奇地问：“长征到现在拿几根了？”我说：“至少有七八根了。有根棍，上山下山，等于增加了一条腿。”

我沿着下山的羊肠小道，一路小跑，心里打着腹稿，大约半个小时就到了隐蔽在山下土地庙里的电台，我将心中拟好的电稿很快写在纸上，大约有 150 多个字，交给译电员，叫他立即发给八路军总部并报延安的毛主席。我坐下等着，直到对方回电已收到电报时，我才往回返。电报发出后，完成了一项任务，心里轻松了许多。这时才感到身体有点累，用了近 50 分钟才回到师指挥所。

这时已是下午 5 点多钟了，沟中的战斗早已结束，只有远处还不时地传来枪声。尽管这时我已经很累，但我急于想了解一下战场情况。便拄着一根棍子，带了两名参谋下到沟底，只见战后的十里长沟，日军人仰马翻，尸体狼藉。燃烧的汽车，遗弃的武器，散落的文件、作战地图、写有“武运长久”的日本军旗及各种罐头食品，满地皆是。我军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牺牲了几百个同志。当我看到有不少是经过长征过来的老同志牺牲在战场上时，心中十分难过。

当天晚上，我和林彪、聂荣臻住在距平型关几里路的一个小山村，这个村子只有三四户人家，我们进房时已是晚上 9 点多钟了。因房子少，我和林彪、聂荣臻睡在一个土炕上。林彪说：“今天打了胜仗，精神好，睡不着觉。”聂荣臻说：“是啊，我也睡不着。”聂荣臻还说：“日本鬼子搞武士道精神，死不投降，我们要研究如何对付他。”林彪说：“我原来还想多抓些俘虏，结果一个也没有抓到。”我说：“敌人不了解我们的俘虏政策，而我们的战士却还像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待白军一样对待鬼子，结果吃了不少亏。”就这样，我们聊着，不知不觉鸡就叫了，谁也没有

睡好，只是在天亮前迷糊了一会儿。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的第一仗，也是中国人民抗战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这一仗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和信心。战斗结束后，师参谋长周昆来了，我向他简单交接了一下，就打算到旅里去。聂荣臻对我说：“老孙，你再呆两天。”两天后，接到命令，原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大队长陈士榘同我对调，他担任了三四三旅参谋长，我担任了师教导大队大队长。不久，根据师里指示，我带教导大队 1000 多人，深入到阜平、平山、行唐等地，进行扩兵、筹款和做群众工作。

(全玉林 整理)

人民自卫军的诞生

吕正操

七七事变爆发后，东北军五十三军六九一团正在石家庄驻防。当时，团内党的组织发展很快，已经基本上掌握了这支部队。关于开战后，六九一团的行动问题，北方局曾指示：国民党军队肯定会很快溃退，你们就留在敌后找地方党，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此后，我们就坚决遵照党的指示行动。

五十三军先是开到任丘东北大苟各庄，后到永定河畔的曹家务。当永定河防线被突破后，我们整队沿河堤向南撤退。10月9日，在束鹿东南耽庄村，我接到师部的命令，要我团开往藁城南四德村，梅花镇一带，掩护五十三军的左侧，与六十七军取得联络。于是，我团即按行军序列，向指定地点急进。

10月10日下午，我团先头部队，将进抵半壁店时，突然发现敌人骑兵，约五六十名。敌人的骑兵也发现了我们的队伍，并有占领村庄的企图。我先头的尖兵连长非常果断，即令尖兵排以极快的速度，跑步抢占村庄，其余两部由村之两端取包围形势，进攻敌骑。双方激战约一小时，敌人的骑兵难于支持，便向沧石路狼狈逃窜。这次战斗，毙敌少尉队长一名，士兵八九名，战马八九匹；伤敌十余名；缴获马枪二支，战刀四把，洋马鞍五付等军用品。

半壁店袭击敌骑，这是从七七事变以来永定河之战后我团的第二次对日作战。这次战斗结束以后，我们继续向师指定的地点急速前进。当晚，我团第一营进入梅花镇，第三营进入四德村。梅花镇是一个土围子，方圆有四里，土围子高丈余，很坚固。一营进镇以后，即将四门堵塞，第一连防守镇的东西和北面；第二连防守西面和南面。

这天夜里十点多钟，约有一营兵力的敌人，由藁城向南推进，其先头部队，与我西关步哨发生战斗。其后续部队渐次到达，拂晓前即向镇西北角猛烈攻击。我守城部队与敌发生激烈战斗。敌攻城部队因伤亡过重，遂向我左翼包围，终因我以猛烈炮火压制，未能得逞。我炮兵瞄准发射，将敌人密集部队歼灭二三百名。经过激战，敌人被我大部歼灭。次日，敌人援军陆续增加，将我一营团团包围，但始终没有突破一营的防守。梅花镇的群众，对我一营热情支援、争先慰劳。我一营官兵也誓与阵地共存亡。这时，五十三军已经跑得很远了。师长周福成和旅长丛兆麟分别打来电报，叫我们丢下一营不管，带三营追他们。我坚决不同意，便派三营七连，在团属重迫击炮掩护下，冲破围攻东门的敌军阵地，接应一营突围。此时已近黄昏。

这次战斗，敌人伤亡七八百名，而我团员阵亡一名连长，一名班长，20余名战士。全团指战员，因为半壁店袭击敌骑成功和这一次守卫战获胜的鼓舞，战斗情绪高昂，加之党员积极分子深知守住阵地才能早日回师北上，所以能在敌军强攻下，英勇顽强，激战竟日。这是我团自七七事变以来进行的第三次并夺得胜利的战斗。

第一营突围后，部队靠拢在一起。这时，沙克找我来了。我正在战壕里，手里拿着两份电报，观察战场上的情况变化。我对他说：“五十三军跑远了，把我们丢给了敌人。”沙克皱着眉头，一时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我说：“这正是机会，就此脱离他们，北上找党，打游击去！”

当晚八点钟，在四德村集合部队。我把营、连长召集在一间大房子里商议今后行动。我说：“我团的处境大家清楚。今天师长和旅长都来了电报，让我们丢下一营去赶他们。各位请想一想，一营是我们患难与共的弟兄，难道我们能丢下他们不管吗？”我说到这里，把电报放在桌子上给大家看。

大家一听说师长和旅长要丢弃一营，都非常气愤，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太狠毒了，再不能跟着他们跑下去！”特别是一营的军官，更是火冒三丈，一个个连声叫骂，一些参加“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的连长更是磨拳擦掌，争先恐后地站起来，激昂地说：

“再不能跟他们往南逃跑了，应该趁机北上抗日！”

“我们服从团长指挥，请下命令吧！”

“对，团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

敌人攻打梅花镇的枪炮声还在响着，我看着大家激动的面孔，斩钉截铁地说：“现在师主力已跑远，如果我们要去追赶他们，一路上困难重重，而且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依我之见，摆脱当前之敌，到晋县东北地区去。至于以后如何行动，我们到那里再商量。”

经过分析形势，大家都同意立即回师北上，认为我们

对这一带以北地区熟悉，地方党的关系也比较好找，不能再往南去。我们便在地图上选定北去晋县小樵镇，想在那里进行休整。

大家相继散去之后，几个党员留下来又在一起研究，决定通过“东抗”发动和掌握群众，准备到小樵镇后再召开有士兵代表参加的会议，讨论北上打游击的行动计划。部队于晚九时准时出发，当夜开往晋县小樵镇。

小樵镇，当地习惯把它叫“小里小”，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村镇，一两千户人家，有一些店铺，也还富裕。但由于兵荒马乱，街面十分冷落。

我们在小樵镇休息了三天，对外严密封锁消息，只准进人，不准出人。我们连夜召开了党的会议，讨论部队整编和北上行动计划。并在一所小学校的大教室里，召开了有士兵代表参加的官兵代表会议。每个连选两个代表。最先到的代表，多数是“东抗”队员。

人们陆续走进一间明亮的课堂，怀着激动，肃穆的心情，屏着气息，静静地等待会议开始。当人到齐以后，我走到大家面前，根据党的指示精神，主持会议。我说：“今天不是普通的会议，而是商讨决定我们大家的前途命运。近来时局变化很快，还不到半个月，日本侵略军就占领了华北大片土地，可是中央军还是一味撤退。如果我们继续跟着跑下去，不但打不了日本，而且还有断送部队的危险。我们每一个爱国军人，都负有保卫国土，收复失地的责任。”接着，我讲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的悲惨遭遇和我在西安看到红军的情形，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我最后说：“五十三军既然把我们甩下，不要我们了，形势已经

不允许我们有任何别的选择，面前只有一条路：回师北上，像红军那样，到敌后打游击去。不知大家的意见怎么样？”

我的讲话，像是在干柴上加了一把烈火。这时，只见一个“东抗”队员站起来说：“国民党不抗日，跟着它干什么？大家想想，在任丘大清河，在永清永定河，挖了两次工事，结果怎么样？撤下来了。在梅花镇这一仗，也还是消灭杂牌军的圈套。想起牺牲的那些弟兄，真寒心！”

我刚讲完，坐在角落里的一个连长说：“回师北上，我看值得三思。敌众我寡，岂能站得住脚？再说，脱离主力，吃穿又从哪里来？”军械长立即站起来，驳斥说：“只要不糟蹋百姓，狠狠地打鬼子，老百姓绝不会让我们饿肚子。”

另一个连长出来插话：“我看还是慎重为宜，万不可草率从事。北上打游击，请问咱们哪个打过游击？”

又一个连长站起来，紧握着拳头高声喊：“这话不对！我们有不少人在西安训练班向红军学过游击战术，也不能算完全外行。我代表全连士兵拥护北上！”

这时，有人四下观望，有人低头吸烟，也有人急得直跺脚。一直没有发言的士兵代表，听有人反对北上，争先恐后地开了口：

“天天唱打回老家去，往南跑干什么？”

“宁愿北走一千，不愿南下一竿！”

“愿当亡国奴的让他们自己走，我们要北上！”

“对呀，让他们自己跟着国民党的屁股跑吧！”许多人同声喊着这句话。

人们叫喊着，挥动着手臂，围着反对北上的军官质

问,激昂慷慨。可以鲜明地感觉到,回师北上抗日的气势,就像一股洪流,是不可阻挡的。主张南下的人坐在一角,低着头,吸着烟,脸上一红一白。眼看着大局已定,我便趁热打铁,站起来宣布:“根据大家的意见,全团立即回师北上!”“我的话音刚落,会场上掌声齐鸣,群情沸腾。我挥挥手,让大家静一静,说:“从今天起,我们脱离东北军,成为抗日的革命队伍了!”又是一阵掌声、欢呼声。

接着,讨论改变部队名称。大家一致建议要坚决甩掉五十三军的番号。当时多数人希望改称红军,但因还未和地方党、老红军接上关系,就主张另起一个名称。经过民主讨论,一共提出各种名称二三十个。大家主张不受地域限制,自然也包含着“打回老家去”的意愿。最后,决定改称人民自卫军。又讨论戴什么臂章。大家认为应区别于国民党旧军队,要有鲜明的革命标志。讨论的结果是采用长方形臂章,白底,蓝边,上面为人民自卫军五个蓝字,中间是一颗红星。并约法三章,严明纪律,不准扰民,发动群众抗战,官兵平等。代表回去传达到全体官兵,即刻掀起一股回师北上的热潮。

这一天,是1937年10月14日。六九一团的每一个官兵,此后无不始终牢记改编为人民自卫军的这个日期。因为,从这一天起,我们的团队走向了新生,我们每个人都和自己的团队一起,走向党,走向人民,走向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50多年来,六九一团还幸存人世的一百余名老战士,年纪最小的也逾古稀,谁都牢牢地记得那一天,甚至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无比欢腾的情景:那是一个秋夜,天空是那样清朗,月光是那样明亮,大家踏着皎洁的月

光，回师北上迈上抗日的征途。

部队改编后，我担任人民自卫军司令员。下属三个总队：一总队队长赵承金，二总队队长于权伸，三总队队长沙克。我们并立即选拔一批优秀党员和进步分子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

人民自卫军回师北上，配合地方党的武装，很快攻占高阳，在冀中开创出抗日新局面。我们还积极派人与晋察冀军区联络。聂荣臻司令员知道后即派孙志远来人民自卫军工作。这样，人民自卫军就和晋察冀军区正式建立起隶属关系。不久，晋察冀分局又决定黄敬到冀中任区党委书记。接着，中央命令：把冀中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成立冀中军区。我任纵队司令员兼军区司令员。

此后，八路军第三纵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创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和坚持敌后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与冀中人民一起，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残酷“扫荡”，终于和全国人民一起，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回忆抗战时期山东解放区的货币斗争

杨 波

抗日战争以前，山东省各地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主要是南京国民政府通行的法币；同时，韩复榘主持的山东省政府“山东民生银行”发行的纸币也在全省使用。1937年七七事变后，当时分驻于山东各地的国民党地方部队，趁机在其驻防区内大量印发地方流通券，强迫群众使用，掠夺物资，中饱私囊，发国难财。据我所知，当时发这种流通券的山东国民党部队计有：胶东区的赵保原、蔡晋康、苗占魁、郑维屏、秦毓堂、张金铭、陈昱、李德元、姜黎川、高玉璞、丛镜月、王兴仁等；渤海区的刘景良、张景月、杜孝先、周胜芳、朱仲山、王馨堂、张景南等，鲁中区的秦启荣、张天佐等；鲁南区的申徒周，周侗、李以锦、李子赢，荣子恒等；滨海区的许树声，尹鼎五、董玉佩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司令、专员、县长以至团营长，发行了50种以上的地方流通券。如再加上各地方的大地主趁战争混乱时期私自发行的各种辅币，其数量之多，种类之复杂，则更难以计算。这些纷纷出笼的、五花八门的“纸币”造成了山东各地金融市场的严重混乱，物价上涨，群众叫苦不迭。当时胶东文登、荣成各县的老百姓，对郑维屏、王兴仁等所发的地方流通券，称之为“破被单子”（意指该种纸币票面很大票纸很差，既不耐用又不值钱），“地瓜票”（意指用地瓜

也可作票版)。“活人使冥票”,成了群众普遍的新俗语。

1939年以后,各地国民党地方政府,在日寇“扫荡”中随其军队的溃散而逃跑。当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相继成立了民选的人民政府。人民政府为建立抗战的经济阵地,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军需民用,很快就肃清了国民党部队和地方政府滥发的各种纸币,稳定了金融市场。这时,市场上流通的主要是法币,同时人民政府也开始发行自己的本币——“北海币”(开始时只发行票面为一角、二角、五角的小面额货币,作为法币的辅币)。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敌后解放区进行军事进攻和经济掠夺,在华北开始大量印发伪“联合准备银行”纸币,并到处以武力胁迫群众使用,以此来盗取我解放区的物资。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日寇还利用推行伪钞,贬价吸收法币,进而套取外汇,购买军事物资,以支持其侵略战争。针对敌人这一阴谋,这时期我山东解放区人民政府,及时地采取了保护法币,严禁使用伪钞,部分地发行本币,以及限制法币出境的办法,与敌人展开货币斗争。这样做的结果是既保持了法币币值的相对稳定,也稳定了市场的物价。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之英美租界相继沦陷敌手,而滞存于各租界的大批法币,随即被敌人不用分文代价唾手而得。这时,由于国际关系的新变化,法币对日寇已失去当作外汇使用的作用,于是他们便限制法币在其占领区流通。与此同时,他们还大量印发汪精卫伪“南京政府”的伪法币进而向我解放区渗透,企图扩大伪钞的流通范围。日寇还企图将大量伪法币压缩

于我解放区,以掠夺我区物资,实现其在经济上“困死”我敌后军民的阴谋。本来物资输出,贸易出超,是一件好事,对解放区人民是有利的,但在敌人这种以货币做为其掠夺手段的情况下,却给我区人民带来了灾难,即大批法币流入、物资输出的结果,造成了解放区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当时山东解放区以法币计算的粮食、棉花、布、花生油等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物价指数,以1937年为100,1938年为135,1939年为275,1940年为903,1941年为2327,1942年为8595,1942年为47656。这就是说,6年中上涨了470多倍。其中上涨最快的是1942、1943年两年。

为粉碎敌人的经济掠夺,缓解当时这一严重的经济危机,发展和保护解放区的生产,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支援抗日战争,这时我人民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货币政策,加强对敌货币斗争。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我们采取限制法币流入,提高本币币值的办法,与敌进行货币斗争。结果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当时我们是在维持法币仍在解放区市场上流通的原则下与敌进行货币斗争的。这样,虽然我们自己的本币(北海币)发行量很小,但因其仍与法币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之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我们便无法控制,本币的币值随着法币的流入和贬值而难以稳定提高,市场物价亦随着法币的恶性通货膨胀而继续暴涨。二是只用行政办法进行斗争,即由政府出布告限制法币流入,规定本币与法币的比价(为一元北海币等于多少法币),没有采取经济办法,没有集中必要的物资力量作后盾。因此也就没有达到预期

的效果,本币的币值也就随着法币的贬值而贬值,政府布告规定的比价几乎不起什么作用。总结失败的教训,我们得到两点最重要的启示:一是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使本币与法币脱离关系。事实告诉我们,如果继续使本币与法币保持密切联系,两者同时在市场上流通,本币就会成为法币的附庸,而法币又已成为敌人掠夺我解放区物资的桥梁,长此下去,非但无法克服我们面临的经济危机,反而便利了敌人的经济掠夺,加深我们的经济危机。二是,必须以经济办法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才能收到对敌货币斗争的胜利。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我们首先在滨海区停止使用法币,采取的措施是一方面由政府明令公布在本区内停止使用法币,同时动员群众把手中的法币推向敌占区,换回必要的物资;另一方面由政府管辖的国营经济单位(当时是工商管理局所属的各公司)集中必要的物资力量,来支持保证本币的币值,如规定一元北海币等于二元法币,相应地群众用北海币买东西比用法币就便宜一半,并且保证供应。商人如要法币,我银行和国营经济的单位同样以一元北海币兑换两元法币,并做到要多少兑换多少。我们采取的这项措施,叫作“用法币打法币”。当时解放区内有些地主、商人不相信我人民政府能够停用法币,不相信北海币的币值能够高于法币,便乘机秘密收藏法币,结果大吃其亏。如1943年7月我们开始停用法币时,一元法币兑换北海币七角,到当年年底,六元法币才能换到一元北海币,即一元法币只能换到一角五分北海币。这时,他们也不得不忍痛抛出法币了。

根据滨海区对敌货币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山东解放区人民政府决定从 1944 年开始，在鲁中、鲁南、渤海各地区相继停用法币（当时胶东区基本上已不用法币，市场上流通的主要是北海币，并将各区内原有的法币排挤到敌占区，换回我军民所需的物资。到 1944 年底，我对敌货币斗争在全山东解放区的各地区取得了全面胜利。

货币斗争的胜利，使北海币完全占领了山东解放区的市场，并保持了币值的相当稳定。停用法币，使本币最终脱离了法币的影响。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我们可以完全控制，因之我解放区的各种物价也即随之下降和稳定了。如滨海区 1943 年 7 月停用法币以后，到当年 12 月的半年中，物价指数平均下降了一半。1944 年以后全省各地普遍停用法币，市场上流通单一的北海币，不但改变了过去各地物价不平衡的状况，逐步使各地物价大体上一致，而且保持了物价的相当稳定。这从以下各地本币的物价指数中便可以看得很清楚：

	1944 年 1 月	1945 年 1 月	1945 年 8 月
滨海区	100	98	127
鲁中区	100	69	139
鲁南区	100	75	147
胶东区	100	264	296
渤海区	100	69	91

（注：胶东区物价指数上涨幅度比别区高，是因为该区 1944 年 1 月的物价比其他地区大约低一半，全山东解放区统一流通本币后，其物价也相应上涨快些。实际上胶东区 1945 年 8 月的物价与其他地区大体相同。）

如果我们不停用法币，则物价不但不会下降和保持稳定，而且会继续大幅度上涨。例如，以1944年与1943年比较，法币的物价指数竟上涨了5倍以上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货币斗争的胜利，使法币及伪币币值下跌，我北海币币值相对提高。当本币与法币等价流通时，法币贬值也使本币随之贬值；停用法币后，本币与法币脱离关系，不受其通货膨胀的影响，本币的币值即可自主地保持稳定。这样，不但提高了本币与法币的比价，也提高了本币对伪钞的比价，如1943年上半年，伪钞一元换本币七八元之多，经过货币斗争之后，到1943年年底，伪钞一元，就只能兑换本币一元五角，待到1944年则五六元伪钞才能换一元北海币了。记得1943年秋季，日照县有一个敌占区的商人，因不堪敌伪的压迫，携其资金伪钞3万元来解放区营业，当时他把伪钞依法兑换了北海币，三个月后他的营业尚未开始，他的北海币已值伪钞9万元了，即已比原本多了两倍，喜得他逢人就称赞北海币的好处。下面是1944年以后伪联币币值跌落的情况：（一元伪联币兑换北海币的数额）

	1944年1月	1944年6月	1944年12月	1945年8月
滨海区	1.50	1.10	0.16	0.03
鲁中区	2.00	1.00	0.20	0.03
鲁南区	8.00	1.00	0.20	0.03
胶东区	0.85	0.80	0.25	0.02

渤海区	3.00	1.70	0.25	0.025
-----	------	------	------	-------

这就是说,到 1945 年日本投降时,一元伪联币只能值北海币三分钱。

货币斗争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向解放区倾销法币伪钞,掠夺我解放区物资的阴谋。我们停用法币,严禁伪钞流入,并将解放区内原有的法币推向敌占区,不但避免了法币继续贬值给我解放区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而且用法币换回了我区军民必需的物资,支持了抗日战争,改善了人民生活,克服了经济困难。同时,由于本币币值稳定,威信提高,不但巩固了其在解放区内市场上的地位,而且扩大了其流通范围,使北海币在游击区以至敌占城市公开或秘密的广泛流通。正因为如此,日寇投降后,我北海币迅即占领了新解放地区和城市市场,深受广大群众所喜爱。

工人干部在抗日烽火中 锻炼成长

——忆抗战时期党对工人干部的培养

马洪 陈宇 杨长春 邵井蛙 钟林

一、创办《延安工人学校》

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和近代大生产相联系的最革命、最进步的强大阶级。她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为担负起本阶级的历史使命，需要不断吸收培养工人干部。西安事变后，特别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的革命形势，使各方面都急需干部的矛盾极为突出。但是，由于十年内战期间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和党内连续发生的左倾错误的危害，使我党干部严重缺乏。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适应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从产业工人中选拔、培养干部。

抗战初期我党在延安创办了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和安吴堡青训班等17所各类院校，都重视吸收工人学员参加学习。同时，积极筹备专门培养工人干部的学校。

我党发表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激起了全国人民一

致抗日的决心。西安——这座具有革命传统的古城，成为许多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通向抗日的大门，人们向往并纷纷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当时西安不仅聚集了许多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而且还有从沦陷区辗转而来的许多产业工人。根据抗战的需要和紧急培养干部的考虑，我党于1937年10月在西安附近的三原斗口镇开办了战时青年短训班，吸收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为学员。1938年1月，青训班迁往云阳安吴堡，通称“安吴堡青训班”。中央还拟在三原县办工人学校，但考虑离西安近，目标大，国民党当局难以批准，所以暂时以“安吴堡青训班职工大队”为名，它是延安工人学校的前身。

这个大队是这样开办起来的。1938年初临汾失守，大批来自山西省同蒲铁路、正太铁路和太原兵工厂的产业工人撤退到西安附近。当时，在党领导下的同蒲铁路总工会工作的马洪同志按照党的决定随撤退的职工来到西安，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维护职工权益的活动，西安国民党反动当局密令逮捕马洪，消息传出后，组织上立即决定他到延安汇报工作。马洪到延安后及时将有关情况向刘少奇、张闻天、张浩等领导同志作了汇报。鉴于当时的情况，党中央决定在安吴堡青训班的基础上增设一个“职工大队”，扩大吸收产业工人出身的学员。由张浩任大队长兼政委，同年3月开学，共办两期，有工人学员800余人。他们毕业后，除部分到前线或送入中央党校、中组部训练班等外，大部分进入抗大二大队（职工大队）学习。1938年8月，中央决定在抗大第四期设置“职工大队”（亦即抗大四期二大队），由青训班的工人学员、全国各地来延安的

产业工人和华侨工人组成，共有学员 1500 余人。大队长罗华生，学时为 6 个月。职工大队由抗大和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共同领导，各有分工。

1939 年 3 月，中央决定在延安东门外桥儿沟原中央党校所在地成立了“延安工人学校”。抗大职工大队的学员一部分进入抗大和中央警备团教导大队继续学习军事，一部分送入马列学院、中央党校深造，大部分进入工人学校。

在创办延安工人学校过程中，党中央负责同志倾注了大量心血，这是办学成功的关键，党中央及其主要领导人直接参与筹办工人学校。他们对学校的规划、课程设置、思想、组织、作风建设，能力和技能的培养等方面都指导得极为具体。毛主席亲自为工人学校制定了“坚定、团结、严肃、活泼”的校风，强调工人干部必须具备坚定的阶级立场，明确的政治方向和远大目标。毛主席在百忙当中还挤时间参加抗大职工大队的开学典礼并作重要讲话。他说，延安集中了这么多的产业工人，在我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全民族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他高度评价了我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创造的光辉历史业绩，并勉励工人学员要勤奋努力，学习和掌握革命理论，团结好本阶级，团结各革命阶级和进步阶层，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斗争。1939 年 5 月 15 日，张闻天和邓发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工人学校开学典礼并作重要指示。张闻天指出：工人学校的开学，是中共工运史上的一件大事，他还提出以下希望：（一）认真学习好

工人阶级自己的理论——马列主义，学习党的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学习中国工运的经验；（二）学校培养做党务、企业、工运、军队、政府和理论工作干部；（三）希望学员都能起模范作用。张闻天在讲话中强调了工人学员学理论的重要性。他说，工人文化水平虽低，但就其阶级地位而言，更容易接受马列主义。要打破“工人不懂得理论”的错误观念，要下最大决心、耐心地学习它。要克服落后意识如帮口、行会、乡土等观念。工人有了铁的团结，才能形成伟大的力量，防止统治者分化工人的团结，准备长期的、坚韧不拔的斗争。

中央领导对工人学校非常关怀，许多重要课程都由他们自己主讲。周恩来同志常来工校作报告，为学员全面介绍全国抗战的形势，分析发展趋势。刘少奇同志曾用了三个半天系统地讲授《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张闻天同志作了《论工人阶级》的专题讲座。张浩同志讲了《关于抗战中中国职工运动的任务》等。在党的关怀和哺育下，工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既懂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出身的党的好干部。

二、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成立

1939年4月19日，中央书记处决定正式成立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由刘少奇、陈云、张浩、孔原、朱宝庭、刘大超、乐少华、高长久、李卓然等人组成。并任命张浩同志兼任工人学校校长。从我们自身的接触中，深刻体会到，张浩同志在担任工人学校校长期间忠于党的工运事业，热心工人干部的培养，在他身上生动具体地体现了老一辈

革命家的许多特点：

(一)身体力行，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循循善诱，以诲人细致的精神耐心对学员做思想工作。他不满足于一般的号召，不搞空洞说教，而是深入浅出，切实可行。他要求大家“都要善于发现和耐心培养学员的优点”，“发挥其特长”。他曾深有感触地说：“看见人的缺点易，发现人的优点难；痛快指责他人缺点者多，耐心培养他人优点者少。”尽管工作繁忙，他总是要深入课堂、宿舍，与学员广泛接触，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使不少进校时思想落后的学员，都培养锻炼成为党的优秀干部，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

(二)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力戒空谈的教学原则。学校整个教育过程强调有的放矢，通过形势教育加深对课堂理论的理解；通过理论学习加强学员的思想转化工作；通过思想工作加深对学员的日常行为、言论的规范工作。张浩讲授“抗日战争中的职工运动”专题讲座前，曾作了许多调查研究，曾四次去学员宿舍，请教一位从童年时就在豫丰纱厂做工的、并积极参加罢工和抗日宣传工作的蒋国卿同学，了解纱厂工人在抗战前后工作、生活、斗争情况。

(三)坚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培养学员的优良作风。张浩不仅本身这样做，也要求大家这样做。他说：“要学员们做的事情首先自己去做，不要学员做的事情首先自己不去做”。只有这样，教育才有说服力、生命力。1938年冬抗大职工大队搬家，由延安城内旧址，迁往柳树店。时值11月份，延安寒气袭人，当扛着桌椅的学员们走到延河前就犹豫了。张浩看在眼里，二话没说，跳下马，卷起

裤角，直蹚河而过。张浩的行动，激励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大家一鼓作气，纷纷蹚水过河，闯过刺骨的冰水，直达彼岸。

（四）工人学校坚持党的办学方针，使自身成为培养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和特殊人才的熔炉。工人学校建立时，学员大部分来自“抗大”和“青训班”职工大队，以后来自敌占区、大后方和出身海外华侨的工人陆续入校，将近2000人。学员有广泛的代表性。从地区看，他们来自山西、河北、河南、陕西、山东、江苏、安徽、绥远、察哈尔、吉林、辽宁、湖南、湖北、浙江、四川等15个省和上海、天津、北京、太原、济南、武汉、郑州、南京、哈尔滨等12个大中城市，还有从美国、法国、菲律宾、马来西来、新加坡、越南、泰国等回来参加革命的华侨工人。从职业上看，有铁路、矿山、纺织、海员、航空、兵工、机械、印刷、造纸、火柴等72种产业的职工代表。这些学员有两个特点：一是文化程度不高，大部分为小学、初中水准，还有少数半文盲；二是有一定工作经历，绝大多数人参加过抗日救亡和经济、政治斗争，有20%左右做过领导工作。学校因材施教，不仅用无产阶级人生观、世界观塑造人，而且培养、提高各种专业技能、使他们成为党领导的各项事业的领导和骨干。如来自新加坡后为军工生产而牺牲的华侨工人刘金玉等。

（五）培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延安精神。工人学校创办时，除面对贫困的自然环境外，正值陕甘宁边区因经济封锁各方面十分困难的时期，学员们在毛主席“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下，战胜各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实现自给。全校师生开荒种田，创办工业，挖窑砍柴、

背粮驮炭，轮流炊事，生产搞得热火朝天，学习蒸蒸日上。办校头一年就开荒 2500 余亩，一个月缝制军装 800 套，生产肥皂 20000 块，牙粉 8000 袋……。工人学校在延安中央直属机关生产劳动竞赛中，成为中直七个先进单位之一。

三、工人干部在抗日烽火中锻炼成长

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在上海安源、广州等地就有办工人夜校俱乐部训练班培养职工干部的光荣传统。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和以毛主席为首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通过以工人学校为主要渠道培养工人干部，已成为党的一项重要干部政策和有效途径，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毕业的学员一批批分配到根据地做党、政、军、企业和工会各方面的工作，也有分配到陕甘宁边区茶坊机械厂、难民纺织厂、总后被服厂、维华毛纺厂、新华化学厂、新华印刷厂、火柴厂、造纸厂、制药厂等工矿企业工作，担任厂长、支书和工会干部。他们直接参加劳动，即是技术工人又是师傅。他们既经受了实践锻炼，又推动了边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以实际推动贯彻了毛主席“发展生产，保证供给”的指示。

在培养工人干部过程中，党中央还非常重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如机械专家沈鸿、化学专家钱志道等。当时任工艺实习厂的总工程师沈鸿，是上海自学成材的工程师。抗战初期他带着十余名徒工和十几部机器，经武汉辗转来到延安。他的机器在延安是“母机”，是制造机器的机器。由此，边区在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状况下，迅速发展起来，不断制造出适合边区条件、灵便多功能的机械，

既保证发展生产,又适应战争环境,对边区坚持抗战提供了重要物质保证。他还利用设备优势,发挥自己懂技术的专长,办了一批又一批技术人员培养班,有效地为党培养了一批批又红又专的技术干部,建国后都成了重要的技术骨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又如钱志道是浙江大学化学系的毕业生。他来到延安后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建议改进火药的生产工艺,制造炸药,受到中央重视和支持。毛主席亲笔为钱志道同志题字“热心创造”。由于钱志道的努力工作,边区急需的军事化学工业得到了发展。他并与沈鸿一道合作,设计制造了边区基础化工工业所需的重要机械。钱志道、沈鸿等本身也成为党在这个时期培养的又红又专的干部带头人和红色专家。

党中央和老一辈领导人在培养、造就工人干部事业中,抓先进典型人物,提高工人群众的主人翁观念和整体素质。1942年3月6日张浩同志病故后,邓发同志领导中央职工委员的工作,及时到延安温家兵工厂,蹲点抓工运。发现了工人学校毕业生赵占魁爱厂如家,不怕苦忠于职守,以全新的劳动态度对待劳动的先进事迹。便指示及时总结赵的先进事迹和经验。先是在陕甘宁边区推广,以后逐步扩大到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以赵占魁为旗帜的树立新的主人翁劳动态度的运动,反映了边区工人在自己政权下从事劳动的新的人生观、新的精神风貌。由于推广这样一位由党培养的劳动模范的事迹,对边区的精神建设和物质建设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以毛主席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重视对工人干部的培养,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从中国革命整体

战略高度来考虑的。在他们的重视和身体力行下，党培养选就工人干部的光荣传统又发展到一个新的深度和广度。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都培养输送了一批批工人干部，仅延安地区总数就有近万人。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以及以后中国革命和建设各项事业的胜利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杜万启 整理)

战斗在狼牙山

葛振林

我今年78岁了。每当想起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时，我的心情就久久不能平静，那悲壮的战斗历程就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我的老家在河北曲阳县。我8岁失去了母亲，从小给地主干活，受尽了压迫和剥削。1937年4月，我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投身革命，斗地主，斗恶霸。后来八路军来到我们村，帮助我们成立了各种组织，我便当上了民兵队长，带领民兵减租减息，征粮运粮，拥军优属，支援前线。1938年2月，我参加了八路军，被分配在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七连六班，直接投入反抗法西斯、打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在抗战期间，我曾参加过宋城、阜平、东庄、大龙华、黄土岭、南坡头、狼牙山、百团大战争等大小几十次战斗。

1941年8月，华北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调集10余万兵力，对我晋察冀根据地实施规模空前的大扫荡，进攻狼牙山地区的日伪军是由敌酋旅团长高见指挥的部队。

狼牙山因其峰峦状似狼牙而得名，地势险要，是晋察冀边区的东线大门。它不仅在军事上有重要地位，而且是我根据地的仓库，山上存放着许多弹药、装备和粮食。

9月23日，我们团长接到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的通报，

得知正在扫荡的敌人，对狼牙山周围可能有大的行动。他便立即进行部署。当时，团主力调出去保卫军区机关了，留在狼牙山只有我们七连和部分民兵。我们驻扎在林泉，连长刘福山和指导员蔡展鹏接到要保卫狼牙山的命令后，立即集合部队出发。

9月24日凌晨，3500多名日军，带领着伪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四面八方狼牙山包抄。被合围在狼牙山上的地方党政机关干部和周围村庄的群众达三四万人。团长部署我们七连担任后卫，掩护党政机关和群众突围，等大家安全转移后，留下一个班拖住敌人，最后转移。

我们班长马宝玉得知这一消息，便跑去找指导员求战，要求把最后拖住敌人的任务交给我们。连长和指导员一商量，同意了我们的请求。当时，我们班除因伤病住院的同志外，只剩下五人：班长马宝玉，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还有我。我是副班长。

24日午夜，团长接到杨成武司令员命令：“敌人口子已开，马上突围。”

眨眼工夫，在清冷的月光下，三四万名干部和群众由部队掩护着，井然有序地顺着盘陀路，悄悄地向碾子台方向转移。

团长临走时，特地看望了我们班，并对我们说：“突围的队伍和连主力能不能安全地跳出包围圈，全看你们能不能把敌人死死拖住。从现在起，你们一个人要对付敌人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如果你们充分利用狼牙山的天险和改造过的地形，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就一定能完成任务。”

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请首长放心！”

1941年9月25日，天刚蒙蒙亮，突围部队和群众已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了以狼牙山为中心的敌包围圈，敌人却认为我们的主力被他们包围住了。天一亮，便像群饿狼一样，恶狠狠地扑了过来。我们七连和留下的民兵密切协同，分兵把口，灵活御敌，在敌人必经之路埋下地雷，从各个方向朝敌射击，造成漫山遍野都是八路军的假象。从东西水村往棋盘陀爬上来的敌人，一路上伴着地雷的爆炸，死了四五十人。日军指挥官高见和伪军头目赵玉昆硬是确信网了一条大鱼，于是更加疯狂地进攻。

在激战中，连长刘福山负了重伤。他带领的二班和机枪班大都牺牲了，情况危急。指导员把连长转移到草丛里，让一个战士守着，然后对我们说：“你们在山上掩护，争取让转移的同志走得更远些，保证连队的主力安全突围。你们坚持到中午，然后看情况，能往那儿撤就往那儿撤，明天到规定的地点集合。”说完后给我们补充了一些弹药，并留下所有的地雷，接着就带着连队主力向龙王庙方向突围。

这时，我们班的5个人赶紧在各个要道口上埋上地雷。指导员带人刚刚钻出敌人的火力网，我们就跟敌人打响了，为了吸引敌人，我们站着举枪向敌人射击。500多名日军和赵玉昆的伪军嗷嗷叫着，向我们扑来，他们踩响了地雷，炸得鬼哭狼嚎，尸体横飞。未死的颤颤兢兢挪动脚步，但仍然穷追不舍。见此情景，班长马宝玉爬着身子悄声说：“注意！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在这儿，每人最多只许打五颗手榴弹。”

日军越来越近，我们死死盯着那一张张狰狞的面孔。

突然，班长马宝玉抬起半截身子，猛地摔出一颗手榴弹，大喊：“打！”

手榴弹和子弹呼啸着飞向敌人，鬼子被炸得东倒西歪，退下去了。

打退敌人后，却招来一阵猛烈的炮火，山上的石头炸得满天飞，硝烟把我们笼罩着，啥也看不见。五人都彼此担心战友们遭到不幸。好不容易挨到敌人炮击停止。班长仔细一看，嗨！五人都在，谁都没伤一根毫毛。

我们一边用稀疏的枪声吸引敌人，一边往棋盘陀山峰爬。突然，碰到一个叫冉元同的老乡，就赶快喊：“老乡，鬼子来了，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吧！”

冉元同便问：“你们上那儿去？”我告诉他上棋盘陀。他便劝我们不要上那儿去，说是附近有山洞，鬼子找不着，叫我们跟他去。我们感激地告诉他，我们不能躲，要把敌人引上棋盘陀。

这时，传来了日军的怪叫声，我们赶紧往棋盘陀山峰上爬，谁知那儿早已上去了敌人，机枪一个劲地朝我们打。我们只好攀上棋盘陀附近的另一个山峰。

这个山峰叫牛角壶，异常险要，那凌空而起，伸出来象只牛角的悬崖叫人望而生畏。牛角壶三面是悬崖峭壁，我们等于走向了绝路。冉元同远远望着发呆了，日军发现了他，向他开枪，他连忙藏进牛角壶附近的大莲花瓣山上去了。

我们往牛角壶爬了一阵又停住了。大家知道，前面是一条绝路，这时我们仍可沿着隐蔽的盘陀路摆脱敌人，但

是，大家担心部队和群众还没走远，敌人还会继续追击。

班长瞅着周围的地形说：“在这儿顶一阵子吧！”大家便卧倒，打开手榴弹盖，在前面摆了一溜。这里有小树，有半人多高的草，藏下百八十人完全没问题。正因如此，敌人摸不清虚实，不敢贸然行动。对我们来说，又为主力部队转移赢得了时间。

扑向牛角壶的几百名日军，头一回冲上来7个，2人在前，5人在后。只听到“啪”的一声枪响，一个端机枪的日本兵往后一仰，旁边的那个赶紧扶住他，把他放到一块小草地下，用布给他缠头，然后把他背下去了。有个鬼子一摇小旗，又上来30多个鬼子，并在松树坨摆上小炮，在东西水村架上了重机枪，往牛角壶猛烈射击。

一阵炮火过后，敌人开始冲锋。我们连打退了敌人四次进攻，五个人一个也没少。“鬼子又上来了，打！”班长马宝玉喊道。宋学义抓起手榴弹就扔，我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好象有使不完的劲。半人深的山草被炮火打着了，火苗窜得好高。胡德林推了我一把：“班副，着了！”我一看棉袄背上冒火了，连扣子也顾不得解，使劲一撕，脱下扔掉。敌人的第五次冲锋又被击退了。

太阳偏西了，亲人和战友早已远去，掩护突围的任务早已完成，现在该撤了。可是，已经走不脱了。

一个指挥官指使敌人把日本旗插在地上，将另一面日本旗铺开，我们看得莫名其妙。忽然，空中一声巨响，两架敌机俯冲下来，我们刚卧倒，敌机便射出一串子弹，呼啸着擦地而过，弄得小树象醉汉似的直摇晃。接着山下的敌指挥官战刀一挥，敌人又冲上来了！我们往悬崖顶上

爬，敌人紧跟着往上爬。为了不让敌人跟得太紧，凡是到了能射击的地方，我们都举枪向敌人射击。就这样，牵着敌人的鼻子往山顶上带。

太阳西斜时，我们登上了险峰之巅，再也无路可走了。三面都是万丈悬崖，一面堵满了鬼子兵。

“八路的，跑不了的……”秋风送来了鬼子得意的叫嚣。我们的手榴弹、子弹都打光了，大家非常着急。

“哎！”胡德林叫了一声，从地上捡起一颗手榴弹，他扬起后正要往下扔，班长马宝玉夺过来，别在腰上。大家明白，这是留给自己的。敌人呀呀乱叫，我们站起，举着石头往下砸，大的搬不动，就两人抬。石头滚下去砸得敌人乱叫。敌人像蝗虫一样，一批一批地往上涌。最后连石头也没有了，班长马宝玉拔出仅有的一颗手榴弹，用一种异常严峻的目光望了望，我们四人全明白，一齐靠向班长。

“八路的，投降！”

“抓活的，抓活的——”

班长扭头一看，吼了一声：“去你娘的！”将那颗手榴弹甩向爬上来的敌人。

“轰”的一声，前头的几个日军被炸翻了。

“撤！”马宝玉同志说。其实这只不过是他下意识涌到嘴边的一句话，周围三面悬崖，从前崖到后崖，只有十来步，往哪里撤？

我走在最后，等我赶上去，班长带着其他三人已经站在崖边了。这时大家的表情都异常平静。班长抓住我的手臂断断续续地说：“老葛，咱们牺牲了，有价值，光荣！”我明白班长的意思。我是副班长，五个人中只有我们俩是党

员,应该做出榜样,便说:“人牺牲了,枪也不能叫敌人得。”

敌人上来了,班长随手一扔,那支崭新的三八大盖飞到悬崖下去了。我举起手中的枪往石头上砸,没砸烂也随后甩下悬崖。宋学义他们三人噙着泪,举起心爱的枪,狠狠地摔了几下。

敌人疯狂地嚎叫。

我们五人昂起头,一步一步走向悬崖边。

狼牙山像巨人一样耸立着,易水河像条玉带飘向远方。在这座狼牙山上,我们学习、练兵,欢迎新来的战友,不止一次地消灭过敌人;在这座山下边,我们吃过老乡们慰问时送来的棒子、红枣,听分区领导讲过古代壮士荆轲的故事,那“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悲歌,一直回旋在耳边;我们在易水河畔洗过澡、做过饭,阻击过日本侵略军;如今我们又在这座山峰上掩护战友和乡亲们突出了重围,并消灭了一百多个敌人,任务完成了!我们可以无愧地与祖国的山河诀别了!

敌人来到跟前想活捉我们,马宝玉正了正军帽,象发起冲锋一样,大声喊道:“同志们跟我来!”顿时,狼牙山的群峰峡谷回荡着一阵阵气壮山河的口号声——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同志们,乡亲们,永别了!”

惊得目瞪口呆的日本兵,望着我们五人纵身跳下悬崖……

我和宋学义侥幸被树枝挂住,绝处逢生。跳崖时的腰

伤治好以后，我继续跟随部队行军打仗，以后还参加了彭老总指挥的百团大战和后来的平津战役。

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的解放，是我们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今天当我们隆重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我们一定要继承先烈遗志，进一步振奋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的腾飞，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

(周迅 整理)

突破日军的“铁壁合围”

曾 思 玉

1942年9月，我一一五师教三旅抽调第七、八、九团的第一连和班长训练队参加比赛，考核青纱帐期间部队的军事、政治、体育、文化训练成果，并观摩了王正南训练科长的体育表演。

秋收季节，常是日军进行大扫荡的时候。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也正在紧张地快收、快打、快藏，坚壁清野，准备反“扫荡”。

日军以驻兖州的三十二师团和驻邯郸、新乡的三十五师团为主力，并配属了驻开封的骑兵第四旅团、驻聊城的骑兵联队，出动坦克30余辆、汽车400余辆、飞机10余架，另外还纠集了周围17个县的伪军共3万余人，向我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进行秋季大扫荡，采取“铁壁合围”的战术，企图摧毁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消灭我有生力量。

9月26日，我和第八团参谋长王晓同志，率领第七、八团的第一连和两个班训练队，从鄆城以北的大石庄出发，黄昏前到达郟城以北的李楼宿营，准备召集当地党政军有关同志开会，布置秋季征粮任务。黄昏前部队刚刚到达宿营地，就得到了郟城北的侯集据点敌人增兵的情报。顿时，我脑子里就反复思索起来：日寇的秋季大扫荡这就

开始了吗？我怀着这个疑问，随即同第八团参谋长王晓同志进行研究，便作出紧急布置。由王晓立即通知部队加强警戒，干部严格查哨，监视敌人的行动。

9月27日拂晓前，大约3点钟左右，王晓同志走进我的住处，急促地喊道：“曾政委、曾政委，村南面野外发现敌人！”我从睡梦中惊醒，急问：“是日本鬼子还是伪军？”王晓同志说：“侦察员还没有弄清楚，正在那里继续监视敌人的行动呢！”我果断地说：“通知部队马上起床，不要喧哗，要肃静，迅速到村西打谷场上集合，准备战斗！”我又同王晓同志说：“走，我们到村南头去听一听敌人的动静。”这时，正南、东南和西南方向，远近的村庄里都传来了狂乱的狗吠声。我判断：有敌情！敌人可能在行动了，而且距此地不远。此时，正前方有一个人影跑过来，通讯参谋王杰低声问道：“谁？”来人低声回答：“王参谋，政委在哪里？”未等王参谋回话，我急切地喊道：“小李快过来！”侦察员小李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报告：“政委，在南面三四里的坟堆里，发现有日本鬼子趴着”。我问：“情况确实吗？”小李肯定地回答说：“确实是日本鬼子，我们在道沟旁边大麻籽棵里还听到鬼子咿哩哇啦的说话声音呢。”我立即说：“那好，你们回去找到王班长和小刘，继续监视鬼子的行动，注意和我们保持联系，有新情况立即向我报告。”

在这种情况下，既然不可能马上弄清敌情，当然也不可能在这种不利的地形条件下仓促同敌人作战。最好的办法是在拂晓前，争取时间把部队转移到黄河以北（黄河改道后，旧河床变成了沙滩），等天亮察明敌情后，再决定

如何行动。于是我带领部队悄悄地离开了李楼，转移到黄河故道以北沙滩上的一个无名小村集结待命，战士们非常乐观和自豪风趣地吟着：“黄河两岸渡春秋，不灭鬼子莫罢休……”

拂晓，突然从较远的西北方向隐约传来了“叭！叭！叭！”的枪声。这枪声使我进一步思索着：可能是西北方向的敌人也出动了。于是，我立即命令王晓同志带领部队向东北方向转移，我留下骑兵班，站在无名村南一座破窑顶上，进一步观察黄河故道以南敌人的动向。

太阳从薄雾中慢慢露出地面，我拿起望远镜向黄河故道南岸李楼方向观察，隐隐约约地看到，在黄河大堤的树林中，有三三两两鬼鬼祟祟的人来回走动。不一会太阳光射进了柳树林，这时才清楚地看到，日寇的大队人马隐蔽在柳树林中休息。

大约七时左右，一队队的敌人纷纷站起来，枪上的刺刀在阳光下闪动着。只见他们走下黄河大堤，列成行军队形，打着大大小小的日本膏药旗，像一条条毒蛇似的从南向北扑过来。这时，我终于弄清楚了，这就是日本鬼子筹划已久的“铁壁合围”。我立即转身上马，带着骑兵班飞快地在旧范县赶上王晓同志带领的部队，命令部队就地隐蔽。我和王晓参谋长立即召集连以上军政干部开了一个短会，介绍了黄河以南敌人的动态，下达了我们突破敌人“铁壁合围”的作战决心，并作了简要的战斗动员。号召部队要趁敌人合围尚未形成之前，从东北方向——寿张方向坚决打出去。我还要求部队轻装上阵，甩下不必要的东西，连炊事班也要把炊事担子甩掉，拿起扁担铁锹作武器

突围出去。

各连经过紧急战时动员之后，斗志旺盛，迅速作好了各项准备。9点钟左右，当我们利用道沟隐蔽地向东北方向运动时，四面八方响起了一阵阵的枪声，敌人的10多架战斗机，一对对地从远方袭来，穿梭似地在我们上空不断轮番俯冲扫射，并疯狂地投弹轰炸；侦察机也象饥饿的老鹰一样，在合围圈上空盘旋；地面上的敌步兵，打着大大小小不同的红、黄、蓝、白、黑各种颜色的旗帜，展开战斗队形向合围地区压缩；敌人的坦克、汽车越过一条条抗日沟道，颠颠簸簸地爬行着，步兵则强迫老百姓为坦克、汽车平道沟开辟通路；敌骑兵部队打着黑色旗帜，在开阔地和村庄之间穿来穿去。敌人所到之处，烟尘四起，烽火冲天，枪声不断，大大小小的村庄陷入一片惊惶和恐怖之中，老乡们在呼儿唤女，扶老携幼四散奔跑，东走走西碰碰，传来凄惨的哭喊之声。随着敌机的狂轰滥炸，人群中血肉飞溅，尸体横陈，鲜血染红了黄河故道的沙滩……

敌人合围的圈子在逐步缩小，一路路敌人渐渐收拢“铁壁”，枪声、炮声、爆炸声象狂风暴雨。敌人到一村、抢一村、烧一村、杀一村，万恶的日本侵略军似野兽一般凶残。侵略者的铁蹄所到之处，村村冒起了浓烟烈火，滚滚冲向天空。这是敌人的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是日军对我冀鲁豫边区濮范观中心区广大军民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日军在无法征服我们广大抗日军民、无法控制冀鲁豫平原的绝望情绪支配下，使用了一切野蛮手段，妄图用凶残的屠杀手段来镇压和消灭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日军残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使我民群众遭受了深重的灾难，

指战员们个个怒火满腔，悲愤难忍，在各连队党支部号召下，人人磨拳擦掌，纷纷宣誓：“坚决消灭鬼子，为死难的同胞报仇！”

中午时分，敌人的“铁壁合围”圈子形成了，开始向中心点旧范县地区压缩，枪声、炮声似狂风暴雨般地呼啸而来。日军进村就奸淫抢掠，杀人放火。每个村庄都遭受到法西斯兽军的蹂躏践踏，被洗劫一空。到处浓烟四起，烈焰冲天，死亡枕籍，惨不忍睹。中心地区各县、区的军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及后方工厂、医院、报社的同志们，也从四面八方被敌人追逐驱赶着转移到旧范县的沙滩上来了。有些地方武装小分队，在掩护群众转移时，知道有一支主力部队在这里，就先后向这儿靠拢过来，加上各村逃出来的男女老幼，一时在旧范县地区这个狭小的范围内，集中了党政军民这么多人，到处人山人海，尤其是道沟里的人拥挤得水泄不通。当时天气干旱，骄阳似火，沙滩被晒得灼热，人们热得口干舌燥，饥渴交加，头昏眼花。在这硝烟弹雨交织的浓雾中，在这令人窒息的热浪笼罩下，我们这支有着光荣传统的老部队掩护着成千上万的骨肉同胞，在炮火中奔波了大半天，吃不上饭，喝不到水，黄沙满面，汗水湿透了衣裳，体力消耗很大。指战员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在这关键时刻，人民军队要全心全意为人民，保卫人民是自己庄严神圣的职责。个个紧握武器，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饥渴，复仇的怒火燃烧着每个人的胸膛，人人咬牙切齿，磨拳擦掌，恨不得一把抓住鬼子，扒他们的皮，抽他们的筋。

下午3点钟左右，敌人进一步缩小包围圈，最严重的

时刻降临了！

黄河故道北岸，沙丘起伏，只有几十户人家的甘草垵堆村，成了我部与日军鏖战的战场。在旧范县这块不到30平方公里的沙滩上，人们已被日军逼得无路可走，无处藏身。军队走一步，老乡们跟一步，军队走到哪里，老乡们就涌向哪里，条条道沟里人们都挤得满满的，在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场上，这种相依为命的军民鱼水之情，更加亲密，令人感动！

突然从东面道沟里的人群中闪出一个彪形大汉——寿张县基干队黄大队长。他边走边喊：“曾政委！曾政委！东北方向发现鬼子骑兵！后边还有坦克……”我急促地问道：“你们的队伍呢？”他指着身后说：“在那边道沟里！”“好！你回去掌握好部队，听我的命令，我们决心从这里打出去！”我和王晓同志，站在交叉道沟的掩体里，仔细地观察了周围敌人的态势，选择突围方向。我们观察后判断：东北方向发现了敌人的骑兵和坦克，这是卡我们脖子的方向，不能硬碰。西北和西南方向，看来会碰到敌人的主力，那么，从正南方向浩瀚的沙滩中突围是否有可能呢？……我反复地思忖着要选择好敌人的薄弱点，用出其不意，乘其无备的战斗手段，集中兵力火力协同动作，勇猛顽强的同敌人作殊死的拼搏，以扼制敌人的嚣张气焰，突破敌人的“铁壁合围”。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时间是宝贵的，迟疑不决就等于死亡，争取时间就是胜利！只有坚决打出去才是唯一的生路！我们再一次反复仔细地观察了敌人“铁壁合围”的阵势：从它的第一线一直到战术纵深，均有红、黄、蓝、白、黑不同颜色的大小旗帜，西南方向的

黄旗是敌人的炮兵阵地，以炮火支援的敌步兵向合围中心运动。只发现在我们的南面，甘草垱堆村东北角，距我们约千余米的地段上，有几面日本膏药旗插在柳荫棵里停止不动。在敌人的纵深看不到其它的旗子了。这就是敌人的薄弱点！鬼子是一线式的展开，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地段上大作文章！敌人判断我们绝不敢轻易从平坦开阔不便隐蔽的黄河故道沙滩上突围。我下定决心，坚决要从这里打出去，随即命令第八团参谋长王晓同志带领该团第一连和班长训练队，沿着正南道沟，利用柳荫棵，大麻籽棵作掩护，接近敌人，集中兵力火力，发挥刺刀，手榴弹的近战威力，采取突然动作，对甘草垱堆村东北角的敌人实施猛打猛冲，坚决突破这个缺口。又命令第七团一连和班长训练队及九团一个排（他们是上后方领棉衣的，遇上“合围”也集合到这里），组织轻机枪和用日式九九步枪配给特等射手，利用道沟就地射击，用准确的火力压制甘草垱堆村东北角，荫柳棵下的敌人，支援突击部队的战斗行动。这时，日军正手忙脚乱地在荫柳棵下挖工事，发觉了我们的行动，就立即用机枪、掷弹筒一齐向我们猛烈地射击，子弹、炮弹从我们头上呼啸而过，像雨点似地落在道沟前沿。这些猖狂而愚蠢的家伙，满以为拉紧“铁壁合围”这张网，就可以吞掉我们这条“大鱼”了。

我站在战士们为我临时挖的一个单人掩体里，注视着突击部队的一举一动，心在忐忑不安的剧烈跳动着。我急切地期待着英雄的战士们突破成功的喜讯。突然，从正南方传来了一阵激烈的手榴弹爆炸声和震撼大地的冲杀声，声声紧扣人们的心弦，大家焦急地等待着那即将到来

的胜利，不一会儿，手榴弹的爆炸声和战士们的冲杀声，逐渐停止了。这时，从正南方向道沟里的人群中飞快地挤过来一个小伙子，原来是通信员，他气喘吁吁地向我报告：“政委，敌人封锁了道沟，部队突围没有成功，一连副连长王金山同志牺牲了。”听了之后，我想情况越来越紧迫了！我们这支南征北战有着红军光荣传统的老部队，又一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不一会，敌人炮火又向我们准备突围的方向猛烈轰击，企图制止我们突围，炮弹隆隆的在人群中爆炸，阵地上弥漫着浓厚的硝烟，刺激着人们的鼻子、口腔和眼睛。炮弹掀起的黄沙尘土遮天蔽日，在浓浓的硝烟迷雾中，我看到怀抱婴儿的妇女被炸得血肉横飞，我听到一阵阵嚎啕的哭叫声，老乡们大声呼喊道：“八路军同志，快救命啊！……”这悲惨的景象，使我万分激愤，立即要通讯员跑步去叫王参谋长等人快来。王晓、第七团一连连长赵林、指导员阎文康、两个训练队长和指导员也先后跑来报到。他们一个个怒气冲天，齐声说：“政委、下命令吧，我们和鬼子拼了。”我再次坚定地下达突围命令：“同志们，第一次突围没有奏效，现在情况非常危急，每个干部和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起模范作用的时刻到了，全体同志要拿出英勇顽强、不怕死的精神来。我们是硬骨头的钢铁战士，一定要打破敌人的合围圈，冲出重围去！俗话说，一人拼命，十人难挡。我们要以一挡十，要以少胜多，要有坚强的胜利信心和决心，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部队要迅速作好冲锋准备，把背包全部甩掉，炊事员拿起伤员的武器，拿起扁担，锅铲、铁锹当武器。一定要带领人民群众突出重围。

各部队利用道沟就地展开，各连的轻机枪要集中，射手挂皮带端枪射击，步枪上刺刀，手榴弹一律打开盖子。听到了冲锋号声，所有的机枪、步枪，掷弹筒对准日军那几面膏药旗，一定要在几百米宽的地段内，向荫柳棵下的敌人一齐开火。一直向黄河故道南岸的杨集、李集方向突围前进！现在你们马上回去，准备好了，向我报告！”

十几分钟之后，各连通信员跑来报告：“一切准备完毕！”我叫司号员吹起冲锋号，在高亢激扬的号声中，轻机枪、步枪、掷弹筒一齐向敌人怒吼了。只见部队跳出道沟，田野上空响起了霹雳般的喊杀声，正面敌人的枪炮霎时变成了哑吧。这时，部队一鼓作气，在阵地上，同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经过短促而激烈的浴血奋战，在这个地段上的100多名日军，死的死，伤的伤，有的趴在工事里装死。第七团一连炊事班长，举起扁担把一个装死的日军的脑袋打开了花，他还缴获了日军石井三十二师团九六部队黄番中尉的皮包、战刀等战利品。

敌人的“铁壁合围”终于被突破了！

部队继续向甘草垌堆村南面的黄河故道突围，这时，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象潮水般拥上去了。人们踏着敌人的尸体，紧随部队突围。我随部队抵达甘草垌堆村东的一个土堆上，拿起望远镜擦了擦镜头上的尘土，观察敌人的动态。忽然发现东北角上有敌人的骑兵向我们奔驰而来，企图拦截我突围部队。一个紧急信号，迅速地闪现在我脑海中，“怎么办？”面对这个严重的威胁，靠战士们的两条腿，对付敌人的四条腿？叫部队停下来与敌人的骑兵拼杀？都不行，……此时，停滞于沙滩是十分不利的！

我当即布置骑兵班去迎头痛击前来堵截的敌骑兵。我对骑兵班长具体交代了任务：“你们骑兵班在这个沙滩上猛烈地快跑，尽量扬起尘土，造成疑兵，先敌占领前方那个小村庄，尔后，用几个人拉马隐蔽在村南面，其余人疏散在村北道沟里，对准向南来的敌人骑兵，迎头猛烈地射击，阻击迟滞敌人的行动，争取时间，掩护部队和群众突围。”我又告诉他：“要注意观察敌人的动向观察我们的行动。如果情况不利时，你们就乘马转移，机动灵活地吸引敌人，向黄河滩正西方向跑，再转向南来，迷惑敌人，保障部队胜利突围！”

骑兵班长接受任务后，转身回到骑兵班，向全班交待了任务，立即拍马扬鞭向指定的目标奔驰而去，沙滩上顿时扬起了一条“黄龙”。我们英雄的骑兵班风驰电掣般飞快到达了指定的位置，10多分钟后，在小村庄以北的道沟里，传来了乒乒乓乓的枪声。“他们奋勇当先，一阵射击，以果断的行动打得骑洋马拿战刀的日军骑兵丧魂落魄，乱了阵脚，队形被打乱了，行动迟滞了。这个出其不意，乘其不备的战术动作的成功，为突围赢得了时间，减少了敌火力的阻击。此时突围的先头部队和群众已经抵达黄河故道南岸沙滩上。

第八团班长训练队学员董兆祥，外号叫董二，当过警卫员，作战勇敢，机智灵活有胆量，点子多。他在突围中夺了一面日军的“膏药旗”。他拿着膏药旗耀武扬威地向敌人冲杀。这种气壮山河、有我无敌的英雄气概，激励了士气，震慑了敌人。一时间，军民群情激昂，扶老携幼，像潮水一般涌向黄河南岸，转眼间已经胜利的冲破了敌人的

合围圈，越过了黄河故道，抵达南大堤上郁郁葱葱的柳荫深处的村村寨寨了。

我们这支战无不胜的部队，经过这一场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突破了日军的“铁壁合围”，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把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和地方干部从日本侵略者的虎口里解救出来，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卫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康永保 整理）

美军观察员多兰上尉在一次 惊险的地道战中

高 存 信

抗日战争后期，随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日益扩大。我党领导的广大敌后根据地的重要战略地位，已引起美国罗斯福总统重视，他主动提出派遣美军观察组，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作战地区了解情况。1944年七八月间，美军观察组一行30多人到达延安。接着，又很快派出3人到晋察冀军区考察。为了接待美军观察组，晋察冀军区成立了联络处，处长由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耿飏同志兼任。1944年12月，冀中军区也相应成立了联络科，把我从作战科调到联络科任科长，吴英民同志任副科长。联络科下设三个股：一是空军股，由刘绍光、史国瑛同志负责；二是海军股，由鄂力克同志负责；三是爆破股，由吴志远同志负责。还有一个办公室，由张绩明同志负责。

布鲁克·多兰上尉于1942年12月下旬抵达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考察。他来冀中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一带的日军情报及军事设施情况，同时了解八路军在冀中平原上是怎样跟日军作战的，作战能力究竟怎样。晋察冀军区调县长马振武来为多兰当翻译，马振武的英语讲得相当流利。多兰来了之后，冀中军

区杨成武司令员接见了，为了保密只开了一个小型的欢迎会，杨司令员在宴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多兰上尉到冀中来表示欢迎。多兰在冀中军区的几天里，作战科、敌工部等有关部门给他介绍了敌我双方情况。他当时表现有些傲慢，对我敌后军民所进行的游击战争，抱着不理解甚至怀疑的态度。

冀中军区安排多兰上尉先到七、八分区，然后再到九分区考查。他去七分区是由我和联络科副科长吴英民陪同去的。在七分区我们安排他在安平北检阅了我第三十六地区队。部队战士虽然都穿着便衣，但个个都是英姿飒爽、精神抖擞，给多兰以很好的印象。同时我们带他看了炕沿底下、锅底下、夹皮墙、磨盘底下等几种地道口的地道，也让他实际钻了两条地道。他看了以后，觉得利用地道作战很奇特，同时他对地道口的选择、伪装、隐蔽办法很敬佩。参观中他都作了一些文字记载，从一开始考察就比较顺利。去八分区，是吴英民同志带去的。到后由分区政治部向他介绍了冀中人民和日军进行英勇顽强斗争的情况，使他很受感动，其中有一位饶阳县的妇救会张主任讲她的妹妹张兰英被俘后如何顽强斗争，机智勇敢，才得以脱离虎口的事迹。多兰上尉要求见张本人，经过安排，多兰会见了张兰英。张毫不拘束地讲了她同敌人斗争的情况。多兰上尉边听边记笔记，并不断地频频点头。

这时候，冀中的形势已有很大好转。1944年9月30日我军收复了肃宁县城，其它村镇的碉堡、岗楼也被我拔掉了不少，但敌我之争夺还是相当激烈的，军区、党政群机关，仍然要不断的转移驻地。1945年1月21日早饭后，

多兰从军区驻地肃宁南动身到九分区去，仍由我和吴英民同志陪同，同去的还有冀中军区政治部的摄影记者石少华以及参谋、干事等，共七八个同志。那天是一个阴天，没有下雪，但西北风吹得刺骨。多兰头上裹着白毛巾，身上穿的是中国式深蓝色棉衣棉裤，跟我们是一样的装束。可是他身材高大，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一件特大号的。但是，再化装也掩饰不了他那白皮肤、兰眼睛、高鼻梁的欧美人形象。为了保密起见，管理处给他动员了一辆用骡子拉的花轱辘轿车，车的上面有一个棚，深蓝色的麻花布帘，让他坐在里面，免得被人认出他是外国人，车上面还拉了一些为他准备的烟、酒、糖果等。肃宁附近几十里地没有据点和岗楼，在去九分区的途中，多兰不时地揭开帘子观看冀中根据地的景色。多兰也带了不少东西：军区首长赠给他的纪念品；有日本军大衣、手枪、战刀；有他自己的毛毯、照相机、皮包等。他还带了一张地图，从延安到敌后的所到之处，都用红铅笔标出了路线图，并用英文作了注记。

我们走了六七十里地，下午三点多钟到了九分区的驻地——任邱县边关村。因为军区事先给九分区发了电报，分区有所准备。我们到了边关村，立即分别住进了堡垒户（有地洞的可靠的老乡）家中。老乡看到外国人来和我们一起战斗，非常高兴。这一天老乡们都做了红豆羹粥，热情地让我们和美国客人吃腊八粥。腊月天黑得较早，我们下午5点钟就吃完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因为分区魏洪亮司令员身体不好，参谋长李健同志到军区去开会，所以分区领导没有人陪同，也没有人接见。饭后作战股雷

溪股长，带领我们参观了边关村的地道。该村的地道修得比较好，人在里面畅行无阻。有通气孔、瞭望孔、射击孔；有干线、支线；能防毒、防烟、防火、防水。能容纳全村所有人员和几百人的战斗部队，形成了能攻、能守的“地下长城”。雷溪同志一面领我们参观，一面给多兰介绍、讲解，多兰不断地赞扬地道工程巨大！他经常竖起他的大姆指，表示钦佩我广大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巨大力量。

多兰来冀中九分区，主要是搜集保定、平津的敌情。这件事也事先做了布置。军区联络科的空军股刘绍光，都已通知各地外勤人员到九分区司令部集中、汇集情况。计有天津的外线交通梁超，北平的外线交通于西山，十分区的敌工干事王化玉、参谋石明等。他们先后到边关和皮里，为了抓紧时间，安排他们把已收集到的敌人在各大城市的兵营、仓库、飞机场等目标材料拿出来。然后要到白洋淀去考察，看看白洋淀冬天冻冰时，能不能停降盟军的飞机，是否有利于盟军在渤海湾登陆等。

我们参观完了边关村的地道，就休息了，准备第二天一早去白洋淀考察。夜里快 12 点钟的时候，雷溪股长来报告说敌情有变化，河间和辛中驿的敌人都向这个方向出动了，分区机关要立即转移。多兰跟我们一同向东南转移，走了十多里路，即到了任邱县与河间县交界的皮里村。已是凌晨二点了。

我们住在皮里村一户姓芦的堡垒户家中，他家是个四合院，生活不错，北房和东西厢房都是砖砌平房。为了接待贵客，房东让我们住北房，他们自己住东房。北房是一明两暗，多兰和马振武同志住西头，我和吴英民、石少

华等同志住东头，地道口在我们这个屋的东墙上，墙上挂了一张壁画，揭开壁画就是夹皮墙上的洞口。房东大娘早都把火炕烧得热呼呼的。分区给我们准备的全是里面三新的缎子被。大家很快地都入睡了。

黎明前四点多钟的时候，突然一声枪响，我首先起来了，其他同志也都从睡梦中惊醒。当时都是穿着衣服睡觉，一听见枪响，都立即爬起来。我先到院内听到敌人的骑兵已在院外的街上向北边打枪，边打边跑！看来情况很急，我立即回屋先到多兰和马振武同志那屋里，让他们立即到我住的屋里钻地道。多兰没有经历过钻地道的战斗生活，但他到冀中来已 20 多天，略知我们对付敌人的斗争方式。他在马振武、吴英民带领下，毫不犹疑地钻了洞，只不过因为他个子大，洞口小，他进地道口时费了点劲。马振武提着多兰的皮包，很快地都钻进了地道。这时，院内南边平房上已有二三个敌人，并开始向北屋、东屋射击。当时，我向房上的敌人开了几枪，以警告敌人不能轻易进屋，并指挥同志们迅速钻洞。当同志们都刚进了洞，我又从窗户外看情况，发现院子里又进来了几个敌人，有几个正在南房上对准北屋架机枪，院内又有几个敌人端着三八式步枪，气势汹汹地向北屋冲来，我当即从坑上一纵身钻入夹皮墙里下了洞。我尚未来得及掩盖洞口，伪军即进到屋内，发现了我们的洞口。我下地道后，走了约十多步，转到右边的小通道里去了，遇到了我的警卫员和石少华以及几个参谋，我们又向前钻了三四米远，发现是个死洞，只有通气孔，这才知道我们钻错了方向。进洞口向左面钻才是通向中心的地道。我当时很着急，也非常后悔

为什么到达宿营地后，不亲自观察一下地道情况呢？幸好吴英民他们钻对了。所以我们又回到地道拐弯处观察敌人动静。这时洞口的伪军们发现地道口，正在下地道，同时也在大喊大叫：“你们已被发现，快出来吧！”接着向洞口里扔了一颗手榴弹，因为我们是在拐弯处，都没有受伤。当手榴弹爆烟一散，即看见一个人正在下洞，腿已下来了，我当即用驳壳枪打了一枪，二次扣板机时，机头被土塞住扣不动了。这时听到下洞的那个伪军喊叫，“不好啦，打中我了，快拉我上去。”在上面伪军忙着拉他的时候，我们即快速通过洞口下面转到左边中心地道去，与多兰、吴英民他们会合在一起了。

这时，日军已发现多兰的照相机、日记本、地图等，并断定进洞的一定有外国人。所以，敌人便集中力量设法破坏这个地洞。敌人虽然在地道口吃了一次亏，不敢进洞了，但在上面大喊大叫：“放毒气！放集束手榴弹！”接着敌人向地道里摔进了几颗手榴弹。由于我们转到左边去了，敌人的手榴弹爆炸后，除震下许多土外，对我们毫无损伤。敌人倾听地道中无声息，可也不敢再进洞，又在上面喊叫：“放毒！”、“放水！”、“挖洞！”。为防万一，我们在洞中紧张地准备应付敌人放毒气。大家脱下棉衣展开放在洞转弯的地方，用手挖土把通洞口的方向堵起来了，同时每个人都把包头的毛巾拿下，撒上一泡尿，准备敌人放毒时捂在嘴上防毒。皮里村是防御性的蛇形地道，大部分都得弯腰走。多兰是个高个子，走动时都得匍匐前进，他进洞就卷曲着腿，弯着腰坐着，一言不发，在那儿静待事态的发展。马振武同志紧紧挨着多兰坐着，给他悄悄地翻译我

们决定的对付敌人的办法，他也一一照办。

伪军在地道口吃了亏，知道下面有武装人员，不敢从洞口下，他们想从另外的地方挖开地道。地面上敌人用镐、钢钎等挖地道的声音和敌人打骂吆喝群众的声音，以及村里一直未断的枪声，地道里听得清清楚楚。地道里非常寂静，连旁边坐着人的呼吸声都听得见。洞中黑暗、潮湿，空气又不好，但我们都很沉着，注意倾听地面上的动静。地面上敌人不时地喊：“放水！”“他们不出来，就灌死他们！”接着一股水从洞口哗哗地流下，我们既用手挖土进行导引，使水沿着主地道流向低处，流入事先设计好的蓄水井中。敌人的水攻完全失败。

过了一会儿，敌人又变换了花招，用烟熏。将大量的芦柴搬到洞口，点燃后冒出滚滚黑烟，直向洞内灌来，同志们顾不得浓烟熏呛的难受，迅速将棉袄、棉袍堵住支地道口，硝烟便从地道通气孔、了望孔缓慢地排出，敌人的烟攻又以失败而告终。

下午5时以后，地面上枪声停止了，地道中传来分区的通知：“敌人已经走了，可以出地道了”，多兰伸开了已经蹲得麻木了的腿，从洞中钻了出来。这时已经天黑了。我们在洞中共呆了十几个钟头。

出地道之后，才知房东大娘未来得及钻洞，惨遭敌人毒打。大娘一声不哼地在坑上躺着，被敌人砍伤的手，用毛巾裹着。原来敌人发现了北屋有外国人的照相机、地图等物后，断定有外国人住在她家。敌人就决定挖开地道，抓住这个外国人。他们抓住了房东大娘，逼问她地道的干线、支线的走向、位置和外国人藏在哪里？她坚定地说：

“不知道！”敌人的大刀就向她砍去，她用手一挡，手指就被砍掉了，大娘昏倒在地。当她清醒过来时，敌人又向她逼问，她摇摇头，仍然表示不知道。当人们讲到大娘为保护多兰上尉而惨遭敌人毒打，宁死不吐露真情时，我们都十分敬佩她。马振武同志翻译给多兰的时候，多兰竖起大拇指，连声说：“伟大！伟大！”

这个时候，分区司令部的同志们，也都先后从地道中出来。分区司令员魏洪亮同志见到多兰，与他握手，并关心地问他：“受惊了吧？”多兰问魏：“敌情怎样？”魏司令员说，“都退走了，我们马上准备出发。”这时，魏洪亮同志的爱人萧哲同志抱着她的孩子，一边走一边哭。她六个月的胖胖的男孩子已死了。因为洞中黑暗、潮湿，空气稀薄，小孩经受不住，不断哭啼，萧哲同志怕小孩哭啼声暴露了目标，在这紧急关头，萧哲同志为了整体利益，咬紧了牙关，用乳头死死地堵住了孩子的嘴，小孩窒息而死。对于这件不幸的事情，大家非常悲愤。马振武同志把这情况告知多兰后，多兰再次竖起大拇指说：“伟大！伟大！”并向魏司令员表示慰问！

我们迅速离开皮里村，向西南方向走去。多兰坐的花轱辘车及他的东西全被敌人抄走了，给多兰准备的吃的东西，也都被敌人吃掉或拿走了。这时已是晚间六点多钟了，一天没有吃，没有喝，肚子都已经饿得咕咕叫。因我们呆的那一段洞中灌进了水，多兰的棉衣全部湿了，而且又滚得一身泥，样子非常狼狈。他从洞中出来，棉衣即冻冰了，但当时找不到给他替换的棉衣，在这种战斗紧张的时刻，多兰也能理解，他克服困难，跟大家一样，徒步行军。

腊月的夜晚，寒冷的西北风凛冽刺骨，多兰的棉衣，被冻得硬邦邦作响。他来根据地后，没有夜间行过军，这时他也只得迈开大步在我们的队伍里急速前进。

离开皮里村三四里地，迎面来了一支部队，因判不清敌我，又折回来了。经过询问，才知是九分区的四十二地区队。原来军区获悉九分区机关被敌包围后，就急电指示九分区的四十二地区队和三十四地区队等赶往皮里村附近，待黄昏时围歼这股敌人。由于我高阳县三区小队得知分区机关被敌人包围，在西北面放枪佯攻，敌人不敢夜战，黄昏前即匆忙撤退。皮里战斗，分区领导机关没有多少战斗力，但是却跟专门前来袭击我们的敌人坚持了整整一天，关键是有地道作依托，我们依靠地道变被动为主动，既能守又能攻，既能保存自己又能相机消灭敌人。我们急行军，一气就走了近40里地，到了肃宁县的北窝头村的分区教导队住地。他们给我们烙了白面饼，炒鸡蛋。同志们一天一宿没有吃饭，都饿得够呛了，所以，都狼吞虎咽，多兰也吃得特别的香甜。

第二天，我们给多兰换了新的棉衣棉裤。我和吴英民同志研究，认为通过这次皮里村战斗，布鲁克·多兰的目标已经暴露，如果他仍留在九分区，有危险性，不如先回军区。我们把这个意见告知多兰，他没有意见，表示听从我们的安排。至于他要的情况决定让石少华同志跟九分区的同志去白洋淀，了解那里冬天结冰的情况，并照一些照片；连同保定机场的情况，也一并解决。我们把这个意见又向分区进行了报告，他们也没有意见。于是，我们通过九分区的电台向军区首长报告，同时又给多兰找了一

辆花轱辘车，早饭后让他坐上车和我们直奔军区去了。

当天下午快到军区驻地时，突然出现前方一小分队向我们方向来了，听到联络号音，才知是自己人。快到村边时，军区沙克参谋长来接我们，并向在皮里村战斗中受惊的多兰表示慰问。多兰很自豪地竖起大姆指说：“地道战！我是美国军人中第一个参加者！”

回到军区后，我把详细情况向杨成武司令员作了汇报，第二天杨司令员再次接见了多兰，并向他表示慰问。这个时候的多兰和他来的时候大不一样，他竖起拇指说：“日军必败，中国必胜！八路军必胜！”

过了几天，石少华同志从白洋淀回来，向多兰讲述了白洋淀的情况，并将摄下的许多照片送给多兰，其中有他想要的保定敌人机场的照片，这为盟军以后轰炸北平、保定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多兰认为八路军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又在敌重兵驻守保定机场摄下许多照片，这真是奇迹。他接过照片，如获至宝，连声说：“八路军英雄！八路军英雄！”

布鲁克·多兰上尉在冀中军区呆了不到一个月，他便对八路军在敌后是怎样与日寇作斗争的，有了些了解；对八路军的战术，特别是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鱼水之情，极表赞赏。他来时所抱的对我军的怀疑态度，已经一扫而光。他所要调查的情况，在我军的帮助下，也基本上搞清楚了。在他走时，军区首长又送给他一些战利品，也是纪念品：日军大衣、战刀、手枪等，真可谓满载而去。

华中反攻的序幕战——车桥之战

叶 飞

1944年3月,新四军一师在江苏淮安向日伪军盘据的重要据点车桥发动进攻,经数日激战,收复车桥重镇。自那以后,华中敌后战场的敌我态势开始转化,我军逐渐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转入反攻作战。在战法上,也逐渐由以游击战为主转入以运动战为主。此役虽已过去50余年,其情其景至今历历在目。

一

1944年2月春节前后,中国共产党苏中区委扩大会议在苏中区委驻地东台县三仓沙召开敌后抗日根据地苏中地区。到会的各分区、地委和各旅的负责人和苏中区委负责同志一起,一面就着木炭盆取暖,一面讨论形势和任务,安排新的一年工作。

1943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的一年。这年盟军在意大利登陆,意大利宣布投降,苏联红军发动了强大的冬季攻势,德军已基本上被驱逐出苏联国境,德国败局已定。在亚洲,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连续失利,遭到中国敌后各战场军民沉重打击。华中敌后也发生了变化,苏中四分区的反“清乡”、三分区的反“清剿”已取得

决定性的胜利，我军已逐步取得战争主动权。“今年消灭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的响亮口号传遍各地，但斗争仍是艰苦的，日军妄图依托大陆，作最后挣扎。苏中抗日根据地当面日伪军事力量仍很强大，各个分区被分割的局面还没有改变，领导机关经常处于流动状态。由于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地方，这对于训练干部和训练部队，以及发展生产都很不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迎接大反攻的到来，参加党委扩大会的同志经过分析，认为有必要进行一次新的战役，以改变当前的局面。我们认为取得这次战役胜利的主观条件是具备的：反“清乡”、反“清剿”斗争的胜利，使我军民斗志高昂，主力地方化以后，部队实力得到了加强，在斗争中又发展了一批次于主力团战斗力的县独立团；通过集中的冬季练兵，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都有了新的提高。同时，政治工作也发挥了威力，部队开展了群众性的拥干爱兵运动，士气更加旺盛。新的战役选择在哪里呢？会议经过分析和比较，一致同意发起车桥战役。并决定由我负责指挥这一战役。

二

车桥，是淮安城东南 20 公里的大镇，位于淮安城、泾河镇、泾口镇、曹甸镇之间，是日伪控制淮安东南宝庆地区的重要据点之一。敌伪军在车桥和泾河、曹甸、泾口一线构筑了据点，分割了苏中一、二分区。但是敌伪据点的空隙较大。这里又是日军华中派遣军驻扬州第六十四师团与驻徐州第六十五师团的结合部。两部之间配合较差，便于我军插入其结合部，以打开苏中根据地的局面，控制

苏淮边区的战略机动地区。

战役发起前，我将一团、七团、五十二团等集结于涇口、曹甸一线以东的蒋营地区。师指挥部位于收成镇。

经过反复权衡，我们决定先集中兵力打车桥。第一，因为车桥是该区敌军指挥中心，拿下车桥则涇口、曹甸孤立，便于我军尔后进攻，扩大战果；第二，车桥处于敌中心地区，又有日军驻守，敌人以为比较安全，估计不到我会绕过外围打车桥，便于我军采取掏心战术，突然进攻，出奇制胜；第三，车桥周围地形比涇口有利于攻击部队的接近；第四，车桥敌军虽然来援方向较多，但距敌两个师团驻地徐州和扬州都较远，一时得不到大部队增援。而且敌军主要增援的方向——距车桥 6 公里的芦家滩一线，有良好的设伏阵地，便于我军伏击来援之敌。

这是一场硬仗。敌伪军在车桥深沟高垒，设防十分严密。四周筑有大土围子，外壕里面还有许多土围子，沿大小土围周边仅碉堡就设有 53 座，还有许多暗堡封锁地面。里面驻有日军 40 余名，伪军 600 余名。很明显，敌人以深沟高垒对付我们，我军必须发扬高度的进攻精神，实行攻坚。我们还要准备打援。敌人控制点线，交通便利，增援容易，如果没有力量消灭援敌，也就无法拔去据点。只要援敌离开据点，就便于我在运动中歼灭他们。因此，我们把参战部队分为 3 个纵队，确定攻坚、打援同时并举而以打援为主，以 1 个纵队担任攻坚，两个纵队担任打援。

三

3 月 4 日午夜，月明星稀，车桥高耸的围墙、林立的碉

堡,清晰可见。午夜2时许,攻击车桥的七团传回来捷报,一、二营分两路向土围实行袭击。突击队员泅过外壕,同时架起数十架云梯,登上围墙,随后战士们潮涌般地过了深壕,三颗信号弹窜上夜空,北面的一、三连首先突破围墙。

占领碉堡的伪军负隅顽抗。被誉为“飞将军”的六连战士陈稻田,腰上别满手榴弹,背上梯子,冒着弹雨,飞身爬上碉堡顶盖,抡起十字镐挖个窟窿,将一连串的手榴弹塞进了碉堡,顽抗的敌人被消灭了。接着三连乘胜继续攻击伪别动大队,占领涧河以北的街道房屋,监视小圩内的敌人。

一连向围墙上的两个碉堡发起进攻时,战士蔡心田发挥“百步穿扬”的神技,飞步窜近碉堡,一枚手榴弹凌空而起,准确地从敌枪眼里投进了碉堡,突击组冲了上去,全歼驻守伪军。接着,他们又向伪军补充大队部发起攻击。

告捷的信号弹此起彼伏地窜上夜空。不到1小时,1000余健儿次第攻入市镇,向街心发展。二连泅渡了两道两丈多宽的外壕,突破围墙,在伪军尚未来得及占领碉堡时就将其大部歼灭。四连由西南角突破围墙后,越过敌火力封锁,在墙上开洞,迅速打进警察局,伪军猝不及防,全部被俘。六连泅水渡壕时,被伪军哨兵发现,前卫班奋勇前进,活捉哨兵,先后占领两座碉堡,随即向纵深发展,跃过第二道围墙,攻击东南碉堡。

5日上午10时,伪军补充大队驻守的两个碉堡,被我七团攻占,我军冲进屋内进行白刃战,全歼守敌,俘获伪

大队副以下 80 余人。11 时，伪军 1 个中队全部投降。

车桥镇上硝烟正浓，新四军三师参谋长洪学智同志率 1 个骑兵排，来到我的指挥部，带来七旅部队攻克朱圩子的捷报。三师部队的策应，保障了我师作战部队北面侧后的安全。指挥攻坚战的三旅旅长陶勇同志陪同洪学智同志进入车桥镇里，他仔细地观察敌人防御体系，称赞攻坚部队的勇猛、灵活。

下午 2 时许，车桥内的碉堡陆续被我占领，只剩下日军和伪军大队部的两个围子尚未攻克。不久，我攻击部队又以山炮、迫击炮向敌据圩子发起轰击，将敌一些大碉堡及暗堡打塌。

四

正当攻坚纵队围歼凭坚固守的日伪军之际，车桥西北的打援战斗也在打响。成为师指挥所注视的焦点。

车桥西北的打援地点选择在芦家滩一带，南有涧河，宽 20 余米，流水湍急，河岸险陡，不易徒涉；北面是一片草荡，宽约 1 里，长约 2 里，芦苇密布，淤泥陷人；中间形成狭窄口袋形地域，淮安到车桥的公路就由这里穿越。来援之敌进入这个地域后施展不开，有利于我军在这里歼敌。就在这里一团三营构筑了阻击阵地，在阵地前沿敷设下地雷；突击部队主力一营、二营和特务营隐蔽于芦家滩以北和西北一线，待机出击。

5 日下午 4 时，师指挥所接到一团报告：淮安来援日军乘坐 7 辆卡车，于 3 时 15 分进至周庄附近。根据车辆和装载量判断，我们估计来援日军约为 240 余名左右。

这天东北风大起，当地黄尘遮日，飞沙扑面。一团三营战斗警戒分队在周庄与敌接触后撤回，敌继续进至韩庄附近，进到我阻击阵地约 500 米，三营轻重机枪猛烈开火，敌军慌乱中，闯入我在公路以北的地雷阵，触发雷，引发雷，一阵接着一阵爆炸，炸得敌人血肉横飞，伤亡约 60 余，锐气大挫。敌后续部队不敢沿公路前进，便向我三营阵地迂回，企图绕过草荡，我二营发现后，立即予以狙击，迫使日军缩回韩庄固守。

根据情报，师指挥所查明：在我军攻打车桥后，驻淮阴、淮安、泗阳、涟水等地日军第六十五师团第七十二旅团的六十大队，先后在淮安集结，由山泽大佐统率，将分批驰援车桥之敌。

果然，不久敌第 2 批增援部队约 200 人又到；午后 5 时 30 分，第 3 批援敌 100 余人赶到。紧接着，第 4 批跟着到来——但由于遭我侧击，这些增援日军都猬集于韩庄。

黄昏，风沙依旧，暮色昏暗。韩庄之敌多次偷袭我三营阵地，7 时许，敌又集结主力猛攻，企图突破我正面阵地，均被我军击退。我军愈战愈勇。由一团二营和特务营组成的突击部队犹如猛虎下山，分成 4 个箭头扑向日军。六连首先攻入，进占韩庄西头。闽东红军老战士三排长陈永兴，在手榴弹爆炸声中率先冲入敌群。六班长许继胜端枪紧跟，率领战士与鬼子拚开了刺刀。日军横尸 60 余具。四连和特务营一连也分别由北、西两个方向攻入韩庄，随后五连也自东面突破，把日军截成 4 段，和敌人展开白刃战。10 时许，三营俘虏的日军军官中，有一名身负重伤而又狂呼乱叫的军官，身挂银鞘指挥刀，战士们把他抬到包

扎所时,已经死了。经俘虏辨认:正是山泽大佐!

正当敌我在韩庄展开白刃战之际,草荡东侧发现一簇簇火光。原来一部分日军由伪军淮安保安团 30 余人带路,趁暗夜从我军狙击阵地右翼徒步偷越芦苇荡,进草荡东北,遭到一团七连和泰州独立团一、三连的堵击。敌一部逃向三面环绕险阻河道的小马庄。晚 10 时许,一团一营攻击马庄之敌。三连三班班长刘作勇带领全班首先飞速越过庄北小桥,抢占房屋,经过逐屋争夺,反复冲杀,我军迫使敌人退据数间小土屋。

6 日 2 时许,经我打击,敌援兵溃乱,四散逃窜。有的跳进芦苇淤泥里,有的窜到我打援纵队指挥所附近,被警卫员、通信员捉住。天色大明后,战士们仍在到处搜捕溃敌。“活捉鬼子呀!”“缴大炮啊!”的呼喊声,此起彼伏……

正在此时,西面又响起了一阵马达声,汽车载着 120 余名日军,企图进至小王庄、韩庄一线,遭我特务营和二营拦路阻击,浑身污秽的鬼子,没命地向公路奔跑,被我一连跟踪追上,统统捉了回来。

与此同时,偷渡芦苇荡的 30 余名伪军,绕道到我师指挥附近后,也被山炮连战士一个不剩的“照单全收”了。担任曹甸、塔儿头方向的打援左纵队,则在大施河击退了来援日军。至此,宝应城以南的日本侵略军全部龟缩在据点里了。

车桥战役以歼灭日军 465 人(内俘中尉山本一三以下 24 人)、伪军 483 人、缴获 92 式平射炮两门及其它军用品无数的辉煌胜利向全国人民告捷。并由此揭开了华中敌后战场局部反攻的序幕。

五

车桥战役后，我军乘胜扩大战果。不久，曹甸、泾河、周庄、塔儿头、望直港、张家桥、扬恋桥、蚂蚁甸、蛤拖沟、鲁家庄等 12 乡镇日伪所设据点全部解放，百万人民重睹天日！人民莫不欢腾万状。

芦家滩打援部队将俘获的日军官兵陆续押送到师指挥所。师政治部敌军工作部成了最热闹的地方，远道而来的居民和战士们围看战俘，欢快地议论着。敌军工作部部长陈超寰同志告诉我，战俘们惊魂初定，感慨万千。日军炮兵中尉山本一三说“这次战斗失败，我们犯了轻视新四军的错误。”一等兵水野正一伸着大拇指说：“我佩服新四军作战巧妙，惊叹新四军士兵攻击精神旺盛。”伍长石田光夫感慨地说：“我现在清楚知道了，日本兵战斗意志，完完全全比新四军低下。”他们凄然喟叹：“皇军日暮途穷了！”

第二天，新闻台收到了延安新华社的广播“苏北新四军大捷，收复车桥”的消息，赞扬我新四军一师“以雄厚兵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第 3 天又详细报道了车桥战役的经过。

这是来自延安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鼓舞了所有参战部队和全军区的军民。车桥之战作为华中敌后战场转入反攻的标志，表明抗战的最后胜利已经在望了。

（梁国淮 整理）

用胜利迎接大反攻

——记1945年冀中我军夏季攻势的第二阶段作战

李 健

1945年6月10日至7月4日,在冀中军区发起的夏季攻势第一阶段的子牙河东战役中,我八、九分区部队,在杨成武司令、林铁政委指挥下,密切配合,英勇作战,攻克子牙、王口、沙河桥、津南庞家庄等重镇,以及大城、献县两县城,将独流至献县200余里的子牙河沿线敌大小据点全部摧毁,使八、九分区根据地,向东越子牙河,推到运河、津浦路沿线及天津以南地区。

冀中我军夏季攻势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后,我九、十分区奉命展开了以横扫平津外围据点,把解放区扩大到北平、天津、保定三大战略要点附近为目标的大清河北战役。7月1日是党诞生24周年纪念日,冀中九地委在任丘城北八里屯召开纪念大会。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陈鹏和副政委王道帮在会上勉励部队:“要胜而不骄,再接再厉,更加英勇地战斗,继续解放被敌人占领的地区。”大会结束了,人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忆着过去,期待着更大的胜利。

会后,我分区司令部(当时我任参谋长,司令员因病离队休养)立即召开了作战会议。王副政委首先传达了军区首长的指示:“我们不能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必须立即

发起夏季攻势的第二阶段作战——大清河北战役。这个战役由九、十分区并肩作战，以消灭伪治安军第七集团军主力十九团、二十团，争取解放霸县、信安、堂二里、胜芳等城镇据点，彻底打开永霸联县及武清南部地区为目标。九分区为右纵队，攻击天津西面信安、堂二里、胜芳、得胜口等重要据点，争取消灭伪军治安军十九团及伪静海道和武清县武装。十分区为左纵队，攻击霸县、独流、牛坨等城镇据点，争取消灭治安军二十团及伪雄、霸、固地方武装。十分区的战役主要方向，除本分区全部兵力外并加强军区总预备队兵力……”王副政委讲完后，我让侦察股长李盈九扼要地报告了敌我态势：“战役地区除天津外，敌伪共约为4000余人。我参战部队四个团、队，三个县支队，一个县大队，也约有4000人。从敌我数量上来看，大体是一比一。”接着，他又介绍了敌人的强点和弱点。

大家围绕军区首长的战役企图和分区的作战任务，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分区司令部作训股长雷溪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二十四团团团长张英辉、四十二区队长李吉高坚决要求担任主攻。三十八区队长贾桂荣和三十四区队政委杨栋梁，在具体打法上谈了各自的意见。我集中大家的意见，提出了围歼伪治安军十九团的作战预案：“以三十八区队附文新支队、二十四团附武清大队为战役打援部队。三十八区队先袭击胜芳，攻克后即向王庞坨北部码头镇、黄花店方向扩大战果，并向永清、安次方向侦察、监视，准备打援。二十四团先袭击得胜口，攻克后迅速进至王庆坨、堂二里之间公路两侧，处于机动位置，并向天津、杨柳青派出侦察、警戒，坚决打击天津、王庆坨西援之敌。

四十二区队附任丘支队围攻堂二里，三十四区队附肃宁支队围攻信安。作战方式主要采用强攻和坑道爆破，并以政治攻势相配合。因此，各部队要抓紧时间，认真进行坑道作业准备与强攻演习。”

最后，王道帮副政委作了总结。他同意以上决心、布置和打法，强调要深入做好战役政治工作，防止骄傲轻敌，力争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伪军治安军十九团。并提出由分区政治部刘光裕副主任带一个组到堂二里，宣传科长王功学带人到胜芳，帮助各部队加强内部思想工作和对敌人的政治攻势。

经过近十天的紧张准备，分区参战部队于7月10日夜均已到达战役出发地域，接受了分区的最后检查。12日夜沿着大清河岸分两路向战役目标地区急进，二十四团、三十八区队文新支队，由胜芳以东偷渡老大清河，远道奔袭胜芳、得胜口。四十二、三十四区队及任丘、肃宁支队进至信安、堂二里以南，先准备打击出援之敌。

12日夜晚，天气阴沉沉的，分区指挥所沿着大清河北岸向东挺进。午夜，我们进至处于信安、堂二里、胜芳三角形中间的中口村。在路上，我们已听到三十八区队袭击胜芳的枪声。到中口村时，枪声、手榴弹声震撼大地，好象近在村边。大家很高兴。看来三十八区队打得不错。随之有四个骑兵通讯员先后来送信，报告三十八区队、二十四团都准时开始战斗，并一举袭入村内，正与敌进行激烈巷战。我和王副政委一边了解和掌握作战情况，一边加强与各部队的联系。

指挥所紧张了一夜，谁也没有休息。天刚亮，我到村

边观察地形,准备指挥打援。突然听见后面有人叫“零五首长”,回头一看作战参谋白俊卿喘着粗气跑来报告:“二十四团经五小时激战,已攻克王庆坨通堂二里、信安的咽喉得胜口据点,全歼伪保安联队三大队百余人,缴获机枪三挺、步枪百余支。”我说:“好,二十四团打响了战役第一炮。你赶快报告雷股长,立即指示该团迅速打扫战场,后送俘虏,加强侦察警戒,抓紧构筑工事,准备打击由安次和王庆坨出援之敌。”

13日晨6时许,贾桂荣同志报告:“部队已攻入胜芳镇内,攻克碉堡三处,现正准备爆破,内外夹击敌人。今晚可望拿下该镇。”

这时,我们在静候信安、堂二里敌人出动的消息。但侦察员接连报告说,这两个据点敌人,将四门紧闭,只向外放冷枪,却没有出动的征兆。

当日中午,我们断定信安、堂二里之敌不会出援了。就马上命令潘永堤、李吉高同志率部于黄昏后,分别围攻信安、堂二里,争取一举攻克,全歼守敌。

晚九时整,指挥所的东北、西北方向枪炮声震耳,火光冲天,我强攻信安、堂二里战斗的打响了。

指挥所的电话铃不停地响着。

“李吉高同志吗?怎么样?打进去没有?”我问。

“部队动作很猛。火力组织得很好,敌人虽然顽抗,但由于受我机枪和特等射击组的火力压制,大都不敢露头,多系盲目射击。现在我们已从村东、村西打进去了,正向内猛插,争取接近主碉后再挖坑道,进行爆破。”从声音里可以听得出李吉高同志胜利信心很足。

“好！现在一面强攻，一面动手准备挖坑道。你们要和三十四区队比赛，看谁先攻下敌人的据点。”我又给他们加了一把劲。

这边电话机的铃又响了。白参谋递过听筒说：“是三十四区队杨政委。”

我接过机子就急不可耐地说：“杨栋梁同志，你们打得好吧！四十二区队已从两个地方打进去了！”

杨栋梁同志马上回答：“我们也打进去了！但敌人十分顽固，大、小碉堡都有很深很宽的围碉沟，不费较大力量挖坑道爆破，是不容易攻下来的……”

我立即指出：“现在一方面继续向村内攻击，力争夺取有利地形，接近敌之主碉，缩短坑道距离，主要精力应用于组织坑道作业，争取尽快爆破敌主碉；另一方面，预备队要积极改造围村沟，加筑战斗设施，把四面八方围得紧紧的，决不能让敌人跑掉一人一马。”

我立即将这些情况报告了王副政委。我俩马上研究如何迅速结束胜芳战斗，将三十八区队抽出来，对付可能从永清、安次方向来的援敌。这样有两个拳头打援，围歼伪十九团就更有保障了。

恰在这时，贾贵荣同志来电话报告：“敌人很顽强狡猾，逐街逐院与我们打游击，不肯缴枪。但我们已攻克碉堡十四座，俘获敌一部。伪军逃跑一部，文新支队正在追击。现只剩西南角两座碉堡未拿下，我正进行坑道作业，今晚可能攻克。”看来，尽快解决胜芳战斗有点困难，但问题不大了。

14日下午6时，胜芳战斗胜利结束，我歼伪静海道教

导大队大部,俘百余人,缴机枪三挺、步枪 160 余支。我们即令三十八区队连夜进至堂二里以北,准备阻击来自永清、安次方向增援之敌,并相机攻歼葛渔城、码头镇敌人。留文新支队打扫胜芳战场,掩护开辟工作,并向杨青柳、独流方向警戒,作为分区预备队。

信安、堂二里的敌人因弹药充足,拼命射击,火力十分强烈,平均每小时打迫击炮 60 余发,机步枪日夜不停射击。敌人还用挖掘、爆炸等反坑道战术与我对抗。这给我坑道爆破增加了很大困难,使我进攻受阻。

胜芳战斗结束后,我马上带参谋到了围攻堂二里的四十二区队指挥所,和李吉高、王治平、谢才琴同志一起观察了地形,详细研究了战斗动作。当即决定,一面组织突击力量,作好强攻准备;一面采取火力封锁、佯攻及在假坑道埋设地雷等办法,打击和欺骗敌人,粉碎敌人的反坑道企图,加速我坑道作业。要争取几处同时爆破后,以强攻手段一举歼灭敌人。接着,我又看望了民兵和战士们,他们虽然一昼夜没有休息,但是战斗情绪十分高昂,个个都象小老虎,恨不得一口吃掉敌人。我问他们知不知道上级对打好这一仗的要求,他们都响亮地回答:“一定要彻底消灭敌人,不使一人一马跑掉。”

到 15 日,敌人经过两昼夜的垂死挣扎,已精疲力尽,而我则一切准备就绪。下午 3 时,我开始爆破和强攻。数声巨响,烟冲云霄,堂二里的群碉被炸得粉碎。随之,突击队像数十支利剑一样刺向敌人。英勇的战士们冲进去以后很快扫清了顽敌,解放了堂二里。这次战斗,我全歼伪治安第七集团军主力第十九团的二营、三营(欠八连),

毙伤伪连长以下官兵百余,其余的从两个营长以下的官兵 600 余全部被俘。缴获迫击炮 3 门、重机枪 3 挺、轻机枪 12 挺、步枪 400 余支,子弹 15000 余发。

为了保证三十四区队围攻信安的作战,我们命令四十二区队集结堂二里西北地区,准备打击由永清方向增援之敌,并随时接应三十四区队防敌逃窜。为调动和钳制敌人,命令三十八区队配合武清大队于 16 日夜开始袭击葛渔城、码头据点,成功后,从黄花店附近进入武清南部;二十四团抽两个连从王庆坨以南进入武清,南北呼应。同时大力发动群众填沟、破路、割电线,捣毁大乡伪政权,调动和钳制武清、安次之敌伪,并令津南支队积极向天津近郊咸水沽、葛沽、小站一带行动,迷惑、钳制天津之敌。

我们刚作好这一部署,接到军区来电,说:“十分区进攻霸县受阻,固安一带敌伪集结 1500 余,附有坦克、装甲汽车,似有增援解围霸县及信安的企图。”军区除令我们迅速围歼信安之敌外,还应准备抽四十二区队带任丘支队及区小队增援十分区,围攻霸县。

为贯彻军区指示,分区指挥所决定,立即将任丘支队、区小队调给三十四区队进行坑道作业,并从分区机关抽出得力干部到三十四区队帮助坑道作业和加强攻势。

信安坑道作业力量加强后,16 日爆破了一个小碉堡,炸后我立即组织冲锋,但被敌人火力压制,未能奏效。从此日起,敌人从天津每天派来两架飞机到信安低空扫射投弹,企图稳定守敌情绪。而守敌所有碉堡及敌团部院内的水井均被我火力封锁,敌人相互不能通行,也不敢下碉堡外进一步,已 3 天 3 夜没有起火做饭,加上其电台被我

打坏,联系中断,下层开始动摇,先后有 10 余名伪军从据点内爬出向我投降。但敌上层镇压很凶,发现稍有动摇表现的,立即枪毙。所以敌火力依然很猛,我强攻仍不容易。看来,非爆炸敌团部固守的主碉不能解决问题。为此,我们又集中任丘、肃宁两支队及区小队力量,抢挖爆破主碉的坑道。不料数次接近碉堡,都被敌人用挖沟、埋设迫击炮弹、扔集束手榴弹、扇烟、浇水等手段破坏了。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又用佯挖欺骗敌人,吸引敌人注意力,声东击西,将坑道改向另一方向,并尽量轻巧挖掘,避免敌人发觉,同时用严密火力封锁敌人,使其不能接近真坑道的地面。经过两昼夜的坚苦斗争,于 17 日黄昏将坑道挖到敌主碉下,这时又发现碉基是水泥与柏木桩,挖不进去。如用力凿劈,震动大又易被敌人发觉。我们紧急召开“诸葛亮会”研究,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与此同时,我们还加强了政治攻势,利用在堂二里俘虏之伪二营长,对伪团长孙宾年喊话;同时,我们对敌士兵讲政策,晓以大义,使其士气更加低落。

18 日 2 时整,我军在坑道爆破的同时,发起猛烈强攻,一举成功,敌大部投降,少数抵抗被俘。驻信安的伪治安军十九团团直、一营和三营八连及伪治安军第七集团军指挥所同时被我全歼。生俘伪团长以下 500 余人,缴迫击炮 3 门、轻重机枪 11 挺、长短枪 400 余支、马 100 余匹及大批装备物资。

至此,驻堂二里、信安的伪治安军十九团及第七集团军指挥所,经六昼夜围攻,被我干净彻底全部歼灭,未跑掉一人一马。

19日，冀中军区杨、林首长来嘉奖说：“信安、堂二里战斗的胜利，将据守该地之伪治安军第七集团军指挥所与辖十九团团直、3个营部、11个整连全部歼灭，创造了冀中平原歼灭战的范例……”

随着信安、堂二里歼灭战的胜利，三十八区队、二十四团将武清地区彻底打开了，天津以西除王庆坨、黄花店、东府港以外，武清地区全部解放，天津西部完全暴露在我军威逼之下；津南支队也攻克了距天津十余里的咸水沽，逼退了津南大泊据点，控制了塘沽南渤海岸100余里，天津南部也暴露在我军威逼之下，形成了兵临天津城下的有利战略态势。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我在 延安的学习生活

王 兆 相

1938年初到1940年，我在延安先后进抗日军政大学瓦窑堡大队和中央马列学院学习近两年半左右时间。通过学习，我在政治思想、文化、军事素质上都有了很大提高。在此期间我有幸接触到了毛主席及许多中央首长，多次聆听他们的亲切教诲，直接得到他们的帮助教育，他们的言传身教和艰苦朴实、平易近人的作风，使我受益非浅。尤其是毛主席对我学习生活上的关怀，一直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诚 挚 的 关 怀

1938年2月，我与张达志同志、孙超群同志等带领警备六团在八路军总部和120师的领导下驻守晋西北偏关、清水河、平鲁、五寨一带，负责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当时是国共合作抗日初期，形势有一定好转后，经我要求，总部同意我到延安学习。

我在1938年3月到达延安，先去见了滕代远总参谋长，他问我在进“抗大”以前，是不是先见见毛主席，我忙

说：“那太好了！我早就盼着能见到毛主席了。”记得从晋西北 120 师师部出发前，贺老总还托我到延安后一定向毛主席转达他的几句话。我当时想，毛主席每天日理万机处理那么多党政军大事，哪会有时间来接见我呢。现在滕代远总参谋长提出来，那当然是我梦寐以求的了。他说：“那好，你先在招待所住下等两天，我与毛主席联系后再通知你。”而后我又去拜见了留守兵团萧劲光司令员，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向他们谈了警备六团在晋西北的防务情况，也谈了一些神府的情况。两天后，毛主席的秘书来电话，说毛主席准备接见我，让我快去。当时毛主席居住、办公的地点在延安城北门内三孔石窑洞内，我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向主席住的窑洞快步走去。我到达毛主席住处后，毛主席的秘书说，你在我这儿先等一会儿，毛主席正在和张主席（张主席即张国焘，在这之后不久，四月份清明节时张国焘即借口到黄陵扫墓叛逃）谈话。我坐了一会，张国焘便出来走了。秘书叫我到主席办公的窑洞去，我一进门看见主席正手拿烟卷站着沉思，我立正向毛主席敬了个军礼，并说：“报告主席，我是警备六团王兆相。”毛主席笑着走过来，一边伸手，一边说“知道，王兆相同志你好啊，快坐下，滕代远同志说你来延安学习，这很好……”我开始有点拘谨，看到毛主席是那样平易近人，那样诚恳热情，我紧张的心情也逐渐平静下来了。毛主席问了许多晋西北根据地和神府根据地的情况，从谈话中我感觉到，毛主席对前线、对晋西北根据地的情况了解得很多，也很细。记得当时我在汇报时，有些问题没讲清，没讲对，主席很快就作了纠正。对神府根据地的情况也是如

此。在谈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时，我把贺老总在我临走时托我转达给毛主席的话也讲了。我说：“主席，贺老总让我转告你，说他不识几个大字，也请求去学习，提高提高文化知识，到苏联去或到抗日军政大学去都可以……”毛主席听后慈祥地笑了。主席一边抽烟，一边笑着说：“啊，他不能去学习，晋西北根据地的任务很重，工作不允许他贺老总去学习啊！”在我汇报中主席总是笑着点头，并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我们谈了约一个小时左右，毛主席对我说：“你文化低，这次进学校要好好学习，你在根据地的创建中作了不少工作，有许多好的经验，但是不会总结，你一定要抓住这个学习的机会，学好了才能更好地去做工作……”。这时，秘书进来说有人要见主席，我站起来说：“主席，你很忙，不耽误你的时间了，我一定好好学习。”毛主席笑着握住我的手说：“好！”我向毛主席敬了个礼，转身向门口走去，毛主席一直把我送到窑洞门口才回去。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我没想到毛主席是那样平易近人，待人是那样诚恳热情，对我又是那样关心。我下决心一定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素质，不辜负毛主席对我语重心长的教导。

抗大的军事学习生活

总部通知我到抗大报到，那是在1938年3月，毛主席与我谈话后不几天时间，萧劲光司令员送了我一套衬衣，给了我十块钱，我就去“抗大”报到了。

当时，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是林彪，副校长是罗瑞卿。我去时许光达教育长接见了，他告诉我：“抗大”校内目

前有一个第三期高级班,现在已学了一段时间了,但还没结业,你先到这个班学一段时间,等第四期高级班成立时,你再转到第四期从头学起好了。

第三期高级班班主任是李寿轩,学员大部分是四方面军长征过来的高级干部,记得我们一个小组的同志有杜义德、王宏坤、王树声等,许多我都记不起来了。我和杜义德睡在一个土坑上。在这个班,我只学了两个多月就结束了。

在这个班里我听过陈伯钧讲的战略战术和其他领导同志的许多课程。影响最深的是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报告,他深入浅出的讲解,使我这个还不会记笔记、文化水平很低的人,都记忆犹新。我记得主席讲道:“我们在大革命失败后,不应该放弃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的旗帜,我们应该把这面旗帜举得高高的,号召群众。”“我们许多同志不了解我们现在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认为现在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有同志认为就是共产主义革命了,这是不对的。”他举了个例子说,“在红军长征时,我每到一个地方总要找一些报纸、书籍来看。一天我到一户地主家,看有没有报纸或书籍之类东西,地主的老太太一见我就说,昨天他家已被共产了,这些东西都没了。你们看,她就把我们搞的视为共产主义了。我们许多干部也说不清现阶段的革命性质,大家应该明白,我们现在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更不是共产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还得许多年……。目前我们对爱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是不会进行打击的,我们打击的是封建地主买办、官僚、帝国主义这三座大山。如果要进行社会主

义革命，还得走许多路，就像我们从这里出发要转个弯，才能走到延安北门口外一样，不是一步或几步就能走到的。”听过毛主席这次讲话后我才明白了，我们过去打土豪、分田地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次讲话对我印象很深，所以至今已几十年了，主席讲话的大概意思我还能想起一些。主席的报告很大众化，很容易听明白，他就像和你拉家常话一样，慢慢讲解，对我们这些没啥文化的工农干部来说，听起来格外亲切明了。

4月份，“抗大”三期高级班正式毕业了，许教育长找我谈话，他告诉我，“‘抗大’四期不成立高级班了，只在‘抗大’瓦窑堡大队成立一个红军干部支队，你到那里去学习怎么样？”我说：“当然可以。”这样我又转到瓦窑堡大队学习。当时瓦窑堡大队大队长是苏振华，政委胡耀邦，一支队队长是詹才芳，副队长徐德操兼一支队队长。一队是军事干部队，二队是政治干部队。我分在一区队一班，先后担任过班长和区队长。我们上课的地方原是国民党骑兵的一个大的马厩，经稍加整理就成了我们的课堂。几十个人挤在这个马厩里，三块砖头垫起来当凳子，膝盖就是可移动的桌子。在这里既学习文化政治课，又学习军事课，班里大多是各地区来的红军军事干部，文化水平都不高。我这个只读过三年半书的人，还算个小知识分子呢。所以班上让我给大家讲文化课中的一些成语和小故事。

我在参加革命前种地、放羊多年，那时，一边放羊，一边拿武侠小说《三国演义》、《水浒》等看，字不认识就问人，实在找不到人问时，我连猜带蒙也了解了一个大概，那些年，我稀里糊涂也看过不少书。没想到在这个班里，

我这点文化水倒有用了。这个班还有一些同志一天学也没上过，我比他们就又强多了。我当区队长，负责带队出操，做军事动作。那时军事班主要是学军事课，教材就是苏联红军的战斗、战术条例，排、连、营、团的战术。记得我们队还到野外进行了一次实战演练。1938年8月1日前，全大队还开展了一次迎“八一”的学习军事技术运动，全队苦练站、跪、卧姿的射击战斗动作。班上虽然都是各级连、营、团以上干部，但大家学习都很刻苦。记得那时衣服少，我们连换穿的衣服都难找到，做战术动作时，我的裤子磨破了，就干脆把膝盖以下剪掉，当作短裤穿。结果在练战术动作时，膝盖都磨出了血，结了厚厚的茧子。我们的政治课则主要是学习党的建设，社会发展史。在抗大四期的这段军事政治学习生活，是我自参加红军以来第一次比较正规的学习，学到了不少东西。

学到11月底、12月初时，形势有了变化。据情报说，日本军队即将进攻西北抗日根据地，中央决定如果这样我们就和敌人“换防”，敌人如到陕北，我们就到敌人后方去，到他们的心脏地方去。所以决定抗日军政大学搬迁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当时我们正在学习团的战术条例。一天，罗瑞卿副校长和训练部长陈伯钧同志来瓦窑堡大队，讲了抗日形势和日军的动向及中央的战略部署，同时讲了学校如何搬迁，有的班将提前结业等等。陈伯钧讲到军事队时说，军事队课程还没学完，但形势要求也只有提前结业回部队了，你们其中有一些干部已有许多实战经验，像你们队中的贺炳炎、王兆相，这些同志已参加过多次战斗，回部队仍然可以在实践中去学习提高吗。就这样，我

们于12月结束了“抗大”生活。

这段“抗大”正规化的学习生活对我帮助很大，对后来我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东北解放战场及南下在各个解放战场上的工作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抗大”生活使我多年来的游击战生活养成的非正规化习惯得到了一定纠正，培养了过军事集体生活的好习惯。更主要的是通过“三期”、“四期”抗大紧张的学习生活，使我在军事知识上有了较大的提高，同时，学到了不少革命理论知识。

在马列学院的学习生活

1938年12月，在“抗大”瓦窑堡大队毕业后，我急着想回晋西北警备六团去，总政组织部方强同志通知我先到延安留守兵团去见萧劲光司令员。在延安萧司令告诉我：“警备六团最近决定调到延安来，你现在回去路上拖的时间长，还没到晋西北根据地，警备六团就该出发了，你不如就在延安等一段吧。”我说：“那我这段时间干什么呢？”萧司令说：“我看你不如先到党校或马列学院再学习一段时间，毛主席不是也让你多学习吗，正好这也是个机会。”我说：“我可真想马上回部队去。”萧司令说：“那好，你去见见谭政副主任，看他的意思如何。”然后他给我写了封信让我带给谭政副主任。信的内容还是留我在延安学习，暂不回晋西北根据地，在延安等警备六团回来。谭政副主任看罢信，说：“萧司令的意见我同意，我看你还是留在延安等部队吧。我们许多同志在战场上滚过来，滚过去，不容易找到学习时间，我还专门到莫斯科学习过一回，你现在有这么个机会学习，我看这很好，我先介绍你

到马列学院学习一段时间吧。”就这样，我出了“抗大”校门没几天，又于1938年12月初进了延安马列学院。

马列学院是中央最高学府，院长是当时的党中央书记张闻天同志，副院长是王学文，是经济学家，人非常和善。这所学校工作人员还不到20人，教员均由中央首长和中央机关的一些干部兼任。学员是来自各地参加革命的高中、大学及留学回来的知识青年和参加革命较早的团以上干部。我这个从小放羊、只念过三年书的军事干部到这个最高学府来学习，当时心里真有点胆怯。但没想到警备六团因故一直没回到延安来，而我在这里一学就学了一年半时间。

到马列学院后，又赶上二期没毕业，三期还未招生，学院又决定我先在二期这个班学习，等三期开课后再转到三期去。当时马列学院每期只有一个班。于是我又插班到二期听课。二期、三期这两个班的学员中既有参加革命较早的阎红彦、谭余保、徐海东、张秀山、汪东兴、马洪等同志，也有许多文化水平较高的年青知识分子，当时丁玲、江青、孙维世也在这两个班先后学习。4月份，三期开办后，我就转到到三期学习了。

当时我们的教室是由一些用木头柱子搭起的草篷顶大房子，每期100多人都是在此上课，没有课桌，和“抗大”学习时一样，膝盖就是每个人的课桌，两边放几块砖头，上面搭块木板就是我们的凳子。学校的课程很多，刚开始时我听起来非常费劲，就像整天驾在云雾里一样，记得教员和同学们讲什么偶然与必然，相对与绝对，我都莫名其妙，不知怎么回事。张闻天同志和艾思奇同志都鼓励

我说“王兆相你文化低，也别着急，听不懂可以多问，这不是短时间能补上来的，今后要多看点小说，像《三国演义》、《水浒》之类的书籍，这样可以增长许多文化知识。”在学习上我是很用功的，我完全靠眼看、耳听、脑记。动手记笔记的能力很差。即使这样，我当时还是觉得有关马列主义、党建、新民主主义、世界革命史等知识我学得还是不错的。政治经济学、哲学就比较难懂，学起来也相当困难。

政治经济学由王学文副院长讲，他和孔祥熙、马寅初都是同学，常给我们讲他们之间的关系。他讲课很有耐心，每次都怀抱一堆书放在讲台上，慢慢地讲着。艾思奇同志讲哲学课。他们都很关心我。但我和同学们一样，最喜欢听毛主席讲的新民主主义和陈云讲的党建课。陈昌浩讲的世界革命史也很吸引人，他语言丰富，故事性也强，大家很爱听。毛主席和陈云讲的都是我们革命斗争中的现实问题，通俗易懂，语言生动。还有张闻天讲的是战略策略，王明讲统一战线，陈伯达讲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杨松讲中国革命，吴黎平讲马列主义，许多课程我开始学习时总摸不着边，很吃力，后来在首长和同学们的帮助下逐渐走上了轨道，基本能跟上学习的进程。

陈云同志讲的《党的建设》对我影响很深，他讲党的建党历史，党的工作方法，党的任务，党内思想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等等课程。记得有一次他讲党内思想斗争时，批判了一些不正确方法。他说，在我们党内思想斗争中，有些同志首先不是摆事实、讲道理，他们动不动就给对方扣大帽子，特别是有一些年青的同志，他们像我这样

……，陈云同志学着把自己的拳头举过头顶说，他们在批判别人时，把拳头举得高高的，帽子扣得大大的，不让被批判者说话，这样做能让别人服气吗？陈云讲，批判应对事不对人，不要动不动就不让别人说话，拿拳头把别人吓住，拿帽子把别人压住。应该首先把对方的缺点甚至于错误都摆到桌面上来，用事实来说明问题，由被批判者本人按照他的缺点、错误的大小，找一个最适合他本人的帽子去戴，你给他强加的帽子不是大就是小，他戴着也不舒服吗。

陈云在讲到要纠正党内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时，针对马列学院内一些议论，谈了绝对平均主义是错误的。他说，马列学院招生有一个原则规定，但在目前情况下，有些特殊问题我们只能特殊处理。我们这些年来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不少革命同志，他们留下的子女我们不照顾谁去照顾，让他们到马列学院来学习有什么不对的？这也是为革命培养人才吗。至于有人对一些文化低的老同志来马列学院学习有看法，认为只有大知识分子才能到这儿来学习。你们知道这些老同志都是在战争中冲杀出来的，你们可以去数数他们身上有多少伤疤。他们文化低，更应该学习提高一下文化水准，这样不就可以为革命做更多的事吗？

在讲培养干部的问题时，陈云同志说，我们其中个别年轻的同志认为自己是读过高中，上过大学，留过洋的，现在又在中央最高学府学习，将来毕业出去，理所应当给个省级干部职务当。我说，那是不行的，马上让你去做个省级干部，你是干不好的，对你们也不好。你们有文化、有

理论,但欠缺革命实际经验,工作上的经验靠积累,万丈高楼平地起,你们出去后应先去当区干部,支部干部,以此来积累经验和工作方法,将来才做更多大事。

在讲党的工作方法时,陈云同志举了个例子,他说,我们有一个部队,为了做抗日友军的统战工作,曾派一个旅长到相邻的国民党抗日友军去做友好拜访,联络感情。结果我们这位同志去后,坐下就给别人讲抗日的大道理,根本不容别人有说话的机会,自己讲了大半天,最后问别人有什么可说的吗,别人莫名其妙像听训话一样听了半天,还能有什么说的。结果我们这位旅长就认为已完成拜访任务,抬起屁股就走了。这哪里是去联络感情,哪里是友好谈话。谈话、谈话,是双方说话,通过双方说话进行友好交流。只有你一方说话,那叫什么谈话,叫什么交流。你们出校门工作后,千万注意,在谈话中一定要多听取别人说什么,让别人把话说完,绝不能武断式的训话,可别像那个旅长一样。

在讲党的斗争时,陈云说,为什么我们本来还好的一些同志,后来也走向犯错误甚至犯罪道路呢,这绝不是他生来就坏,而是逐步发展变化的。譬如我们有一个司务长,他负责会议招待,当人都走光后,他看到桌子上有香烟,就顺手拿了一支抽了,也没人说什么,第二次招待后他又拿了两支烟抽了,这回也没人说什么,后来他干脆把剩下的一盒烟也放到兜兜里了。就这样,他的行为始终没人理,没人批评,结果他胆子越来越大,什么都敢拿,最后成了贪污犯。如果一开始发现我们就提醒他,批评他,他就不会后来成为贪污犯了。

一年多时间我听过陈云同志很多课,对我印象很深,受到很大教育。陈云同志不但课讲得好,而且作风朴实、平易近人。

记得有一次下课后,正赶上外面下着大雨,陈云同志挟着书走到门口,停下来卷起裤腿,把鞋脱下挟在胳肢窝里,打起伞就往外走,正好我也走到门口,惊奇地说:“陈部长,你怎么脱鞋光着脚在水里走?”他笑了笑说:“这样好,鞋沾上泥水容易坏,又不好洗,脚脏了回到家一冲一擦不就干净了吗。”他就像没事一样在雨水中大步走了。我站在门口看着很感动。我们的中央首长,不但在政治思想、文化理论上是我们老师,他们在生活作风上也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马列学院一年半时间的学习生活,对许多课程,我由听不懂到逐渐听懂并理解。通过学习,我深深感觉到自己的眼光看得远了,视野更开阔了,对共产主义、对党的信念更坚定了,对抗战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多年来我一直是在陕甘、陕北、晋西北战场上与敌人浴血战斗,所以思想深处一直有一种单纯军事观点,认为建立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战斗中的胜负都全靠枪杆子。到延安后,通过在抗大和马列学院的学习,才使我真正体会到了学习政治文化理论知识的实际意义。

到抗日最前线去

1940年5月,我从马列学院毕业,即将走上新的岗位,在延安经过8个月的抗大学习,一年半左右的马列学院学习,我不但在文化素质和军事素质上有了提高,更主

要的是政治思想、工作方法、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等许多方面都受到了很多的教益。通过两年半左右的学习生活，我的思路和胸怀开阔了，我认识到自己应该到更广阔、更艰苦、最需要我的抗日前线去，不能总是守着自己多年的老部队和战斗了多年的家乡。所以在毕业前夕，我就主动向总政治部谭政副主任提出，希望到最艰苦的抗日前线去。后来谭政副主任找我谈话，他说：“你的这种要求和决心是很好的，警备六团在晋西北，原准备让你接警备三团的工作，既然你提出到其它根据地去，我们研究一下可以让你到新四军去工作。”我问谭政副主任“七大”何时召开，因我当时已被马列学院选为参加“七大”的代表。他告诉我，我可以在参加完“七大”以后再走。我又到留守处萧司令员那里，向他报告“总政同意我到新四军去工作”，萧司令员听后感到有点突然，他问我“怎么叫你去新四军？谁告诉你的？主席知道吗？和你都谈了些什么？”我告诉他：“离开延安到其它根据地去是我自己向总政提出的，主席是否知道我不了解。”萧司令员听后“啊”了一声，接着说“我们原想你对陕北情况比较熟悉，在这里工作起来方便些。警备六团不回延安了，准备让你去接警备三团的工作，现在你要求到其它根据地去，这样也好。陕北同志不一定非留陕北工作，换个工作战斗的环境，离开自己熟悉的部队，熟悉的地区，也是个更大的锻练。”

5月份我在马列学院正式毕业。总政组织部长胡耀邦同志通知我先到延安小砭沟招待所住下，等参加完“七大”后再去新四军。我在小砭沟休息了一个月之久，其中除有时仍参加一些边区党、政、军的会议外，就是参观学

习。后来总政通知我，去新四军的路不通了，让我先到留守兵团的一些部队参观，当然这也是一种学习。一天晚上，忽然总政组织部长胡耀邦同志找我谈话，他说：“新四军目前去不了，道路被封锁无法通过。你是‘七大’代表，但中央决定目前‘七大’延期召开，何时召开还没定，中央意见要你去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你看还有什么意见？”我马上回答：“我完全服从组织决定，到山东抗日前线去”。胡耀邦同志说：“那好，明天你就走如何，因为送给晋东南的一些物资已经准备好上路了，你和他们一块儿走，部队送你也方便”。我问他：“我爱人在延安‘女大’学习，能否与我一块儿走？”胡耀邦同志说：“你可以带爱人一块走，中央刚作出决定，团以上干部可以带家属到敌后工作。”我说：“那请胡部长把我爱人从‘女大’调出来，我们后天出发行吗？”胡耀邦同志说：“行！我明天就把你爱人调出来。”接着胡部长又说：“不过有件事，真对不起，本应该配给你枪支、弹药、马匹，但总政本身也很困难，好在你就是陕北人，自己去活动枪支、弹药、马匹、人员，我负责批给你路费”。第二天上午，我找到王世泰同志，他给了我一匹马，一个马夫。我原来就一直带着一匹马和一个警卫员，枪支弹药我从留守兵团全搞到了。这样我们就有了四个人、两匹马。当天下午胡耀邦同志就批给了路费。

第三天清早，我们在战友们的簇拥下，从小砭沟一直走到桥儿沟，大家才依依不舍地道别。我骑在马上回头望着仍站那里渐渐远去的战友，望着远处那高高的宝塔山，望着那抚育了无数英雄儿女的山山水水、沟沟壑壑，我思绪万千、心潮澎湃。我回忆起与战友们创建根据地时的艰

苦战斗历程，回忆起在延安“抗大”、马列学院学习的日日夜夜，回忆起毛主席及各位中央首长对我的关心和谆谆教导，我在心里默默地立下庄严的誓言：毛主席、各位首长、战友们，我将永远铭记你们的教导，好好学习，英勇战斗，为了祖国，为了民族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

（王廷生 整理）

抗日烽火中的晋察冀妇女

田 秀 涓

1937年9月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后，聂荣臻司令员奉党中央之命，率115师所部3000余人，向五台山地区挺进，开辟和创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边区1000多万农村妇女，也成立了村妇救会和妇女自卫队。她们在8年抗战中，成为坚持抗战、建设根据地的一支重要力量。我曾任边区妇救会主任，和她们共同经历了残酷而光荣的抗战岁月。

组 织 起 来

边区农村妇女在抗日战争前，长期处于封建思想束缚之下，绝大多数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家庭生活上处于非人地位。抗日战争以后，她们耳闻目睹日寇的奸淫、烧杀、抢掠的残酷暴行。为了求生存、保家乡，她们和男子一样，投入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洪流之中。在8年抗战中，经过向妇女和社会宣传男女政治平等，妇女有抗日自由的权利和责任，边区政府逐步吸收青老年和各阶层拥护抗日的妇女入妇救会，结成了团结抗日的妇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根据边区政府公布的自卫队条例，组织了妇女自卫队，在维持后方治安，完成支前任务，以及

参加生产、学习等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经过抗日斗争的锻炼妇女们能够有组织、有纪律地参加大、小集会，发表意见。每年都举行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活动，并检阅经过军事训练的妇女自卫队。她们知道妇救会是自己的组织，各级政府都有妇女参政人员，她们给妇女撑腰鼓劲。法院审理妇女受迫害案件，县妇救会可派人参加陪审，代表受害妇女说话。妇救会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妇女的政治热情高涨。曾有一首歌谣：“妇女一入妇救会，不怕辛苦和受累，会写会念还会算，下地干活更有劲。”

全力以赴为抗日

一、搞好后勤，支援前线。

保证供应八路军的衣被鞋袜。边区广大农村，是八路军分散的被服厂，而妇女就是厂的义务工人。军衣军被的缝新补旧，做军鞋袜，都由妇女承担。军鞋由村妇救会检查质量，除大量上缴外，村中常留一部分随时慰劳战斗后及过路的八路军。她们每年平均每人做军鞋七八双到十几双，少数妇女有做30多双的。八路军走山路，军鞋要坚固耐穿。阜平县高街村的军鞋最有名，拥军模范戎冠秀，为推广“高街鞋”，要村儿童团编歌谣送给妇女们唱：“高街鞋，不平常，双双辑鞋口，对对斤二两。前五趟，后四趟，腰里密密纳三趟，底大帮子小，穿上可脚打胜仗。”1940年百团大战时，仅四专区妇救会，就捐军鞋10万双。

抬担架、运公粮、送弹药。这是艰苦的负重工作，妇女们能认识到这是支前的光荣义务，有时冒着炮火，将伤员

抬下战场,包扎好伤口,再将伤员送到后方医院。

运弹药、电线和公粮,是部分青壮年妇女常担负的任务。特别是1941年日寇“蚕食”根据地,对根据地中心区实行“封锁”和“禁运”之后,平原产粮棉区,都成为近敌区和游击区,妇女们承担的运输任务,就更为艰巨,当时采取组织中心区男女自卫队夜间赶赴产粮区,把粮运到根据地。对于禁运的粮、棉、药品和文具等,除夜间大批组织运送外,还在日间分散组织妇女,装成孕妇和病妇坐大车看病,以合法的手段,从冀中平原和日寇据点通过封锁线,运回到根据地,积少成多,保证了部分军需和民用,妇女们说:“敌人再封锁,也封锁不住我们的腿,封锁不住我们抗日的心。”

交公粮慰问八路军,优待军属。交公粮时,妇女们的任务是把粮食晒干扬净,簸除碎米和糠,拣掉砂石,争取多交早交。募集慰劳品,慰问战斗后和过路的八路军,是村妇救会的经常任务。夏季一听说要过部队,马上烧开水、煮绿豆汤和鸡蛋、蒸馒头,妇女儿童在村口迎候,把食品塞到战士口袋里。村妇救会还组织妇女给军属代耕、压绿肥,给老年军属拆缝衣被等。

站岗放哨、除奸、侦察敌情和传送情报,掩护干部过封锁线。妇女自卫队和儿童团,相互配合在村口放哨查路条;老年妇女在村内,以高度警惕的眼睛,随时提防着汉奸敌特的活动,有可疑人即交村公所及自卫队处理。她们还利用敌寇对妇女行动不太注意的特点,化装进敌据点侦察敌情,并机智地通过敌据点或封锁线送情报。有些老壮年妇女,为掩护干部过封锁线,装成串亲的母女,陪着

青年女干部,并掩藏好文件,通过敌寇据点和封锁线。如1939年深秋一个夜晚,山西省定襄县师湾村妇救会主任孟玉华,曾护送中妇委考察团成员严慰冰,她们装成母女串亲,过了滹沱河、同蒲铁路支线、窑忻公路三道封锁线,行程10余里,到达安全地带。就这样不管月夜霜晨,孟玉华护送了无数干部过封锁线。

掩护、救护干部及伤病员。在近敌区和游击区,常遇敌寇搜查,住在群众家中的干部和伤病员,来得及就进洞掩藏,来不及就装做房东的儿子、丈夫和儿媳,随手做家务劳动,或躺在炕上装病,由房东老壮年妇女勇敢机智地对付敌人。为掩护藏在地洞里的干部伤病员,妇女常遭日寇的毒打,甚至牺牲了自己或亲人的生命。她们对八路军的伤病员关怀备至,常以家中最好的食品调剂营养,并细心地为他们换药和服药,使他们早日康复后再立功。北岳区“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冀中区“子弟兵的母亲”李杏阁,就是群众中涌现出的千千万万个拥军模范的代表。

二、送亲人参加八路军

参军是坚持抗战、保国、巩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任务。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妇女们送子送夫参军常展开挑战竞赛,当时的口号有:“丈夫去当兵,妻子把田耕”,“男子上前线,后方工作妇女干”。经过宣传教育,妇女们懂得:“有国才有家,打走日本鬼子才能过平安日子。”她们以巨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宁愿自己多吃苦受累,甚至忍受亲人牺牲的痛苦,也积极动员亲人参加八路军。在1937年冬,平山县就动员了1000多名青年参军,编入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成为有名的平山团。还有曲阳营、平山营,

以一个区、村参军青年组成一个连、一个排、一个班那就更多了。1940年望都县柳陀惨案后，为报仇雪恨，青抗先队长带领几十名青年参军，被上级命名为“柳陀排”。在参军的热潮中，现出了不少“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的生动事例，当时在边区传为佳话。

三、武装参战，大打人民战争。

面对日寇频繁的“扫荡”和“蚕食”，八路军和地方武装摆开了人民战争的战场，创造了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地雷战、地道战和破击战。在地雷战中，妇女不仅做地雷、埋地雷，还组织了妇女爆破组，出现了不少女爆破手和爆破英雄；地道战是平原地区群众斗争实践中的智慧结晶，这些地道网纵横交织、户户相通、村村相连、既能藏、又能打。地道内掩藏干部、伤病员和群众。壮老年妇女，担负伪装洞口的任务，以保护地道中掩藏人员的安全；破击战是动员男女自卫队，破坏敌寇的铁路、公路交通、运输及通讯联络，袭击敌仓库、工厂和据点。有时，部队和男自卫队打进据点，扛出了子弹等胜利品，妇女们接力运回内地，她们高兴地说：“我们也参加战斗了！”男、女自卫队在夜间常去破坏交通、割电线。有一次完成任务撤离时，有个妇女丢了一只鞋，第二天日寇见到后，恐惧地说：“中国不得了，妇女们也来打我们了！”

“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

凶残的日寇，为了消灭我主力部队和实行“三光”政策，在袭击包围我村庄和“扫荡”我根据地时，制造了无数起惨案。他们逼迫群众指出干部和八路军，说出粮食和军

械藏在哪里。群众为保守机密，坚强不屈，英勇斗争，常遭到日寇集体枪杀、活埋，日寇甚至采用挖心肝、取脑髓、割妇女乳房、用刀片割大腿肉、推下崖底等不下百余种杀害中国人民的酷刑。受害者多数是妇女、儿童及老人。从下面一首当时流行歌曲中，可看出日寇的残暴和群众的斗志。1943年5月7日河北省完县野场惨案后，名作曲家李劫夫谱写了一首《忘不了》歌，歌词是：“忘不了五月七日那一天，完县野场石沟的大惨案，我们同胞流尽了鲜红的血，也流下美名万古传。忘不了敌人摆下了天罗地网，包围了隐蔽石沟的老乡，四下里架上机关枪，妄想威胁他们全投降。忘不了张竹子和王朴^①，当时鼓动大家宁死不投降，模范的母亲和民族小英雄，真是边区人民的好榜样。忘不了敌人向他们逼供，他们一致回答‘不知道’！血可流，秘密不可露，伟大的民族气节冲云霄。忘不了机枪狂扫射，扫向老人妇女和儿童，我们118个老乡，一致高声大骂壮烈牺牲。忘不了残忍悲壮场面鲜血流在地面，尸骨堆成山，死后的母亲还奶着婴儿，重伤的孩子还把亲娘唤。忘不了血债如山，仇恨似海，我们一致宣誓：团结复仇，坚决和敌人干到底！不把敌人消灭恨不消。”

还有许多妇救会干部和女区长、村长、村妇救会主任，为了保守机密，掩护群众，在日寇面前挺身而出。以“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英雄气概，壮烈牺牲在日寇的屠刀下。英烈们的鲜血，洒在边区土地上，我们将永远怀念那些不朽的民族英雄！

^① 张竹子是村妇救会主任，王朴是其子，为村儿童团长。

劳武结合开展大生产运动

由于男子大量参军、参战，男劳力减少，妇女们参加了以前很少参加的农业生产，学会了全部或大部分农田技能。1942年及1943年由于日寇的“蚕食”、“封锁”和自然灾害，边区妇女除参加农业生产外，又开展纺织等各种因地制宜的副业“生产自救”活动，解决了穿衣、零用和部分吃粮问题。少数妇女，除解决全家吃穿用外，还置买了土地和牲口。1944年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边区妇女开展了换工互助、家庭会议、定户生产计划的群众运动，形成大生产运动的高潮，为大反攻奠定了雄厚物质基础。边区的生产，为适应对敌斗争，采取了“劳武结合”的办法，与敌寇展开“寸土必争”、“粒粮必夺”的斗争，日间敌人将粮食抢走，晚上组织民兵抢运回来。当时的一首流行歌曲唱道：“战斗生产，战斗生产，晋察冀的人民越打越勇敢。一只手拿锄头，一只手拿枪杆，敌人来了就坚决地打！敌人‘扫荡’也坚持生产……”这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妇女们为国家、社会和家庭创造了财富，解决了艰苦抗战中的军需民用，也更受到家庭、社会的尊敬。

积极参政议政

边区政府成立后，1938年在建设村政权中，妇女们行使了从未有过的选举权，有的妇女当选为村代表、委员或村长、村副。1940年宪政运动，广泛宣传三大条例和选举须知，更深入地发动妇女参加民主选举。她们很珍惜这一

神圣的权利,有的参加竞选,登台宣布竞选纲领;有少数男子不允许她们参选,她们就理直气壮地说:“不让妇女选举,就不能开票!”有大量优秀妇女,当选为村、区代表,县议员,县、区正副议长,边区参议员。边区共选出16名女参议员,还选出出席全国国民大会的女代表4名。河北省唐县选出女县长陈舜玉,饶阳县选出女县长严镜波,她们工作得都很出色。有的女区、村长,在领导群众反扫荡中,壮烈牺牲。广大参政妇女、部分女干部充实到司法部门,使妇女们倍受鼓舞。妇女儿童权益更进一步得到保障。男女平等,妇女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了。

学习文化,提高政治思想觉悟

边区的农村妇女,绝大多数是文盲,在党、政组织的领导下,开办了冬学、民校活动。广大青壮年妇女,不论白天在田头休息,还是晚上抱着熟睡的孩子,都积极坚持学习。部分积极分子摘掉了文盲帽子,能写信、算账、记账、写讲话提纲和做会议记录,有的被提拔为脱产干部,有的当上了民校教师。民校除学习识字外,还有政治课,讲《论持久战》,讲形势任务、政策及民族气节等。妇女们都懂得我国地广人多,只要坚持团结,坚持持久抗战,坚持统一战线,一定能把日寇赶出中国去的道理。当时虽然生活艰苦,对敌斗争极为残酷,但她们满怀胜利信心和革命激情。随着文化政治学习和斗争任务的需要,边区农村还广泛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文娱活动,在田野里,山岗上,庭院中,到处荡漾着妇女们的革命歌声。青壮年妇女,一般会唱十几支歌,有的能唱几十支歌。扭秧歌,演话剧也随之

开展起来。话剧先由妇女单独演，后发展到男女同台合演。农村业余剧团常结合斗争形势、任务和本地实事，自编自演，起到了娱乐和宣传教育群众的作用。

边区农村妇女，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为夺取抗战胜利，巩固边区抗日根据地，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她们克服困难、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高度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顾大局、识大体、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继承和发扬。

1938年长沙抗战文化中的 “三报六刊”

张 生 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沙抗战文化的兴起和发展，主要得助于平津文旌的南移和京沪文旌的西进。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驻长沙合组临时大学前后，来自抗战前线和沦陷区的大批学者、教授、作家和大学生（其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相当大部分是党领导下的爱国青年），密切同本地文化人相结合，先后组建了“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等统战团体，并创办了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报六刊。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方针的指引下，谱写了古城抗战文化的新篇章。

（一）张天翼、蒋牧良主编《大众报》

《大众报》创刊于1937年12月1日，魏猛克任社长，潘开茨任经理，洪君实、黄定戎等任编辑。由于经费、纸张、印刷等方面困难重重，只发行半个月就办不下去了，洪、黄二人都要离开报社。省工委负责人任作民认为这个阵地不能放弃，建议潘开茨出钱办报，张天翼、蒋牧良、张生力负责编辑，钱君陶负责插图及版面设计，潘开沛负责

发行工作。1937年12月20日报纸由16开的小型日报改为8开的3日刊。对象是学生、工人、店员、市民、农民，内容以抗日救亡和民主进步为中心，文字力求通俗简短。一、四两版的新闻都是改写的，带有述评性质。二版是各地通讯，有些稿件来自“全民通讯社”，有些通讯是从《新华日报》和《救亡日报》转载的。三版是副刊，都是一些杂文、小品文、爱国故事、弹词说唱等。魏猛克虽已在报社负责，有时也搞些漫画。住在报社的客人雨田（作家黄源的爱人）也帮助写稿拉稿。

领导《大众报》党支部的是任作民，支部成员有张天翼、潘开茨、张生力。任是湘阴（今汨罗）人，化名老周。他曾留学苏联，在国民党监狱里受过多次酷刑，40岁左右已显得有些苍老。董必武把他从牢里营救出来后，长江局于1937年9月派他来长沙建立湖南特委，后改为湖南省工委，他任统战部长。《大众报》社长潘开茨是郴县人，日本留学生，在东京参加过一些进步活动。1937年春回国，在上海搞文化工作。这年11月在长沙由石辟澜（余青）、王可增（蔡坚）介绍入党。他家在长沙湘春街开了一个小肥皂厂和门市部，由他伯母经管。他既全力支持《大众报》，还让出家里的房屋接待一些从京沪撤退到长沙的文化人。魏猛克曾把教育西街报社称之为免费的“难民公寓”。《大众报》工作人员都没有工资，常到潘家作客。遇到下雨天，就由钱君陶内弟或潘开茨的亲弟到潘家提一篮饭菜来报社共享。饭菜提来后，往往没有炉火加热，也就只能冷吃，但我们认为这些“抗战餐”还是难得的。我在报社一身四任：既是编辑，又是记者，又兼校对，又兼发行。每逢

出版的那一晚，我必须坐在《市民日报》印刷厂校对三遍。晚上11点左右印刷厂职工吃晚餐，我只好喝杯白开水。直到天亮印出第一张报纸后才回社里。有时上街吃碗稀饭，马上赶回来帮助发行。发完了报纸，又利用空隙去采访新闻。如此周而复始地生活了三个月。

主编副刊的两位左翼作家张天翼、蒋牧良都住在潘开茨的肥皂店里。蒋牧良很严谨，文如其人。分工由他负责的稿件常能如数编发。遇到缺稿时，他就要我上楼去找“老天”。张天翼文思敏捷，倚桌可待。当时许多报刊都向他们约稿，他们总是不停地写作，即使在春节期间也很少搁笔。蒋牧良在《元旦试笔》一文中就是这样写的：“这么一个苦难的元旦，如果母亲住在长沙，我想她一定叫我写的。”写什么呢？“我试笔的东西是写游击战小册子。”当时文艺界有两个口号，叫做“文章入伍”，“文章下乡”。蒋牧良当过七年兵，熟悉部队生活，所以他要以游击战为写作题材。1938年4月，谭丕模和李仲融介绍他入党后不久，他即到河南前线去了。张天翼是位多产作家，1938年初，他应茅盾之约，正在写《华威先生》。我每次去找他要稿时，他总是一面构思，一面咬指甲，10个指甲都被咬得光光的。我开玩笑地问：“老天，你是不是饿得没有东西吃了？”他说：“我是吃老本。”我问他为什么叫“华威先生”，他说：“华威者，统治中华文化运动的顽固权威也！”这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虽然比较开明，主张抗日和民主，但他也难以完全制止国民党顽固分子对抗战文化事业的干扰和破坏。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老人在《抗战给我的机会》中说：“我接见的同胞，日以百计，至少也以数

十计。其中，爱国之士把我当作预言家，而政治间谍也把我当做了进攻的目标。”如果把《华威先生》和李仲融《对于一个工作者被捕的几点意见》对照一下，就可以进一步理解《华威先生》的时代背景。

《华威先生》中的那位顽固人物，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力图包揽一切，控制一切，如果谁不请他当个委员或什么长，他就大发雷霆，厉声质问：“你能不能担保你们会内没有汉奸？没有不良分子？你能不能担保以后工作不至于犯错误？……”但他一当上某某团体的什么长或委员以后，这个团体也就寿终正寝了。李仲融的文章正好说明“华威先生”是不许别人抗战的“假洋鬼子”。文中指出：“文抗会”举行例会时，一个便衣先生说：“座谈会为什么不得省党部、警备司令部的允许就开会？……国家只容许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委员长）……你们要活动，可以到武汉去，湖南决没有你们活动的余地……告诉你，这不过是给你一个初步的打击……！”说着，说着，那个人就把主持座谈会的杜辉义（即杜修经，曾任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委员）从楼上拖到楼下，一直拖到青年会办公室，还要拖到警备司令部去。由于张治中主席及时派来副官加以制止，此人才扬长而去。这类人物难道不是“华威先生”的同党吗？

《华威先生》定稿后，张天翼把它寄给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该刊于1938年4月刊出此文不久，即被日本《文艺》转载了。欧阳几海在《一年来的中国文学》（原载于《广西日报》）中说，《华威先生》是“过去一年中国文学底最值得喝彩的一个特质”，“充满了批判精神的新特点”。林林

在《作家要深入祖国》一文中也认为：“暴露与讽刺”，在抗战中是必要的。

1938年2月7日，郭沫若从武汉来到长沙，住在留芳岭曹如璧家。这时的《大众报》正处于困难时期。为了打开销路，“老天”去请郭老写稿，郭老同意了。“老天”回报社后，建议钱老设计一幅大广告，刊列《大众报》的特约撰稿人，第一名是郭老，第二名是茅公，其次是老舍、巴金、丁玲、夏衍、黄源、楼适夷等十多位左翼作家。我问：“老天，你这样开列名单，他们都同意吗？”他说：“我同茅公、郭老谈过，他们都答应了，其他作家那里，我即和蒋牧良钱君陶写信去联系。”接着，他又说：“我们也要学学老百姓过年的办法，把钟馗贴在大门上，吓吓华威先生。”我同开茨社长拿出大批广告去各处宣传，增加了报纸发行量。1938年3月，省工委为了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好省工委的机关报——《观察日报》，将《大众报》合并到《观察日报》，要张天翼去编副刊，要我去编新闻兼记者，我又和他在《观察日报》共事了。

（二）《观察日报》的主要特点

黎澍（黎树苍）、杨赓（杨隆愈）主编的《观察日报》，创刊于1938年1月25日，是张四开的小报。出钱办报的唐文燮原是北平中国大学的“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总编辑黎澍和唐是同乡好友。1936年黎已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入了党。筹办《观察日报》时，只有黎一个人是地下党员，省工委统战部长任作民就把黎的组织关系摆在《大众报》党支部。1937年12月下旬，我在党支部会上介绍李品

珍入党时，黎澍谈了杨隆愈申请入党的问题。因为我同杨是北京大学同学，我还谈了杨在北大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活动情况。于是任作民指定我和黎为杨的入党介绍人。省工委宣传部长谭丕模负责领导《观察日报》党支部，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抗战前，在北平师大和民国学院任教授。《民族呼声》和《联合旬刊》停办后，邓克生到报社兼编“经济讲座”，冯秀藻、杨润湘到报社兼编“阅读生活”，省青委于刚与李锐兼编“青年阵地”，罗高（张先畴）、王西彦、张天翼先后主编“观察台”，湛震主编“老百姓”。副刊中还有“时事演义”、“时事讲话”、“抗战地理”、“战时文艺”、“社会服务”“小朋友”等专栏。社论班子以黎澍为主，成员有谭丕模、萧敏颂、李仲融、杨荣国等党员，党的领导力量进一步加强了。同年5月，省工委聂洪钧在报社党支部宣布《观察日报》为省工委机关报，号召党员全力办好这张报纸。

《观察日报》的主要特点是通俗、精悍、多样，富有战斗力，贯彻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并能抓住主题，突出中心，因而赢得了读者。

1938年4月12日的《观察日报》，刊登了中共宁乡县委书记李品珍（清水）的一篇题为《如此抗战教育！》的通讯，他说：“最近长沙某女校（周南女校）有一个学生（张家蕙）写信给我，指责学校当局不特不鼓励学生看有益的课外书，反而把我们的报刊没收了。”副刊编辑罗高即在“观察台”专栏中写了篇《向各地学校当局进一言》：“希望各地学校当局能秉承‘全代会’（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之建国纲领中关于教育诸条文的意旨，不要再毫无理由

的限制学生看抗战的书籍杂志和限制学生参加救亡活动。那些封建式的办法，在抗战中是要给以革除的。”这年5月15日的《观察日报》刊载了湘子的《今日的世外桃源》，揭露省立女中迁到湘潭乡下后，师生从早到晚困守在死的书本里，完全与世隔离了。为了转化湖南教育固步自封的风气，《观察日报》刊载了文农的“延安通讯”，介绍“陕北公学”的学生生活；转载了“全民社西北通讯”，介绍胡乔木在陕北安吴堡办的青训班，充满了热力和活力。

1938年4月下旬，国民党当局在常德封闭了四家进步书店，黎澍即于这月29日写了社论《保障出版自由》，指出：“国民党‘临代会’所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刚刚于4月4日在全国各地报纸上公布出来……在纲领宣布还未到十天的时候，本省常德方面就发生封闭四大书店的事情。封闭的原因，据当地宣布，说是由于他们出售由汉口或长沙运来的‘反动’书籍。而这些‘反动’书籍在武汉或长沙是被允许公开合法出售的，并不视为‘反动’而加以查禁……兹后对于合法的出版、集会、结社应该充分保障，不得摧残！”

8月14日的《观察日报》，刊载了我的特写《长沙各界纪念八一三》，揭露“华威先生”们包办群众抗战运动的后果：“八一三的八时左右，教育会坪里的播音器又响了，会场中心排列着约四五百人的黄色队伍和形形色色的旗帜……，××部××会的旗帜，在散会前十分钟才由两位健步的工友打着它匆忙的赶到会场……十时左右，纪念八一三的群众在悲壮的军乐声中纷纷地四散了。这时，记者从袋子里拿出一张纪念八一三的宣言，一面走，一面读：

‘同胞们，起来！时危矣！寇深矣！……’我还没有读完，回顾会场时，那里只剩下了一面国旗在百尺竿头飘荡着！”

这种危险的消沉情况，连省主席张治中秘书王次青也感到气愤。他在《国民日报》写了一篇“时论”，题为《从八一三周年纪念会所见讲起》，指出：“参加昨天八一三周年纪念大会，见到那表现是如何的无力，情绪是何等的消沉，心头有点发颤！如果说这是战时湖南民气的表现，我们实在不能不认为这里是存在着莫大的危机！”“照这样的情形，如果战事进入湖南境，这些松懈的机构、软弱的基础，一定经不起猛烈的震荡，那长沙就会变作一座死城！”

保卫武汉！保卫湖南！是当时各界人士的中心口号。《观察日报》先后发表了翦伯赞的《怎样才能保卫武汉？》，徐特立的《保卫湖南以及保卫武汉的基本问题》（连载四天），黎澍的社论《怎样巩固湖南》，李仲融的《不应怕民众起来了——响应〈国民〉、〈观察〉两报的呼吁》。《观察日报》之所以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主要原因是抓住了“保卫湖南”这个中心，反复开展讨论。8月15日的《观察日报》发表了《湖南民众为什么还没有起来》的社论，指出妨害群众运动的主要原因：第一、不能保障民众合法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许多抗日救亡的书报横遭查禁，许多纯洁热情的青年横遭逮捕，许多积极工作的团体横被解散。人民所期望的是领导，而所得到的却是诬蔑、恫吓、拘捕、监禁、封闭、停止活动等等。第二、大多数民众团体负责人的产生，不经过群众的选举，也不组织或吸引群众参加工作，到后来就干脆连发动也懒得发动了。第三、

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严重,大多数的民众团体差不多都是由一些“救国专家”和少数“名流”在把持,那个团体没有他们参加,便要被视为“份子复杂”。可是他们一经参加进去,这个团体也就随之而寿终正寝了。《观察日报》的大声疾呼,引起了省主席张治中的重视,他曾派人到《观察日报》,邀请唐文燮社长去当“湖南省民众抗日统一指导动员委员会”委员。湖南新闻界的另一委员则是历史最悠久的长沙《大公报》总编辑朱石农。

为了推动抗战文化的通俗化,《观察日报》副刊从创刊之日起,就连载张天翼的长篇童话小说《帝国主义的故事》(后改名为《金鸭帝国》),讽刺那些眼睛长在脑后的申公豹式的人物,揭露那些鼻孔朝着上空,仰承帝国主义气息的鸭小丑。还刊载了风扬的“时事演义”《抢夺徐州的大战》,一荣的“道情调”《中原大战》,敬亭的“凤阳花鼓调”《军民合作》,仁云的“要嫁装调”《恨》,少秋的“弹词”《日寇暴行》,秉廉的《五更劝夫》,邓克生的《抗战建国纲领讲话》,曹伯韩的《经济常识讲话》,绍禹的《抗战地理常识》,石胆的《科学小品》,“老百姓”的《名词浅释》等通俗作品。

为了促进抗战文艺的改革活动,《观察台》刊载了吕振羽的《1936年剧社和(民族万岁)》,文中指出“《民族万岁》这一剧本,虽则是从德国希来的名作《威廉退尔》改编的……却完全换了中华民族的‘灵魂’,描写了中国同胞之共同的斗争目标等情绪,暗示了民族之光明的前途。”同时刊载了讨论戏剧改革的文章,其中有张天翼的《从改编剧本问题谈到(民族万岁)》,罗高的剧评《民族万岁》。为了推动“文艺下乡”和“文艺入伍”,《观察台》刊载了于

刚的《开展文化上的拓荒运动》，老舍的《军士们写点文章吧》，沙尘的《炮火下的文艺》等。

1938 的年 9 月，高文华、徐特立去延安开会期间，聂洪钧代理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他要用真名在报上发表文章和谈话，《观察日报》总编辑黎澍认为：民办报纸便于批评国民党，如果暴露了报纸的政治关系，就不好说话了，因而阻止了聂的作法。1938 年 11 月，《观察日报》迁到邵阳后，总编辑杨赓根据聂洪钧的指示，全文刊登了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和中共六届中全会决议，这种形左实右的作法受到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批评。以省主席薛岳为首的湖南顽固派抓住这些辫子，迫使《观察日报》在 1939 年 4 月 17 日停刊。

（三）独具风采的《抗战日报》

《抗战日报》也是张四开的小报，创刊于 1938 年 1 月 28 日。它是根据周恩来、徐特立的意见，由地下党员田汉、廖沫沙创办的。《创刊词》说：《抗战日报》的宗旨是“团结各方力量，特别是文化界的力量，援助政府抗战。”编辑部成员有张曙、胡萍、黄仁宇及朝鲜朋友安炳武等。该报共有七个专刊，每周轮流刊出，从七个方面传播抗战文化。

星期一刊出的“抗战青年”专刊，由“抗战青年社”主编，先后载有王道的《集合的号音响了》，雄飞的《从军两月来》，力行的《征集破铜烂铁运动》，石筱君的《不应该悲观》和《目前校内抗敌工作的检讨》等。

星期二刊出的“抗战教育”专刊，由“战时教育社”主编，先后载有曹伯韩的《战时教育实施方案纲要读后感》，

陈伯华的《战时教育的主张》等。

星期三刊出的“戏剧与电影”专刊，由电影明星胡萍主编，先后载有黄芝岗的《旧戏中的汉奸意识问题》，王铁民的《发动乡土戏剧的改革运动》，于连僧的《改革乡土戏剧与话剧通俗化》，董每戡的《广播戏论》，傅承谟的《孩子剧团在石灰窑》，罗天富的《长沙的电影》，侯枫的《轮渡上演剧记》，宋之的独幕剧《旧关之战》，田汉的长篇演出台本《最后的胜利》等。

星期四刊出的“抗战妇女”专刊，由“抗敌妇女社”主编，先后载有易蕾的《贫女院访问记》，远植的《妇女游击队中的工作》，何茜丽的《知识妇女到农村去》，易超的《乡村姊妹等着我们》，愈辛的《沅水的女儿们》等。

星期五刊出的“诗歌战线”专刊，由“诗歌战线社”主编，先后载有萧三的《保卫大徐州》，白鹤的《在地下室》，王亚军的《一个残废的影子》，吕亮耕的《宝剑篇——赠壮士》，陈残云的《做中国底难民》，胡依的《悼湖大》，沈彤的《近郊一日》，林永泉的《南来的列车》等。

星期六刊出的“抗战工人”专刊，由“抗敌工人社”主编，载有流星的《关于湖南第一纺纱厂的一个报告》，报道该厂现有工人 3300 人，每人每天工资三角到四角。全厂只有两间男女浴室，宿舍很拥挤、黑暗，俱乐部一无所有。工人要求恢复工会，厂方几次阻挠。还有个女工写了一篇通讯，题为《抗日与生活》，反映了女工的苦难情况。报社未加评论。

星期天刊出的“抗战儿童”专刊，由田汉的长子海男主编。当时他还在明德中学读书，已能写出一些受读者欢

迎的文章。这个专刊上载有陈明的《小朋友演戏》，惟楚的《小朋友做兵役宣传》，钱东生、罗同的《小三子外传》等。

《抗战日报》的漫画，在长沙报刊中是独树一帜的。主要作品有张乐平的《敌人的外表和内容》，丰子恺的《儿童与捷报》，廖冰兄的《宁饿死不屈服》，周令剑的《爸爸受了伤，儿子接父去》，白波的《合力打敌人》，还有王建钧的木刻《工人团结起来，保卫祖国》。一些读者对《抗战日报》的评价是：图文并茂，丰富多彩。

抗战初期，顽固派易君左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抗战日报》作者辅臣在《几个似是而非的疑问》中评论：“假如中国只能有一个主义，那就除开三民主义之外，不许更有所谓‘国家社会党’。如果他们要求几个主义和几个党派并存，‘那便是别有企图，别有阴谋’（易君左语）。然而，蒋（介石）、汪（精卫）分明承认他们的存在，这是易（君左）先生错了呢？还是蒋、汪错了呢？我对这个问题真是头都想痛了！假如易先生的主张是对的，那么，第一，要修正蒋、汪的复函（给国社党的信），第二，要完全改变的是《抗战建国纲领》第二十六条。”

《抗战日报》人手不多，经济困难，因善于运用统战力量，短期内就把一张小报办活了。徐特立、郭沫若、沈从文、王鲁彦、孙伏园、许杰以及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等，都曾为该报写文章。徐特立还为“抗战青年”与“抗战工人”两个专刊题了字。郭沫若也为“戏剧与电影”和“抗战儿童”两个专刊题了字。这些都是对该报的有力支助。

关于《抗战日报》工作人员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有段心情沉重的回忆：“《抗战日报》本身

就是一个悲剧，事实上是在搞无米之炊。白报纸成问题，印刷成问题，同人们的伙食也是七拼八凑地勉强敷衍的，薪水更说不上去了。”在这种艰苦生活中，报社负责人发生了家庭悲剧。后来实在办不下去了，遂于1938年7月底停刊，廖沫沙去武汉工作。

1938年11月12日长沙被国民党放火烧毁后，周恩来指派廖沫沙、周立波去沅陵恢复出版《抗战日报》。参加编辑工作的有欧阳山、草明、王文秋、彭昭麟等。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叛国的“艳电”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极力为汪辩护。《抗战日报》于是发表《读吴稚晖的〈进一解〉》，批评国民党的错误论调。1939年春，常德中学编印的政治讲义中，转载了业已跟随汪精卫叛国的周佛海的文章和老顽固分子易君左的《百感茫茫》，引起该校学生不满，要求报社予以揭发。该校教导部获知此事，函请报社告以投稿者的姓名。报社即于这年3月下旬公布教导部来函，并指斥周佛海的言行危害抗战。1939年6月，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抗战日报》被迫于6月15日停刊了。

（四）长沙新闻界的统战活动

1937年冬至1938年冬，长沙有13家大小报纸，除了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大众报》、《观察日报》、《抗战日报》外，其余十家都是国民党系统的。徐特立给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在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中说：《衡报》是何键的报，《力报》是复兴社的，《国民日报》是CC的，《民国日报》是国民党的，这些报纸不能指导抗日。而“张鼓峰事件”

(日、苏在东北边境冲突)发生时,他们根据(日本)东京电,发表言论,几乎做了日本的喉舌。《中央日报》有些言论比较正确。此外,还有市商会办的《市民日报》,文教界办的《湖南通俗报》,政坛失意人物谭常恺(曾任省建设厅长)办的《正中日报》,地下党员赵君实担任总编辑、梁宜苏担任记者的《全民日报》。当时统战工作的重点是《大公报》,该报主笔张平子是《观察日报》总编辑黎澍的中学老师,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王凌波同《大公报》的关系也较密切,因而地下党同《大公报》的统战关系是有成效的。省主席张治中的秘书王次青比较进步,他对省府机关报《国民日报》是有影响的,该报曾在社论中痛斥“包而不办”的“华威先生”。长沙《力报》是几个黄埔系军人在1936年创办的,总编辑康德、副刊编辑严怪愚、新闻编辑陈楚等,在地下党员刘乐扬、李仲融的影响下,发挥了一些进步作用。严怪愚主编的副刊有《湖南女作家专辑》、《东北流亡作家专辑》、《文学旬刊》(谢冰莹主编),《文艺生活》(唐炎斋主编)、以及悼念鲁迅特辑等。严怪愚的特写主要是反映下层人物的苦难生活,较受读者欢迎。

1938年七月上旬,“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负责人孟秋江来到长沙,在儿童图书馆举行青年记者座谈会,决定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长沙分会筹备会”。经过一个星期的活动,7月15日在青年会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30余人。范长江在会上致了祝词,他说:“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在去年抗战爆发后即开始筹备,今年3月30日,在武汉正式合法成立。”“希望长沙分会不只在消极方面做到初步的团结,更为全国会友所期待的是长沙分会能看到时代需

要”，“从新闻工作的技术上与新闻品质上改革长沙新报纸”，“充实座谈会、演讲会、研究室等活动。”“以最大的努力作大众新闻报道工作”，“支持壁报和通俗报，促进地方通讯处成立”。到会讲话的还有长沙《中央社》主任唐际清、《大公报》总编辑朱石农、青年会负责人刘良模。会上选举陈子玉、黄仁宇、伏笑雨、田慧如、谭天萍、严怪愚、邱梦彤等 7 人为长沙分会理事，陈楚、黎树苍（黎澍）、戴哲民 3 人为候补理事，实现了长沙新闻界的大联合。《观察日报》在 7 月 16 日编印了长沙分会成立大会特刊，发表了祝贺文章。“青年记者学会”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民间组织，先后在南昌、长沙、广州、成都、延安等地成立了分会，这年 11 月全国已有会员近千人，从而为成立《国际新闻社》打下了基础。1938 年 10 月 20 日，“青记”负责人范长江、《中央社》战地记者刘尊棋、国际宣传处专员邵宗汉等，在长沙青年会开会决定成立《国际新闻社》，社址设在长沙市都正街 78 号，范长江任社长，黄药眠任总编辑。该社形式上是一个民间通讯社，实际上是《新华社》的一个重要补充。因为《新华社》在国统区不能发稿，《国新社》就以合法的身份代替了《新华社》。长沙大火后，范长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把《国新社》和“青年记者学会”迁到了桂林。

（五）早期三刊先后联合纪略

早在 1936 年夏，地下党员于刚、萧敏颂、曹国枢等，就在长沙办了《湘流》三日刊，这年冬被国民党省党部查封了。七七事变后，萧敏颂回到长沙，即在《湘流》的基础

上于9月10日创办了《前进》周刊。他在《发刊词》中说：“我们没有任何野心，仅仅本着良知，想做一点激发民族意识，启发大众知识的工作。”该刊从第一期到第九期，刊载了吕振羽的《抗战后的新动向》，翦伯赞的《怎样保证我们抗战的胜利》，于刚的《等待工作呢，开辟工作呢？》，高滔的《文人到何处去？》，张兆麟的《湖南，起来！》，陈子展的《有国可庆》，之光的《抗战中的文化建设》。1937年12月15日《前进》周刊发行到15期，即与《民族呼声》合并，共出《联合周刊》。

《民族呼声》十日刊，创办于1937年10月10日，编者是冯秀藻、杨润湘、赵君实、梁宜苏。一至八期载有翦伯赞的《抗战后之国际法西斯主义的新阵容》和《国际和平阵线之广泛的展开与我们抗战的前途》，吕振羽的《怎样组织民众和训练民众》和《民族抗战与民权》，张天翼的《谈谈农村工作问题》，魏猛克的《战时文艺》，谢冰莹的《战地一瞥》，黄芝岗的《论抗战中的不稳分子》、廖庶谦的《处置仇货和联合商人救国》。12月20日该刊出至第八期，即与《前进》周刊合并，改为《联合周刊》。1937年12月23日创刊的《联合周刊》周刊第一期现已找不到了，第二期载有蒋牧良的《元旦试笔》，吕振羽的《保乡和救国》，梦僧的《救亡运动在宁乡》，邓克生的《向封锁刊物的学校当局进一言》。《联合周刊》只出三期就停办了。后来《民族呼声》与《火线下》合并，改出《联合旬刊》。

《火线下》三日刊创办于1937年11月12日，黎澍、杨赓主编。它是以工、农、学生、市民为对象的通俗刊物。黎澍感到吃力不见力，决定放弃独家经营《火线下》的计划，

同《民族呼声》共走联合之路,联合前,《火线下》已出到 20 期,《民族呼声》已出到第八期。《联合旬刊》创刊于 1938 年 3 月 6 日,负责人是冯秀藻、杨恽襄、邓克生。一至七期载有徐特立的《关于矛盾统一的几个要点》,谭丕模的《从贪污到抗战》,蒋牧良的《我所看到的民训工作》,谢冰莹的《找不到自己的家了》。四、六、七期中关于托派问题的论述和《各党干部应亲密携手》等三文,受到省工委聂洪钧的批评,遂于 1938 年 5 月底停刊。

(六)《中苏半月刊》的基本任务

“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是搞人民外交活动的统战组织,成立于 1937 年 12 月 19 日。会长覃振是国民党政府的司法院副院长。常务理事翦伯赞、吕振羽、谭丕模是中共省文委成员。十多个理事中,有地下党员李仲融、民主人士黄一欧、国民党知名人士刘岳厚、陈介石、陈大榕、谢祖尧等。翦伯赞曾任覃振的秘书,覃就把分会工作交给翦负责。分会编印了《中苏周刊》和《中苏小丛书》,办了俄语学习班,经常组织中苏问题和抗战问题座谈会。《中苏半月刊》是分会的机关刊物,创刊于 1938 年 3 月 16 日,主要负责人是翦伯赞、谭丕模,责任编辑是萧敏颂。这年 8 月,萧去民国大学当教授,我被调到省文委接替萧的工作。这个刊物的基本任务是宣传抗战文化,传播苏联文化,介绍国内外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动态。每期发行约 4000 份,是湖南各刊中销售量最大的。

《中苏半月刊》为了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曾在第一卷的九、十两期合刊中,发表了徐特立的《保卫湖南以

及保卫武汉的基本问题》，提出了保卫湖南的几条建议：第一、民众应该组织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应该有粮食调节委员会、备荒委员会、动员及自治委员会。第二、一切青年和成年人（除小脚妇女外），不分男女，都须鼓动他们自动加入武装及半武装的组织，编为成年自卫队和青年自卫队，以不脱离生产、不调动、不发饷为原则，从中选拔先进分子，组织青年模范队和成年模范队，加以特殊的军事教育和政治教育，准备转变为游击队和民团。第三、动员妇女，帮助伤病兵洗衣、补衣、缝衣、做鞋子、草鞋。第四、民众组织应以甲为单位，区乡保甲长的工作应该吸收广大的群众来参加。第五、知识分子应当有计划的分配到民间去，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应该成为全省知识分子最高的领导机关。第六、长沙人口约60万，老弱妇孺怎样疏散？壮丁怎样组织？应当预先组织设计委员会具体规划。我在《中苏半月刊》第二卷一、二、三期用了很多篇幅讨论保卫武汉和保卫湖南这两个迫切的重大问题，其中有吕振羽的《战局的严重关头》，翦伯赞的《保卫大湖南的一个紧急动议》，谭丕模的《对于湖南民众抗战统一委员会的期望》等。我也以此为主题，写了《九一八在长沙》，揭露保卫大湖南口号声中的反常现象，我说：“活跃过一时的长沙，甚至连那些较有群众的救亡团体，在三周以前的几周内，表现出更消沉更零乱的现象……表现出‘人荒’的严重性。‘七七’纪念会是这样，‘八一三’也是如此。难民伤兵工作需人，募捐宣传工作更需人。而在另一方面，由于成见与磨擦的现象仍未消除，工作门户半掩半开……许多热情的有工作能力的救亡者，因无相当的工作

机会……遂感到沉痛失望，徒唤奈何。工作需人，人无工作，这是多么矛盾的现象！”10月10日我又写了一篇关于保卫武汉的文章，题目是《发扬革命精神，抢救国庆诞生地》。文中指出：“在武汉三镇，目前表现最突出的是人口疏散忙，机关团体搬家忙，市民逃难忙。三镇的市民、学生、工农都积极的动员起来了没有？在湖北的县市中，尤其是鄂东、鄂南、鄂北各县，或已沦陷敌手，或已接近前线，而我们尚未看到或听到这些地方的民众都已经动员起来、武装起来了。”上述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保卫武汉和保卫湖南的历史动态。

既然刊名《中苏》，自然要介绍苏联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的特点。我在该刊二卷一、二、三期中刊发了王时风译的《今日的苏联青年》，于刚写的《论苏联青年团团网的特点》，萧敏颂译的《十年来的国家农场》，游宇译的《苏联国民经济的高度发展》。我只编了两个月的《中苏半月刊》，又因党的工作需要而被调去编《时事动态》月刊。长沙大火前，《中苏》半月刊迁到沅陵，王时风、王仁忱、田价人（赵范）担任编辑，翦伯赞、谭丕模仍任主编，出刊到了三卷一期，因平江惨案的发生而被迫停刊了。

（七）两个统战刊物的宣传方针

武汉沦陷前，国民党内泛起了悲观失败情绪，亲日派和汉奸乘机兴风作浪，一些旧军政人员正在徘徊观望中，赵恒惕曾经统治湖南6年，在城乡旧势力中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中共湖南省工委为了防止赵恒惕倾向投降派一边，就由聂洪钧加强对赵君迈的统战工作，聂又调丁务淳

和我去当助手。湖南盐务管理处处长赵君迈是美国留学生，政治上属于宋子文一系，他和赵恒惕是同父异母兄弟，思想认识比乃兄进步些。他想办个文摘型的月刊，聂洪钧要我和丁务淳负责编辑工作。借助于赵君迈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很快就解决了刊物的登记和纸张印刷问题。麻园岭14号附1号原是赵恒惕的小公馆，在日机轰炸声中早已人去楼空，赵君迈就把这栋楼房作为月刊的社址。丁务淳（周宏明）原是清华大学地下党员，曾任长沙临时大学党支部书记、湖南大学党支部书记、长沙市委书记。我们同编一个月刊，合作得很好。

《时事动态》内容是摘录和摘译国内外报刊上的一些重要文章，帮助读者了解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动态。

创刊号发表了赵君迈的《论湖南当前的形势与任务》，引述湖湘文化传统和斗争史实，列举坚持抗日的有利条件，借以批判抗日救亡中的悲观失败论。同时，为了表明国共两党在广州沦陷和武汉撤退后的政治态度，既转载了周恩来的《论目前抗战形势》，又转载了国民党《中央日报》社论《国策不变，信念不变》。除了这个主题的三篇文章外，还刊载了永邦的《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操良的《日本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现阶段》，方亚伟译的《今日意大利人民生活》等。创刊号刚出版6天，省委就要我撤到沅陵去编《中苏半月刊》。我没有去后方，而是去了抗日前线。

同在长沙大火前停刊的，还有另一个统战刊物《今天》十日刊，该刊创办于1938年11月11日，主要负责人

是来自京沪的大学生陈和昆、魏方、廉士聪。前期经费是通过程一中的关系，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福建省主席刘建绪提供的。后期经费是由国民党军事理论家、陆军大学代理校长蒋百里资助的（当时陆军大学已迁到长沙）。该刊创刊号发表了历史学家吕振羽的《为真理而斗争》，文中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是“向着进步的革命的方向行进，是在实践历史的客观真理”。第五期编印了“国际政治经济专辑”，受到徐特立老人的重视。据曹国枢、魏方回忆，徐老曾对魏方、廉士聪等负责人说：你们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是蒋介石的正统，你们出来宣传抗战，国民党有些人相信些。我们共产党人讲的话，国民党一些人是有偏见的。你们要多找些国民党中间同情抗战的人写文章，多报道国民党军队积极抗战的事迹。该刊就是这样的。出刊到 14 期，因为蒋百里病故，经费来源中断，被迫停刊了。

烽火摇篮育新人

——记“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

黄金轩*

武汉沦陷后，我家破人亡，背井离乡，流浪入川，进了“烽火摇篮”——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三保育院，院长即为赵君陶妈妈。在保育会(院、校)慈母们的亲切关怀和精心抚育下，全国数万战乱中的幸存者，终由濒临死亡的无知难童娃，成长为抗战建国的栋梁之才。

一、战时儿童保育会缘起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我大片国土相断沦丧，转眼间多少人家破人亡，难民潮席卷大半个中国。“日本鬼子的大炮，轰毁了我们的家，枪杀了爸爸，又拉走了亲爱的妈妈。叫爸爸也不答应，叫妈妈也不闻，破庙里挤满了我们一群可怜的难民。”“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去了土地，我们失去了老家。我们的大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军阀。我们要打倒它，要打倒它！……”这两段出自《难民曲》和《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的部分歌词，倾诉了我们千百万失去爹娘、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广大难童的悲惨境遇和满腔愤懑，每当唱起这两首歌，不禁潜然泪下。

* 黄金轩同志在抗日时期，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三、二、八院和保育中学(国立第十五中学——荣昌师范)的保育生。

是年冬，南京陷落，国都变屠场，人神共愤。难民潮迅猛西涌，武汉一度成为全国的抗日政治中心。国共两党政要与各界知名人士咸集于斯，他们目睹战火中孤苦无依的大批难童浪藉街头巷尾，痛切地认为：“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民族解放的后备军。”大声疾呼：“救救孩子们！”并号召：“希望爱国爱儿童的同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完成这个保育中国幼年主人的任务！为我们阵亡将士、死难的父老弟兄姊妹和儿女报这血海的冤仇，使他们虽未得享受自由解放于生前，但能安息于壮烈牺牲之后！”多么慷慨激昂的陈述啊！这就是沈钧儒、郭沫若、李德全、邓颖超、刘清扬等人于1938年1月在武汉签名发起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时的庄严宣告，继而得到宋氏三姐妹、何香凝、史良、曹孟君等人积极响应，战时儿童保育会顿时形成一个波澜壮阔的中国抗日救亡、爱国爱儿童的运动。

二、保育会的成立及其组织

1938年1月下旬，召开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发起人会议，决定成立筹备会，推行李德全、郭秀仪、曹孟君等9人为筹委，李为主任委员。为取得国民政府的支持，邓颖超同志托史良、刘清扬、沈兹九3人去请宋美龄出来主持保育会工作，宋答应了所请。经过短期筹备，3月10日在汉口圣罗以女中召开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大会。大会宣布要以艰苦奋斗和团结抗战的精神抢救和保育祖国的下一代，把他们培养成为将来新中国的建设人才。大会选出了有国共两党和社会各界知名爱国妇女56人组成的理事会，并推举宋美龄、李德全会任正副理事长。为争取多方面的支持与赞助，还敦聘了包括国共两党、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及文艺、教育、出版界知名人士、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中有影响的人士与国际友人、驻华使节在内的286位名誉理事。这充显示了该组织所具有的广泛统战性。

保育会在理事会领导下设立了一处六委，为日常办事机构。一外即秘书处，六委是设计、组织、宣传、保育、经济和输送委员会。保育会成立后，全国响应，许多省、市相继成立了分会。川、蓉、粤、桂、湘、赣、浙、沪、鲁、皖、闽、滇、黔、康、晋、甘、宁、陕以及陕甘宁边区、晋察冀、香港、南洋等地都先后设立了分会。随着各地分会的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改称总会。10月，总会撤离武汉迁往重庆。

保育会从成立到1946年6月宣告结束的8年间，先后共建53所保育院，收容保育了难童3万余人。其中在川者几近半数。保育院一般收容15岁以下儿童，分设小学、幼儿两部分，3岁以下者另设婴儿室。孩子小学毕业后升学或就业。其中国立第十五中学专收保育生，故称“保育中学”。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1939年7月创办的育才学校，选拔具有艺术天赋的各院保育生进行专业教育，是造就艺术家的摇篮。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被师生们亲切地称为“抗日烽火中的摇篮”。

三、宣传动员与募捐工作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所从事的是在战乱中培养民族下一代的光辉事业。抢救、保育数以万计的难童，是一项十分艰巨繁重的任务。为了动员全民关心和支持它，首先必须做好充分的宣传工作。担任保育会宣委主任的沈兹九在她主编的《妇女生活》杂志上先后发表了大量这方面的文章。在保育会成立时，还特地出了一期《战时儿童保育》专号，发表了宋美龄《谨为难童请命》的文章，李德全的题字：“保我儿童”，还有史良、曹孟君、郭秀仪等常务理事的文章。

《新华日报》还刊登了常务理事邓颖超的题词：“保育儿童，是丰富伟大的事业，不仅要救济与教育儿童，尤其要以坚毅的精神，培养儿童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主人。”其后，中共中央领导对保育院的题词有：毛泽东：“好好的保育儿童”；周恩来：“一代胜一代”；朱

德：“耐心地培育小孩子”；林伯渠：“新的战士在孕育中”；吴玉章：“培养我们的新生力量”。

为了从战火中抢救数万难童，维持其最低生活，并因材施教，费用是很大的。费用从何而来？必须多渠道予以筹措，而向国内外广泛开展征募运动，不但可激发炎黄子孙同仇敌忾的抗日爱国热情，也是集聚保育资金的好办法。此时，国母宋庆龄在香港给外国友人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他们支援我战时儿童保育事业。在这项艰巨的工作中，作为募捐委员会正、副主任的李德全、郭秀仪以身作则，做出了卓越的实绩。

在《流亡三部曲》之《离乡》歌词中悲愤地诉说道：“哪里是我们的家乡，哪里有我们的爹娘？百万荣华一朝化为灰烬，无限欢笑转眼变成凄凉，说什么你的我的，分什么穷的富的！敌人杀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在大敌当前，民族存亡的时刻，开展征募运动，起到了全民团结抗日的爱国凝聚作用。这一工作还曾获得当时美英政府救济机构的支援；港澳同胞与海外侨胞的捐款，是对保育事业长期而有力的支持。到保育会成立周年时，捐款已逾百万元，有的人认捐持续到保育会结束之止。

四、抢救与输送难童工作

抗战八年中，中国知识妇女对救亡工作成效最显著的，首推战时儿童保育工作。数千名来自四面八方的保育工作者，在这项伟大工程中奉献母爱，有的甚至终生不婚，成为集母亲、教师、保姆于一身的优秀保育工作者。她们是数万难童敬爱并交口称赞的慈母。

随着战区和轰炸区的不断扩大，难童激增，抢救和转运难童的任务迫在眉睫。到战区去抢救难童，是一件非常危险而繁重的工作。保育委员会主任曹孟君立即领导举办了“保育工作人员训练班”，并带队去第五战区所辖之台儿庄、徐州等地随军在枪林弹雨中抢救出难童 500 多人；同时，由副主任唐国桢等到第二战区之郑

州、开封前线炮火下救出二三百名难童。常务理事邓颖超以中共长江局妇委身分组织动员了一批党员和群团妇女，参加抢救工作，深入当地工厂、农村和街头巷尾收容难童。

抢救运送到武汉的孩子，先入汉口临时保育院进行清洗、治病、使他们情绪安定下来，逐步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后，再分批输送到川、湘、黔等分会去。临时保育院的工作也极其艰苦，因为各地送来的难童，大多身上虱子、跳蚤成群，汗臭熏人。他们面黄肌瘦，各种皮肤病患者甚多，发烧甚至生肺病的亦有之。因此，工作人员必须以慈母般的爱来接近温暖他们。

1938年5月，日军对武汉的轰炸加剧。在《武装保卫大武汉》的昂扬战歌声中，保育会常务理事会决定：在继续进行大力抢救流落在武汉各战区的难童和本地平民儿童的同时，加紧将已收容的孩子分批撤离。在当时的武汉，运输孩子的确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保育会采取火车、轮船、汽车、木船、大车等各种交通工具，并组织14岁以上的大孩子编队步行和分站转送，尽可能地先将他们转送到较为安全的地区，再往后转运就较容易了。大部分难童是经长江航运入川的。6月，保育会在宜昌设立转运站；7月，在巫山、万县增设新的接运站。在武汉沦陷前，汉口临保育院共送出28批难童。到1940年夏宜昌失守，经该站送入川的难童共达1.5万多人。

五、实行保教合一、五育并举

保育总会内迁重庆时，在朝开门附近陕西街万寿宫设了重庆临时保育院。从各战区辗转来川的难童都经此再分至附近各固定保育院去。他们陆续进入各院，生活相对安定下来后，即按他们的文化与年龄分班编组，正式上课。

保育院按《简章》规定：主要收养抗战及阵亡将士子女、做救亡工作及牺牲人员子女、战区难童。保育院是难童新的家庭和学校，是抗日烽火中的摇篮，各院院长就是大家庭的家长和孩子们的妈

妈。各院施行“保教合一”体制，一肩同挑抚养和教育的双重担子。院长和教师们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献身精神，内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如曹孟君、罗叔章、段超人、赵君陶（李硕勋烈士夫人）、沈葆英（恽代英烈士夫人）、任锐（孙炳文烈士夫人）、黄杰（徐向前元帅夫人）、瞿复权（瞿秋白烈士侄女）等。许多保育院（如直属第一、二、三、五、七等院）都建有中共支部。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旗帜下，聚集着中华民族一代最优秀的女性，她们献身于神圣的战时儿童保育工作，以她们慈母般的爱和广博精深的专业知识为基础，参照苏联经验，在不断改革旧的传统教育制度中，进行了新的探索与实验。她们以抗日爱国为核心，把教育与形势及儿童社会实践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施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教育，强调集体主义的自觉、自治，注重课外的阅读和开展文艺活动，努力把孩子们培养成“手脑并用的小工人，追求真理的小学生，自觉觉人的小先生，反抗侵略的小战士”。一句话，就是把无知的民族难童精心培养造就成未来新中国的建设者和保卫者。

六、桃李芬芳 社会栋梁

由于中共长江局、南方局妇女工作组邓颖超妈妈的直接领导和上述民族母亲们的第一流工作，使多数保育院成为失去亲人、流离失所的难童们“自己求新学问”的“新的家”。在那里，正如保育中学《校歌》所唱那样：“同学如手足，老师如家长。好学力行，百炼成钢”。当年，少数同学入党后到《新华日报》工作或赴延安；1944年秋，桂黔战局吃紧时，在“怒吼吧！中华的英雄们，投笔从戎效班超，马革裹尸上战场”的激昂歌声中，十五中70多位大同学热血沸腾地奔赴抗日前线或响应“同盟国并肩携手，反侵略敌忾同仇”的正义呼唤，远征印缅，打击日寇。

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终于望眼欲穿地盼来了“收拾旧河山，重

见爹和娘”的梦幻，挂着喜悦难舍的泪花，高唱着“好音从天降，欣喜若狂，尝够了流离滋味，准备还故乡……”的歌声，大家分别遣返回乡，或学习、或劳作、或投身革命，……总之，随着胜利复员还乡和保育总会宣告结束而终结了我们难以忘怀的保育生活，同时也告别了苦难而幸福的童年。

正如《毕业歌》中所唱那样：“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保育生遵循慈母们的教导，誓做正直坦诚的中国人，坚守“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修身准则，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迎了解放与新生。各地解放时，在校生不少已就业，半数参军。他们工作积极上进，纷纷入党团组织，多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在抗美援朝中，许多保育生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共同抗击美帝，保卫世界和平；在1957年以前，我们中的部分幸运儿，作为“调干生”进入高校深造，多数人则坚守岗位默默无闻地为人民共和国忘我工作、战斗着。这就是“烽火摇篮”造就的一批批未来新中国的建设者。

半个世纪之后的1988年3月10日，在原保育会发起人及常务理事、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的亲切关怀和全国妇联大力支持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大会”。邓妈妈为大会写了题为《继承和发扬抗日烽火中育才的光荣传统》的贺信。信中指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是中国妇女界最早成立的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当时保育院的儿童，现在都已成长，有的成为艺术家、工程师、教授、许多成为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有的已成为党政领导。这是我国各界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一大贡献，是我国儿童保育事业历史上一大创举，是永放光芒的篇章。”

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可说是3万保育生的缩影、代表和骄傲。毕汝钦会友在其《谈谈育才保育生的成长》一文中说：“据90年代初统计，育才首批128名保育生中，有60人成为专家、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及艺术家，占总数的46.88%；有20人成

为部、司局干部,30人为县、团级干部,即县、团级以上约占总数39.10%;其他14%为业务骨干、已故及下落不明者。”其中在全国或同行业中有突出贡献的杰出人才有著名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杜鸣心,著名指挥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陈贻鑫,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原中央乐团团长杨秉荪,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演说家、上海行知艺术团团长金钟鸣,著名版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伍必端,冶金工业部轧钢高级工程师谢仕柜、光谱分析高级工程师叶宏才,解放军军事医学院放射医学研究员李冬等。另外,在中央各文艺团体的艺术家中也有不少保育生:如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傅正义、空政话剧团的师陶、中央歌舞团的狄耕、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方掬芬、中央交响乐团的张仁富、以及中央芭蕾舞团、中央民族歌舞团、东方歌舞团、海政歌舞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等单位均有我们保育生。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科研设计院所及各行各业中,也有不少高、中级知识分子;在各级党、政、军领导人员中,也不乏保育生。此外,在台、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中也不少保育生,其中有被誉为台湾“木管乐之父”的薛跃武及空军中将王家文、退役空军少将汪国梁等代表人物。由此可知,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和加强“两个文明”建设中,广大保育师生在有生之年,仍可发挥他们的光和热。

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

董福庆

抗日烽火燃起，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正式列编的“三师一校”直奔抗日前线。八路军总部所辖的三个师（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已是尽人皆知了；然而，它所属的一所既育人又抗战的学校（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却鲜为人知。

庆阳建校 云阳誓师

七七事变后，为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处领导干部和教职员从驻甘肃庆阳的教导师（原是红大第三科，七七事变后进驻庆阳改为教导师）选调。经研究，中央军委任命韦国清为校长（亦称司令员）、陈明为政治委员，阎捷三为教育处处长（亦称参谋长），政治处主任先是陈明兼任，9月下旬由张正光接替，供卫处长是李厚坤，卫生所长是钟有煌。

在编制序列中，除司、政、供、卫外还设有股。另外，还组建了五个学员队，一个警卫连。

各级领导班子配齐后，又抽调了一批教员，军事总教是王洋清，政治总教是张平凯。

随营学校的组建工作于8月底9月初已基本完成。之后，韦国清、陈明率领全校五六百人，从甘肃庆阳开到陕西三源。韦国清代表随营学校到八路军总部（驻云阳镇）报到并汇报了情况。彭德怀副总指挥到随营学校讲形势。

1937年9月3日，全校指战员来到云阳镇参加八路军总部出

师北上抗日誓师大会。大会在一个大操场里隆重举行。入场式开始后，随营学校队列整齐，威武雄壮，精神饱满，歌声嘹亮，军号声、口号声震荡着整个村镇，格外引人注目。大会由邓小平副主任主持，朱德总指挥高声领读了《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读完誓词后，欢送八路军上前线的军内外代表和当地国民党政府的代表接着上台讲了话。身穿八路军服装的国际友人马海德用汉语热情洋溢地发言，欢送八路军到前线去。

东渡黄河 北上抗日

9月4日，八路军总部率领机关和特务团冒着蒙蒙细雨，由陕西泾阳县云阳镇出发，东进北上。6日，韦国清、陈明带领随营学校的浩荡队伍，从三源出发，沿总部行进的路线，在秦川大地上疾进。

师生们东渡黄河后，于9月下旬到达晋北抗日前线，进驻离八路军总部不远的苏子坡村。学员们在这里做了大量群众工作，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道理。同志们利用住在地主家的方便条件，给地主宣传减租减息的政策，并要求他们献出自己多余的粮食，为抗日做贡献。学员们对国民党南逃的溃兵，也给予安慰和鼓励，要他们树立起敢打必胜的信心，并用八路军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歼敌1000多人的事实，教育他们，消除他们的恐日心理。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全国各地的革命知识青年陆续奔向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经临汾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彭雪枫介绍，50多名北平、天津、东北的大、中学生，来到了总部随营学校学习。经校领导研究，决定把他们编到第四队，调黎有章任队长，欧阳平任指导员。这样，四队就成了随营学校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个队。培养教育和管理大学生、高中生，这对随营学校，特别是两位队领导来说，确实是一项新的艰巨任务。开始，欧阳平感到自己是工农干部，文化不高，怕完不成任务。后来他下定决心，刻苦钻研，提高

很快，积累了一套培养教育知识分子的经验，不仅能做好队里的工作，而且能讲好政治理论课。后来毛主席在延安给毕业学员作报告时表扬了他。

就在这大批知识青年来到随营学校的时候，八路军总部收到一封来自国民党重庆方面的信函。内容是希望八路军能够为抗日军民提供一本关于游击战术方面的军事理论书。于是，总部将命令下达给校长韦国清。韦校长又把任务交给了军事教员陶汉章。陶教员经过三个月的努力，编写出了一本 17 万字的游击战术教科书——《游击战术纲要》。该书出版发行后，对抗日起了重要作用。

跟随总部 转战晋南

10 月 22 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八路军总部开始撤离南茹村、东茹村。随营学校也离开苏子坡跟随总部转移。总部兵分三路，第一路，由朱德、任弼时带领总部机关，穿越正太路，于 10 月 27 日进至太行山区和顺县马坊镇。第二路，由彭德怀率领指挥所，经忻口、太原前线于 11 月初也到达马坊镇，同朱总司令会合。第三路，由邓小平率领政治部机关和随营学校，经过孟县，穿过同蒲路，渡过汾河，于 10 月底进入吕梁山下的汾阳、孝义一带进行群众发动工作，为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开辟道路。

从苏子坡到汾阳，随营学校既跟随总部行军，又保卫政治部机关的安全。为了警惕平型关大捷后日军的报复行动，师生们没乘火车，步行转移，避开大路走小路。敌机白天轰炸，同志们就夜间赶路，为了便于警戒，宿营住小村不住大村和城镇。部队到达汾阳、孝义后，邓小平根据报呈总部的计划，以竞九峪、大麦郊一线为中心，全面负责领导开展孝义、平遥、介休、永和、石楼、蒲县、隰县、大宁等八个县的工作。随营学校住在禅房头。这里是交通要道，进出的口子，政治部机关住里边，学校住外边，这样可以保卫政治部机关的安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一二〇师的工作团同程子华负责的战

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干部,在离汾公路一线展开工作;公路以南的地区由政治部和随营学校负责。要求同志们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开展地方工作,为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地方党组织做贡献。学校的干部、学员和战士,遵照邓小平的指示,以饱满的热情,在禅房头附近的几十个村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收编溃军和开展建立地方政权的工作。每个学员队负责十几个村庄,走村串户,动员各家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都要为抗日做贡献。

太原失陷时,不断有大批国民党的散兵溃逃下来,还有几十名国民党的县长,接连不断地涌到下堡镇,想经过这里向外逃。面对这种政策性很强的问题,教育处长阎捷三及时请示邓小平,进行了妥善处理。对那几十名县长做了动员,愿意留下来抗日的,欢迎;不愿留下的,将其车拉马驮的大批东西,包括枪支、银元及珠宝统统留下来,让他们走人。

太原失守后,毛主席就明确指出:吕梁山脉是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遵照这一指示,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于11月下旬到达吕梁山、太行山之间的洪洞县马牧村一带。邓小平率领的这一路,在汾阳、孝义完成任务后,也于12月底来到洪洞县归总部建制。不久,邓小平调任一二九师政委,傅钟接任他在八路军政治部的职务。

奉命西迁 聆听教诲

随营学校来到洪洞县,驻进了一个大村庄——白石村。1938年元月,学校先后接收三批学员。这些新学员除补充到原有的五个队(在苏子坡和汾阳、孝义已有一批学员送到前线或留地方工作)外,又新组建了第六、第七两个学员队。

朱总司令对随营学校的教育工作十分关心,并经常从马牧村来到白石村给干部和学员讲军事课或作形势报告。有时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他作形势报告时,全校教职员都在露天广场集合,背

包一放，席地而坐，朱总站到队前，亮开嗓子就讲，全场千余人，个个聚精会神地记笔记。课外活动时间，朱总还到球场和学员们一起打篮球，参加文化活动。

1938年2月下旬，日军进攻晋南，意在夺取临汾。八路军总部向太行山区挺进。2月22日，随营学校奉命西迁。部队经过延长，继续向西开进，不久住进延安文庙以东的地区。一天下午，韦国清、陈明奉命率领全校队伍来到延安杨家岭一个山坡广场上。队伍刚列队坐下，只见大家久已仰慕的毛泽东主席从窑洞门口走到队伍前，亲切接见大家。同学们起立热烈鼓掌，毛主席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

毛主席站在一张旧课桌前开始给大家讲话。他首先欢迎大家从前线归来，然后系统地讲了国际国内形势，着重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巩固和扩大，以及抗战必胜的道理。全校师生聚精会神地聆听毛主席的教诲，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毛主席站着整整讲了一个下午。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和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学校的一些干部义愤填膺，恨不得立即奔赴疆场，率部杀敌立功。因此，对学校工作不太安心。毛主席得知此情况后，立即召见随营学校的干部。他高瞻远瞩而又有针对性地讲了办好院校、培养文武双全的人才的重要意义，要求大家安心学校的教育工作。他风趣地勉励大家说：要当老母鸡，死了埋在清凉山。毛主席的教诲，使大家认识到了自己肩负的重任，都表示要安心工作，献身党的教育事业。

驻训洛川 编入抗大

全校师生在延安住了十来天后，根据中央决定，除第四学员队全部留在延安编进抗大学习外，随营学校迁驻洛川办学。韦国清等校领导人带领全校师生向南开拔，于当年3月开进了洛川。洛川是国共双方的边缘地带，具有战略地位。中央将有战斗力的随营学校

部署于洛川城北,紧接着又将炮兵团调至洛川城南,使洛川城内外的国民党驻军不敢轻举妄动。实际上随营学校担负着教学训练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南大门的双重任务。

随营学校进驻洛川后,对内改名为抗大第六大队,归抗大总校统一领导,以便吸引更多的知识青年来校学习。由于统战需要和工作的方便,对外仍叫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一直到1938年底。学校编入抗大后,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开始了有计划、有秩序的学习训练生活。学校按抗大的教学计划实施教学并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调整教学计划。

来洛川之前的7个月,学校是在没有安宁环境、没有校舍的情况下流动办学的。天当房,地当床,墙壁当黑板,膝盖当课桌。进驻洛川后,环境虽然相对稳定了,但学校仍然没有课堂和宿舍。夏天搭个棚子,上课、开会、吃饭都在里面,一棚多用。上课没有课桌就垒个土台子,教员讲课没有黑板,就在门板上写字;铅印教材没有条件,就要西安买来草纸油印教材。教职学员都住在老百姓家里。学员一班人住一间屋,只有一个土炕,不够用就把门板接起来,十几个人相挤而卧。高原缺水,从崖下几里远的水坑里取来的一点水,只能保障饮用,洗脸一班人共用一盆水。这个地方夜间有狼群出没,晚上值班站岗要点一支香才能免遭恶狼袭击。尽管生活条件艰苦,教学设备简陋,但广大教职学员都自觉地以红军长征的精神来激励自己,以苦为乐,共同搞好教学工作。

一期毕业 甘泉并校

1938年7月,随营学校第一期(即抗大第四期)学员即将毕业。由于抗大第四期第一、二大队的学员也同时毕业,抗大总校决定,随营学校毕业学员到延安和抗大第四期毕业学员一起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并统一发给抗大四期毕业证书。7月下旬,校领导带领六个队的毕业生共600多人到达延安。总校先为毕业学员们

安排了十几场报告会，由党中央负责同志和一些著名学者给大家上大课。课堂设在市中心庙内的一个广场上，有时也在东门里的广场上。

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领导同志及学者们讲完课后，毛主席讲了最后一课。他主要是向毕业学员提希望和要求。他说，大家到了工作岗位后，既要当先生又要当学生，既要当指挥员又要当战斗员，既要领导群众又要以群众为师，向群众学习。他鼓励大家要勇于实践，不要怕犯错误。错了就要纠正，改了就好了。毛主席最后说，希望同志们勇敢上战场，打了胜仗回来再见！

抗大第四期学员毕业后，8月份招来了第五期，1000多名学员来抗大六大队报了到。此时，陈明调走，黄欧东调来任大队政委，韦国清仍任大队长。9月份开始了新学员的培训。

1938年12月，抗大第六大队和驻庆阳的抗大第五大队、驻旬邑的陕北公学、驻安吴堡的青训班等单位，先后到甘泉会师，由这些单位组成抗大一分校。中央任命何长工为校长，周纯全为副校长，黄欧东为政治部主任，韦国清为训练部长。全校学员近3000人，编为五个支队，共29个队。不久，奉命开往晋东南。至此，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圆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香港沦陷前的抗战文化运动

袁 小 伦

革命文化运动,是在中国革命总路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如火如荼的香港抗战文化运动,在中国新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文化人(知识分子)问题是统一战线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兴衰。轻视知识,歧视文化人这种旧社会愚昧和落后的现象,也曾在中国共产党内有所反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的知识分子政策,造成了革命的巨大挫折。抗战爆发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纠正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强调“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指出中共只有“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革命的统一战线”^①。在香港抗战文化运动中,中共与文化人建立了具有深远意义和重要作用的和衷共济的关系。

(一)中共与文化精英汇集香港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保护中华民族文化精英的生命安全和发展抗战文化事业,几度有计划、有组织地将内地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转移到香港地区。从内地南下的文化人与原先在香港地区的文化人汇集之后,一时形成所谓“人才济济,藏龙卧虎”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18页。

的局面,于是,中共通过统战关系,把香港地区文化人最大范围地团结起来,组成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

(1)周恩来部署文化人向南疏散

抗战初期,周恩来通过上海的潘汉年等把沪、宁等沦陷区的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转移到未遭战火威胁而战略位置重要的广州。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汇集该地的文化人主要转移到香港、曲江等地。皖南事变后,周恩来主持南方局又部署大范围地疏散重庆、昆明、桂林等国统区的文化人到远东唯一的自由港——香港。

周恩来在疏散文化人过程中,对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给予极大的关怀。例如,上海沦陷后,中共中央非常关心宋庆龄的处境,特地拍去电报敦促她尽快撤离上海。在她接受中共建议后,周恩来指示潘汉年千方百计保证她的安全。最后宋庆龄在中共地下党员护送下登上了法国邮轮秘密离沪抵港。1938年2月,周恩来在汉口会见准备到香港主编《文艺阵地》的茅盾,还指示身边工作人员第二天与茅盾约定,凡在延安及华北各根据地工作的文化人和老干部所写的文艺稿件,由延安转长江局寄给茅盾发表或作为创作素材^①。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对邹韬奋的压迫到达了顶点,除封闭各地生活书店外,还派“特务在他家门徘徊”。2月份的一个晚上,周恩来在曾家岩会见邹韬奋夫妇,对他的生活书店问题和个人去向作了安排。2月25日,邹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的职务,在中共地下人员护送下离开重庆。3月5日他在桂林乘飞机到香港。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先后从内地转移到香港地区的一大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中,有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郭沫若、柳亚子、茅盾、夏衍、巴金、邹韬奋、蔡元培、阳翰笙、杜国庠、陈翰笙、章乃器、杜君慧、司徒慧敏、蔡楚生、胡绳、柳无垢、沈西苓、萨空了、许

^① 奚如:《悼茅盾同志》,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

幸之、徐铸成、任白戈、欧阳予倩、林林、戴望舒、杨刚、杨潮(羊枣)、恽逸群、刘思慕、萧红、端木蕻良、金仲华、叶灵凤、萧乾、楼适夷、施蛰存、徐迟、徐达、马国亮、靳以、叶以群、吴其敏、马思聪、费穆、严谔声、吴永刚、续叔章、周鲸文、司马文森、郁风、周钢鸣、于立群、姚潜修、叶文津、彭启一、汪馥泉、林焕平、华嘉、高汾、高灏、黄苗子、张铁生、姜君辰、范长江、戈宝权、胡风、章泯、丁聪、宋之的、千家驹、廖沫沙、张尔华、于令、于毅夫、黎澍、李凌、张友渔、韩幽桐、黄药眠、凤子、舒强、葛一虹、沙蒙、胡仲持、沈志远、张明养、贺绿汀、袁水拍、叶浅予、冯亦代、张光宇、张正宇、华君武、余所亚、张谔、胡一声、黄秋耘、李章达、任毕明、梁若尘、林语堂、李凡夫、叶君健、黄宁婴、王礼锡、李南桌、陈群葆、马国基、金山、王莹、梁漱溟、胡考、乔木(冠华)、盛舜等。

除上述文化人外，抗战爆发前已战斗在香港地区的文化人有许地山、杜埃、李育中、侣伦、刘火子、唐碧川、潘范菴、吴华胥、陈畸、任真汉、鲁少飞、卢敦、苏怡、李晨风、梁上苑、陈适怀、林霭民、黄绳、黄文俞、杨奇、李驰、叶启方、陈衡哲、陈残云、楚青、吴楚帆、白燕、龙世雄、黄新波、曾浩孺、胡春冰、杨邨人等；还有从欧美归来的戴爱莲、姚锦新等。

(2) 在统一战线旗帜下团结起来

第一，建立广泛的文化界统战阵地，与文化人建立融洽关系。日本妄图一举侵占中国，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中华民族生存问题是中国最大最重要问题。只有团结一切爱国的人士，组成全民族的抗日大军，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才能得解放。政治上、军事上如此，文化上亦复如此。所以抗日成为中国一切文化人联合结成广泛统一战线的前提和政治基础。中共正是通过各种文化界统战阵地来组织、团结文化人的。前面提到的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就是中共在香港地区领导文化界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华商报》等则是体现中共团结文化人的舆论工具；还有《文艺阵地》、《新闻通讯》、《笔谈》、《世界知识》、《中国作家》等杂志和

《大公报·文艺》等报纸副刊也都是受中共影响的文化界统一战线阵地。

为和广大文化工作者建立较融洽的关系，周恩来曾就“如何对待文化战线上的朋友”给廖承志以具体指示：“第一、不能仍拿抗战前的眼光看他们，因他们已经进步了，已经过一次考验了；第二、不能拿抗战前的态度对待他们，因他们经过一些政治生活，不是从前上海时代的生活了；第三、我们也不能拿一般党员的尺度测量他们，去要求他们，因为他们终究是做上层统战及文化工作的人，故仍留有一些文化人的习气和作风。这虽然如高尔基、鲁迅也不能免的，何况他们乎。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列宁……对待高尔基的眼光、态度和尺度，才能帮助和提拔这般文化人前进”^①。遵照这一指示精神，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和中共香港文委通过各种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广大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

第二，政治上帮助文化人进步。

中共在香港地区的有关组织通过各种座谈会、读书会、个人联络等形式，帮助文化人走在时代的前列。例如，廖承志通过从事文化联络工作的杜埃关怀茅盾。杜埃经常转达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对茅盾在生活上和政治上的帮助，茅盾非常感谢，经常说：“党很穷，自己生活上能够解决问题，就不能给组织添麻烦了。”杜埃定期把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送给茅盾，茅盾总是捧着报纸说：“有了它，就有了指路明灯。我怎能一个人就独占一份呢？”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在香港要得到一份《新华日报》确实不易，中共内部也是往往几十人轮流阅读一份报纸的^②。茅盾掌握这份报纸，有如听到中共中央的声音，真所谓如虎添翼。他正是根据《新华日报》的社论和对解

① 周恩来：《关于领导文化工作者态度致廖承志的指示》，1941年5月7日。

② 杜埃：《临归凝睇，难忘蓓蕾——悼念我国伟大的革命作家茅盾同志》，载《羊城晚报》1981年4月10日。

放区的报道,写了不少著名文艺性评论文章和介绍解放区文艺动态的报道,发表在自己主编的《文艺阵地》、《立报·言林》、《笔谈》上的。

又例如,从德国回国的乔木 1938 年来到香港,担任余汉谋主办的《时事晚报》总编辑,廖承志和连贯马上与他了得联系。廖承志等在政治上非常关心这位年轻的德国哲学博士,并于 1939 年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让乔木能将自己广博的学识紧密联系到如火如荼的斗争实际,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替他在一家书报社订购了世界重要报刊如《泰晤士报》、《纽约》、《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经济学家》、《后时代》、《亚细亚杂志》等。正是由于中共对他在政治上、工作上的关怀,他写出了大量“如同身临其境且非同凡响的国际评论文章”。

一些小有名气的文学青年,在中共负责人关怀下加入党组织。黄文俞回忆:“1938 年起,我在香港开始了写作生涯,颇有点小文化人的味道。那时开始有几个比我年轻几岁的‘文艺青年’经常同我接触,说是向我讨教,称我为‘先生’。我观察他们的言行,认定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还认定他们之所认与我接触,是听令于虞焕章的。其后,又有一位诗人每周与我约会,我认定他也是虞焕章派来的。1941 年 6 月 2 日,我被吸收入党。是日举行宣誓仪式,以监誓人身分出现的就是虞焕章。”^①

像徐迟这样的进步青年诗人则被吸收到马克思主义读书班,钻研《资本论》、《法兰西内战》、《新哲学大纲》、《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论费尔巴哈》等,以进一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徐迟回忆这是“自我革命”、“自我改造”、“第二次诞生”^②。甚至像戴望舒这样的现代派诗人,在参加夏衍、张友渔主持的文艺座谈会

① 黄文俞:《寂寞中的怀念——悼杨康华同志》,载《羊城晚报》1992 年 3 月 13 日。

② 徐迟:《江南小镇》。

之后,其诗风也有了重大改变,不同程度上接近抗战时期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和语言习惯,创作出为人民所称道的诗篇。

第三,又团结又斗争,争取更多文化人。

为了争取和团结更多文化人从事抗战文化事业并坚持正确的方向,中共香港地区有关组织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手法。1939年3月,文协香港分会成立,国民党当局想通过其在港的立法委员简又文来夺取香港文化界的领导权。但文协香港分会的核心是由革命的、进步的作家、艺术家所组成,他们自觉接受中共的领导,所以投票选举的结果,简又文仅仅当上候补理事。国民党不甘心失败,于同年9月指示简又文成立一个中国文化促进会,企图削弱文协香港分会的影响。鉴于大敌当前,且参加中国文化促进会的大都是教育、学术、艺术方面的上层人物,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指示文协香港分会对其采取团结的方针,经常联合该会举办各种宣传活动。同时,派杨刚以《大公报》副刊主编身分参加该会并担任理事,戴望舒、许地山等也在其中起积极作用。这样,中共团结和争取参加该会的岭南大学校长李应林、广州大学校长陈炳权、广东国民大学校长吴鼎新、广东教育厅长金曾澄、香港《国民日报》社长陈训畬、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国民政府中央大员叶恭绰等属于中间势力的文化界头面人物,扩大文化界统一战线。

如上所述,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香港文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被团结起来了,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组织起来了。正像郭沫若指出的那样,“无论是诗人、小说家、批评家、文艺史家、各种艺术部门、工作家及从业员,乃至大多数的新闻记者、杂志编辑、教育家、宗教家等,不分派别,不分阶层,不分新旧,都一致地团结起来,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奔走,而呼号,而报效。”^①对于抗战时期中共在香港地区和其他地区与各界文化人士所建立亲密、融洽的关系,台湾国民党当局及其学者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用一种忌恨的口吻说:

^① 郭沫若:《新文艺的使命》。

“事实上，整个抗战时期，中共一直在幕后豢养左翼文化社团与作家”，大部分文化人“难免为时代风尚所囿，或多或少受到思想感染。”^①甚至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首先是败于对于文化人的争取上面。

（二）香港新文化的光辉一页

如果说香港抗战文化舞台的主角是文化人，那么导演就是中国共产党。导演能精心构思和善于激发主角的创作热情，主角对导演意图能透彻领会和认真表演。于是，舞台上自然好戏连场了。中共和文化人休戚与共，谱写了香港新文化的光辉一页，使抗战时期的香港地区成为中国新文化的中心之一。

香港由“文化沙漠”变成“文化绿洲”，主要表现在由“富丽物质生活掩盖贫瘠的精神生活”的“商业畸型儿”变成华南地区抗战救亡运动的“文化巨人”，由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贸易自由港和与内地新文化中心上海、北平缺乏联系的“文化孤岛”变成全国性乃至具有国际意义的反法西斯文化基地。其特点则如萨空了所言，“到香港来的‘外江佬’和本地同胞……共同努力树立起来中国的新文化中心。”^②

下面从出版业和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各个文艺领域择要介绍中共领导和影响下的由各界文化人所创造的盛极一时的香港新文化。

（1）出版业

香港在七七事变前所出版的报刊中，除几份与港英当局有关的大报外，绝大部份是纯商业性报刊和谈风说月、搜奇猎艳的市井

① 苏雪林等：《抗战时期文学回忆录》，台湾文讯月刊杂志社，1978年版。

② 茅盾：《在香港编〈文艺阵地〉》，载《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立报》1938年4月2日。

报刊。出版界似乎处在与战火硝烟隔绝的世外桃源里。上海等地沦陷后,内地大批文人进入香港,编辑出版了一批传播新文化的报刊与书籍,冲决了封建文化和国粹派的堤坝,在这个被殖民主义占领的商埠,开拓新文化出版园地,栽植、浇灌出主题鲜明、色彩斑斓的新文化之花。香港出版业的飞跃性发展主要表现有:

外来文化人创办(或复办)高水平的报刊。报纸有萨空了主编的《立报》、乔木主编的《时事晚报》、任毕明主编的《大众报》、陈拉特主编的《实报》、俞颂华主编的《光明报》、夏衍、胡绳、张友渔、范长江、邹韬奋等负责的《华商报》,还有《大公报》、《申报》等。刊物有茅盾、楼适夷主编的《文艺阵地》、周鲸文主编的《时代批评》、端木蕻良主编的《时代文学》、张铁生主编的《青年知识》、乔木主编的《今日中国》、马国亮主编的《大地》、郁风主编的《耕耘》、金仲华主编的《世界知识》、茅盾主编的《笔谈》、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还有《新闻通讯》、《侨胞》、《文艺青年》、《理论与理实》等。这些报刊大都着眼于文化建设和抗战宣传,而不是为了赚钱,更无须迎合小市民的爱好;其编辑、主编、作者或是新闻出版的行家里手或是文化界出类拔萃的人物。正是在外来进步势力的影响和敦促下,香港本地人创办的报刊在质量上也比战前大有长进。

出版机构猛增。原来香港专门出版机构甚少,而到1941年秋猛增到50多家。其中主要有时论编译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妇女知识丛书社、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大地图书公司、新时代出版社、华光出版社、太平洋出版公司、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五洲书局、中华国语专门学院、齿轮编译社、民革出版社、复兴出版社、大公书局、海燕书店、奔流书店、孟厦书店、香港群社、星光出版社、新光出版社、青年协会书局等。

出版了大量进步书籍。其中有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与中国抗战》、邹韬奋《萍踪忆语》、郭沫若《文艺与宣传》、兹拉把戈洛夫等《列宁在1918》(林淡秋译)、李伯球《革命与和平》、张申府《文化·教育·哲学》、斐鲁等《十月革命与中国妇女》、宋庆龄《宋庆龄

自传及其言论》、周鲸文《中华民族在一切民族革命斗争中的领导地位》、《沦陷八年的东北》、《民主主义的斗争》、陈彬龢《希特勒侵波记》、鲁迅《高老夫子》、《祝福》、《伤逝》、柔石《为奴隶的母亲》、巴金《星》、萧红《手》、林焕平《抗战文艺评论集》、茅盾等《关于创作》、胡枫《为祖国而歌》、张天翼《跳动》、戈尔也托夫《红军侦察队》(高扬译)、吴涵真《大时代的宗教信仰》、胡愈之《中国抗战与国际形势》等。

印刷厂和书店增多。香港原来印刷水平相当低,虽说有大小印刷厂百余家,但绝大部分是印刷商品包装纸、商标、广告、日历,少数以印书、报、文件为主的厂家资本又很少。另外印刷厂字型不全,如缺“懂”字就印上“董”字代替,下面加一括号注上“加心旁”。上海、南京、广州沦陷前后,内地一批厂家迁到香港,促进了香港印刷业的发达。据1939年初统计,印刷厂多达350多家,其中铜锣湾13家,西营盘17家,湾仔68家,中环14家,油麻地48家,深水埔52家,红磡及九龙城13家,且大部分以从事书刊报印刷为主。印刷技术和管理水平也大大提高了。

香港有现代意义的书店不过是战前几年间的事情,而进步书店到七七事变前夕也仅有一间。从1938年夏秋开始,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书店业臻于空前未有的盛况,在皇后大道,荷里活道,与九龙方面的弥敦道、上海街,书店的招牌真是触目都是,简直与因抗战影响得到繁荣的小食店的营业,并驾齐驱”。“只要有机会到书店里跑一趟,便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抗战书报、杂志、画报、小册子,种种色色的,真有点令人目不暇给”^①。

(2) 文学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长达4年多的时间里,国内大部分知名文艺家都在香港留下脚印和作品。香港新文学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

^① 《香港工商时报》1939年2月11日、7月5日。

第一,创办了一批文学刊物,给香港带来新文学繁荣的基地。

茅盾的《文艺阵地》、《笔谈》、《立报·言林》,杜埃的《大众日报·文化堡垒》,载望舒、叶灵风的《星岛日报·星座》,萧乾、杨刚的《大公报·文艺》,文协香港分会的《文协周刊》,江公怀的《时代评论》、李育中、鲁衡的《南风》,邹韬奋的《大众生活》,郁风的《耕耘》,周鲸文的《时代批评》,黄宁婴的《中国诗坛》,端木蕻良的《时代文学》,夏衍等的《华商报·灯塔》,黄庆云的《新儿童》,林珈珉的《新中国月刊》等文艺刊物,除发表香港艺术家作品外,大量发表包括延安、武汉、重庆、桂林、曲江、上海“孤岛”、抗战前线的国内各地作家作品。内地作品在香港的发表,给香港带来了新文学的战斗传统,使港澳读者开始了解新文学和文学在抗战中的作用。香港新文学的活跃也影响了南洋一带的新文学创作。

《大公报·文艺》为延安文学在国统区和海外的传播立下首功。延安文学是抗战爆发后产生的崭新文学,但却不为国统区和海外所知。《大公报·文艺》在艰难、复杂的条件下,从三个方面传播了延安文学。首先,发表介绍延安文学活动的稿件,如严文井、荒煤、沙汀等关于鲁迅艺术学院、鲁艺文学院、文协延安会人活动的文章。其次,发表评论延安文学的文章,如林焕平的《评〈流寇队长〉》、楼菲《评〈文艺战线〉》(主要评述了刘白羽、梁彦、白晓光、骆方、卞之琳、柳青等人作品)、念英《评〈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主要评述卞之琳特写集)等。最后,发表了大量来自延安的作品,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有陈毅《最近的山西》、刘白羽《西北线上》、吴伯萧《踏尽了黄昏》、严文井《来去》、萧军《盘道封底早餐》、黑丁《向遥远——在吕梁山》、天蓝《雪的海》、赵岚《陕北来简》、张振亚《纪念一个追求光明热诚的孩子》、野火《陕北行》、蔺风萼《蓝田没有玉》、杨朔《忆珠江》、卞之琳《“日华亲善”》、何其芳《新的山西》、沙汀《贺龙将军》、郭小川《母子短曲》。

《文艺阵地》对香港新文学影响最大。巴人、叶圣陶、叶以群、张天翼、萧乾、姚雪垠、陈白尘、杜埃、李南桌、艾青、端木蕻良、楼适

夷、潘梓年、草明、欧阳山、沙汀、艾芜、骆宾基、杨朔、萧红、碧野、陆定一、刘白羽、丘东平、何其芳、华嘉、丁玲、黄文俞、李育中、于逢、司马文森、刘思慕、林林、邹荻帆、韩北屏、袁水拍、周而复、郑振铎、老舍、田间、陈残云、臧克家、聂绀弩、夏衍、欧阳凡海等都在该刊发表过作品。其中张天翼发表在该刊创刊号的短篇小说《华威先生》，以其特有的幽默笔法描写了一个抗战中出现的“新人物”——想包办救亡运动的国民党“抗战官”，塑造了“抗战爆发后在文艺作品中出现的第一个典型人物”。《华威先生》的发表带来了一场全国性的“标导着抗战文艺开始摆脱初期轰轰烈烈的空洞的局面而面向现实主义深入”的关于“暴露与讽刺”的问题的论争，评论界认为《华威先生》代表了一种新的抗战文学创作方向。姚雪垠在该刊第三期发表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描写一位绰号叫“差半车麦秸”（意为“不移数儿”，缺心眼不聪明）的北方农民王哑，成功地刻划了王哑憨厚、纯朴、善良、却又带落后意识习气的性格，表现这位无知受迫害的老实农民怎样变成英勇的抗日战士的。《差半车麦秸》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作品，它引起的轰动不下于《华威先生》。

第二，在香港创作和发表大量优秀作品。

被誉为“香港新文学筚路蓝缕的拓荒者”的香港大学中文学院院长许地山，先后发表了《玉官》、《铁鱼的鳃》、《桃金娘》、《萤灯》等影响广泛的小说和童话。《铁鱼的鳃》发表于1941年2月《大风》杂志上，描写年届七旬的科学家雷先生，虽然失业潦倒、生活穷困，但矢志爱国，热心兵器科学。他在家里设计和试制了一艘特殊的潜水艇模型。与流行的潜艇不同，它能像鱼一样在水里呼吸，几天不浮上水面；可以放出与流行折光镜不同的“游目”浮在水面。“游目”体积小，不易被低飞的敌机所发现，还可以通过电流传达把水面和空中的情形投影到艇里的镜版上。雷先生所在的一座南方城市正与敌人开展血战，但他的研究成果却没有受到重视。最后城市陷落，雷先生和潜艇模型都掉进大海里。小说表现作者对怀才不遇的科学家的同情，并借主人公的话针砭时弊：“现在当局底许多人是无

勇无谋，贪权好利底一流人物，不做石敬瑭献十六州，已经可以被人称为爱国了。”郁达夫在新加坡主编的《华侨周报》转载了这篇小说并加以评论：“像这样坚实细致的小说，不但在中国小说界不可多得，就是求之于1940年英国短篇小说界，也很少可以和它比并的作品。”

旅港作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茅盾。这位被称为香港新文学“辛勤的园丁”的文豪，除主办文艺报刊外，还发表了通俗长篇小说《你往哪里跑》、日记体长篇小说《腐蚀》等。《你往哪里跑》是作者反映抗战的第一部长篇，连载于1938年《立报·言林》。它着重反映了上海八一三事变从发生到终结的历史过程，再现八一三战争爆发后上海各阶层人民全力以赴支援抗战的情景，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狂轰滥炸、屠杀无辜的疯狂兽性，揭露了阻挠抗日的消极因素和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成功地塑造了资本家何耀光、青年寡妇程少奶奶、千金小姐何家琪等人物形象。小说结尾通过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到陕北去的情节，点出了只有跟共产党走，中华民族才能解放、个人也才有光明出路的主题。《腐蚀》连载于1941年《大众生活》，它以皖南事变前后的重庆为背景，锋芒直指国民党的特务统治和反共的政治路线。女主人公赵惠明，曾参加过进步学生运动，后被威逼利诱堕入特务组织。由于她并非特务系统的嫡系，受到排挤甚至玩弄，她感到矛盾痛苦又无处申诉。当她正想为摆脱这种罪恶生活而挣扎时又被派去做其过去的恋人小昭的劝降工作。小昭对她的爱、信任和规劝，革命者K、萍对小昭的营救和对她的帮助，使她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而小昭的被害致死更促使她对那毁灭一切美好事物的环境由憎恶到最后弃暗投明。作者成功地运用心理分析手法，按照现实生活和人物性格本来特点，揭示了赵惠明从堕落到逐步觉醒、自新的过程。《腐蚀》以其细腻、真切的艺术感染力和广泛的政治影响在香港、南洋、内地都引起轰动，评论界认为这是作者继《子夜》之后登上的又一高峰。

人称“浩烈之徒”的女作家杨刚，发表了长篇小说《伟大》、历史

小说《桓秀外传》、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我站在地球中央》由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 1940 年 7 月出版，这部长达 800 多行的政治讽刺诗，无论从其取材、构思、规模来看，都是新诗坛罕见之作。诗人俯视地球，昂视太空和未来，揭示中华民族从沉痛的历史经验中认清了世界本来面目的过程，热烈歌颂中华民族“千年煮不熟，万年摧不烂”的顽强精神。

女作家萧红在重病缠身的境遇中，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后花园》、《北中国》、《小城三月》和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马伯乐》。《马伯乐》捕捉战时中国日常生活的形形色色，塑造了一位自私自利、放纵而不能自力更生的庸才懦夫形象，充分表现了作者冷嘲热讽的幽默、技巧和美妙细腻的文笔。《呼兰河传》是一部弥漫着美丽童年往事及故乡思绪的小说。它构思独特，以环境即呼兰河为主轴，进行景色描写和故事叙述，这在现代小说中极为罕见。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下层百姓，如老祖父、邻居、童养媳、老光棍、佣工，但作者以非凡的艺术技巧，点铁成金，使他们个个生动活泼，性格鲜明。茅盾认为《呼兰河传》是“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有讽刺，也有幽默”。

夏衍一生唯一的中篇小说《春寒》在香港引起轰动。小说围绕着男女主人翁徐璞、吴佩兰的友谊，以及他们在广州参加救亡运动的一段曲折遭遇，揭露了 1938 年秋天，广州沦陷后，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和压制人民自由。小说保持了夏衍作品中的散文般的朴素、清新、淡雅、简练的艺术风格。

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蒿坝》、《新都花絮》、《大江》、《大时代》，骆宾基的《人与土地》、《仇恨》，刘思慕的《善跑的动物》、《樱花与梅雨》等的影响也很大。

(3) 戏剧

“当话剧运动已经像野火一样，跟着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到处燃烧起来”的时候，香港还是话剧的“不毛之地”^①。虽然到了1938年，唐槐秋从北方带领了中国旅行剧团到了那里，用包租的办法在舞台上演话剧《雷雨》，但看惯粤剧的香港观众对此不感兴趣，观众寥寥无几，致使这个曾经走南闯北有相当历史的剧团不得不宣告解散。1939年，金山带领中国救亡剧团到新加坡途经香港时，上演了《放下你的鞭子》、《台儿庄之春》，观众也不多。尽管如此，“中旅”和“中救”的来港演出，激起了一些青年对于这门新艺术的热情，他们在1940年8月文协香港分会于孔圣堂举行的鲁迅先生60诞辰纪念晚会上，演出了李景波导演的《阿Q正传》和冯亦代导演的《过客》。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内地一批戏剧工作者来到香港，加上“中旅”、“中救”一些成员组成旅港剧人协会，话剧运动在香港真正热闹起来。该团上演的第一个剧目《雾重庆》，通过一群北平爱国青年在重庆的生活，反映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丑恶，使观众对国统区现实生活有所了解。《雾重庆》由宋之的编剧和导演，司徒慧敏任舞台监督，凤子、蓝马、王莘、凌琯如、虞静子、陈健、戴浩、金乃华饰演主要角色。为争取观众，茅盾、于伶、杜国庠、柳亚子、胡绳、戈宝权、叶以群、胡考、特伟、郁风、丁聪、陆志庠等在《华商报》、《星岛日报》等发表文章和画稿进行宣传。该剧在中央电影院演出一周，在香港创造了一个剧目连演14场连续满座的记录。

接着，该团配合反法西斯宣传，利用舞台上演乌尔天编剧的、揭露希特勒纳粹迫害犹太人罪行的《希特勒的杰作》。金山、王莹、舒强、沙蒙、王莘、凌琯如、金乃华、柯刚、江韵辉、虞静子、戴浩、卫禹平参加演出，章泯任导演，司徒慧敏任舞台监督。该剧的上演盛况空前，政治上形成反法西斯大示威，文化上掀起了话剧运动的高潮。中外观众认为，演员阵容整齐，表演艺术精湛，人物形象十分生动。金山饰演马门教授，细腻准确地表现了这位老科学家的思想感

^① 司徒慧敏：《旅港剧人协会和香港话剧运动》。

情和坚强不屈的意志,达到了神形兼备的艺术效果。首场演出尚未结束,一位英国外科医生向司徒慧敏递上纸条,说:“感谢你们非常成功的演出,我看了深受感动,你们的演员的外科手术和我们当医生的一样熟练。只有一个微小的缺点,那就是外科医生作洗手消毒后,用过的手巾应该丢在地下。除此之外,我不能不信服这些演员都有一二十年当外科医生的‘经验’。”首演第二天,圣玛利医院几个英国医生在报上发表文章,指出:“看中国人演西方人,开始我们不过是凑热闹。但演出一开始,我们已经忘记在舞台演出的中国演员,除了讲中国语言外,一切化妆、动作都非常真实。”

香港沦陷前夕,他们还排练和演出曹禺的《北京人》,同样获得巨大成功。此外,在港作家创作了一批剧本,例如许地山的《女国士》、《凶手》,萧红的《民族魂鲁迅》等。

(4) 电影

上海沦陷后,一批进步电影工作者来到香港,使香港电影发生质的变化。此后,香港电影被认为是“贯注了新血液的南中国电影。”^①

七七事变前,香港曾有过《生命线》等抗日影片,但多数是低级无聊的东西。1937年底,蔡楚生、司徒慧敏、谭友六等抵港后,分析了香港粤语电影状况和它在省港和海外拥有广大观众的事实,制定了“消极方面改善粤语片的内容,积极方面摄制健全的国防片”^②的策略,筹划抗战粤语片的拍摄工作。他们争取了独立制片的新时代影片公司的合作并团结一批倾向进步的粤语电影工作者,于1938年4月制作了描写姚子青营死守宝山城故事的《血溅宝山城》(蔡楚生、司徒慧敏编剧,司徒兼导演),得到中外观众好评。接着又制作了《游击进行曲》(后改名《正气歌》)(蔡、司徒编剧,

① 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第2卷。

② 蔡楚生:《战后中国电影动态及目前的改进运动》,载《文献》1938年卷4。

司徒兼导演)。这两部影片为香港影业带新气象。

1938年底,中共成立拍摄国语片的大地影业公司。蔡楚生、司徒慧敏、谭友六、李清、容小意、卢敦、黎灼灼、吴蔚云、黎莉莉、凤子、江村参加该公司的工作,先后拍摄以上海“孤岛”爱国青年与汉奸特务生死搏斗为内容的《孤岛天堂》(蔡楚生编导,黎莉莉、李景波、蓝马主演),描写香港青年知识分子觉悟的《白云故乡》(夏衍编剧,司徒慧敏导演,卢敦、凤子、江村、黎灼灼主演)。1940年6月,由进步电影工作者组成的新生影业公司,拍摄了《保卫大四邑》(记录片)、《前程万里》(蔡楚生编导)、《最后关头》(蔡楚生编导)。

1941年初,更多的进步人士转移到香港,进一步推动南中国电影的发展。为加强对香港进步影业的指导,由连贯、于伶负责的,有李枫、邝任生、周钢鸣、罗志雄、冯一等电影工作者参加的大观电影公司两个中共支部宣告成立,并组成了以夏衍、司徒慧敏、蔡楚生、于伶、章泯、叶以群、周钢鸣等为委员的大观电影公司剧本审查委员会。“大观”先后拍摄了描写一位农民在抗战中遭遇和成长的《小老虎》(李枫编剧,罗志雄导演),表现香港穷苦人民和游击队对卖国贼和奸商斗争的《民族的吼声》(汤晓丹编导),反映难民流亡生活的《流亡之歌》(刘芳编导),均获得好评。舆论认为《小老虎》“内容很好,主题很正确,演出和技术都显出非常努力。”“其感人至深在于制作者以严肃的态度、远大的企图,面向现实”。《流亡青年》的喜剧手法处理相当流利轻快,它“打破了那些胡闹的‘颠僧’‘拖车’‘遇鬼’这类庸俗不堪,荒谬绝伦的电影,而给人以清新的、健康的大笑。”^①

在“大观”的影响下,香港各制片公司先后拍摄一批爱国影片。新中影业公司拍摄嘲笑沦陷区汉奸丑态和歌颂农民游击队的《烽火故乡》(卢敦据陈白尘《魔窟》改编并导演),南洋公司出品了揭露国难财主丑恶面目的《国难财主》,中国卡通社制作了打击侵略者

^① 《华商报》1941年4月12日、8月30日。

的动画短片《老笨狗饿肚记》。

同时，文化人创作了一批电影剧本，如蔡楚生《南海风云》、《万世流芳》，夏衍《中国五千年》、《上海屋檐下》，邝任生《千金之子》，罗志雄、李枫《小霸王》，宋之的《雾重庆》，于伶《夜上海》等。正当有关影业公司欲将这些剧本摄制成影片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5) 音乐、美术

香港的抗战音乐活动很活跃。虹虹歌咏团等团体开展各种歌咏活动。《义勇军进行曲》、《全国总动员》、《游击队之歌》、《在太行山上》、《打走日本鬼》、《黄河大合唱》、《喀秋莎》、《快乐的人们》，在香港十分流行。在半岛酒店玫瑰厅，1941年5月留德归来的女钢琴家姚锦新举行钢琴独奏会；马思聪也曾在同一地点举行小提琴独奏会，演奏包括《思乡曲》在内的《绥远组曲》。苏德战争爆发后，文协香港分会举办了为苏军将士募捐的音乐会。

抗战期间，大批美术工作者汇集香港，创作情绪非常高涨。黄新波、郁风、蔡迪支、叶浅予、张光宇、和正宇、鲁少飞、廖冰兄、丁聪、特伟、黄苗子、胡考、任千里、张镠、陆志庠等创作了不少佳作。

漫画最适合表现抗战现实生活，它以辛辣、尖锐的笔触，简练明快的形式和生动的形象向群众宣传，引起群众的共鸣。省港漫画家纷纷拿起这个犀利尖锐的武器，宣传团结抗战，揭露敌伪的残暴。由叶浅予、张光宇、丁聪、李凡夫、陈烟桥主持的全国漫画家协会香港分会，在《华商报》开辟《新美术》副刊，选编八路军、新四军浴血抗战的《团结抗战大画册》和揭露汪伪卖国投降的《如此汪精卫》的漫画册。该会还举办一次规模较大的以抗战为主题的“现代漫画展”，斯诺观看了展览后题词：“现代漫画展极值得一看，它描绘出中国各方面的斗争，它证明中国艺术阵地是中国阵线的坚强后盾。”^①

^① 黄茅：《漫画艺术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同一天，日军进攻香港。12日九龙失守，18日日军于香港北角登陆，25日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由于港九战争爆发突然，结束也快得出乎意料之外，在港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顿时陷入被日军包围、逮捕、杀害的险恶环境之中。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竭尽全力对在港的文化界人士进行了成功的营救，使他们安全返回内地，继续在抗战文化阵地坚持斗争。

伟大的反法西斯战士陶行知

周 毅

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早已闻名中外，而他对中国抗日战争及国际反法西斯斗争所作的杰出贡献，却鲜为人知。

1936年至1938年间，陶行知先生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出席世界和平大会，被推举为中国代表团主席；他又自筹经费，周游26个国家与地区，宣传共同制止法西斯侵略；他推动对日本侵略者实行经济制度裁；他促成世界名流杜威、罗曼·罗兰、甘地、罗素通电支持中国抗战；他促成美国16位学者通电声援被国民党政府拘禁的“七君子”；他是欧洲首届华人抗日盛会的组织者之一……。

一、出席世界和平大会

1936年7月11日，由邹韬奋在香港主办的《生活日报》以头条新闻刊登了《大众教育家陶行知今日出国》，文中引述了陶行知的讲话：

“我这次去英国伦敦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考察英、法、德、土耳其、苏联和美国新文化状况，宣传中国文化和救亡运动的实况，征求世界人士对太平洋集体安全的意见。

我要借这次国际会议的机会，粉碎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国际上的武断宣传，让世界公正人士明了中国的一切。

我还要做世界旅行，唤起侨胞一齐来参加救亡运动。”

就在这一天，陶行知从香港尖沙咀码头乘哥夫轮远航。他的护照是广东警察局6月发出的。

陶行知首程赴英国伦敦，8月7日他到几十公里外的切尔姆腾纳出席世界新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年会。他在有50多个国家2000多名代表参加的大会上作了题为《大众教育运动》的发言。他把中国的新教育运动与世界人类的命运紧密地连结起来。他说：“中国教育的目标是国家的解放。”“当然，强调国家的独立、自由，并不意味着狭隘的国家主义。一个独立、自由的中国，有利于世界和平。因为中国无意采用帝国主义政策。她在青年一代中设法培养这样一种精神：对中国是国家的解放；对整个世界是增进国家之间的了解。”这届年会在国际法西斯主义抬头之时举行，与会学者不论其信仰、宗教与学派如何，都莫不表达了人类需要和平、安宁，反对战争、反对毁灭文明的愿望。因此，陶行知的发言，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印度代表邀请他去讲学。尔后，印度圣雄甘地会见了陶行知，并在陶行知的演讲词《中国的大众教育运动》上加了按语，送交《民族旗帜》发表。

9月3日到7日，陶行知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他代表中国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陆瑾代表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钱俊瑞则代表国际反法西斯侵略委员会副主任宋庆龄。出席大会的还有陈铭枢、陈友仁、王礼锡、胡秋原、王庆元、徐演海、江半庵、格春满、熊式一以及在布鲁塞尔的几个华裔青年共14人。大会推举陶行知为中国代表团主席及中国执行委员。这次庄严的大会是由英国著名的和平运动倡导者锡西尔勋爵、法国众议院议长赫里欧等发起的。来自世界各国750个民族的4900名代表于9月3日晚上8时齐集在布鲁塞尔的世纪宫参加了开幕式。锡西尔勋爵宣布大会的宗旨是：“协商保障和平的实际办法”，“组织并动员民众来反对使人类同遭惨运的战争。”陶行知身穿中山装，与参加大会主席团的王礼锡、胡秋原、陈铭枢等一起端坐在主席台上，聆听各国著名社会活动家的演说；倾听大会宣读的法国文学大师罗

曼·罗兰通过电文的呼喊：“拯救和平，为时未晚，但必须加强组织，全力以赴。”陶行知心潮澎湃。中国发言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的虽然不是他，是代表团秘书王礼锡教授，但他会前联络中国各位党派、政见不同的代表，拜会各国代表团团长，以其学者的渊博、政治家的胸襟、诗人的幽默、社会活动家的气魄去卓有成效地进行组织联络工作。当时救国会内党的负责人之一的钱俊瑞说：“他起到了共产党员所不能起到的作用。”会上，陶行知与钱俊瑞等草拟了一份《告和平与中国之友书》，向世界人士提出维护东亚和平，促进太平洋集体安全的四点呼吁。经中国代表团通过，印成四国文字，向各国代表征集支持倡议的签名。9月7日，大会结束，中国代表团又公推陶行知草拟致世界和平大会主席书，以抓紧时机推进远东的和平运动。陶行知在信中写道：“国际和平会议主席：为使国际和平运动在远东更有效的发展，以及使这个运动在远东与西方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参加比京会议的中国代表诚恳地请求国际和平大会的常务会议尽速派遣代表到中国去，以资常务委员会与中国委员会有所联系。我们深信大会此举对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运动大有裨益，而为中国人民所欢迎。”

在世界和平大会之前，陶行知、钱俊瑞与陆瑾联络流亡海外的爱国志士陈铭枢等和欧洲华人，联名发出《告海外同胞书》，倡议举行全欧华侨抗日大会，为迎接这个会议，欧洲各国华人纷纷集会。世界和平大会闭幕后，9月20日，欧洲首次华人盛会终于在巴黎圣日耳曼道184号地理学会礼堂举行了！来自英、德、荷兰、瑞士和法国各地的400多名代表共聚一堂，热血沸腾。陶行知等三位救国会的成员作为国内代表出席会议。英中人民之友社代表杨格先生和夫人、法中人民之友社代表贡斯堂夫人、世界学生联合会詹姆斯等来宾发表了支持中国反对侵略的热情洋溢的讲话，陈铭枢将军发表了演说，之后陶行知在热烈的掌声中登上讲台。他陈述了救国会关于“团结御侮”的主张。他用12首通俗的大众诗歌去说明团结御侮的条件和最低要求。他以沉痛的声调诵朗：“九一八、九一八、

手执钢刀八十八，刀刀把自己杀。——我们要立即停止这自己杀自己的内战！”“伪军队，忍看山河碎；他自有本事，会杀亲姐妹！——我们要立刻停止这自相残杀的内战！”他寓深刻于俚俗之中，亦庄亦谐，震人心弦。大会开了两天，决定成立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正当大会闭幕的当天下午，传来这样的消息：日本军队指使浪人在古都北平附近的丰台纵酒行凶，引起群众的反抗，日军以此为借口，派兵占领了丰台。数百名代表，义愤填膺，当即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会名义，通电南京政府，要求誓死抵抗日军侵略。

1936年9月，是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史上光辉的一页，是中国华侨史上光辉的一页，也是陶行知生命史上光辉的一页！

世界和平大会之后，钱俊瑞先回国。陶行知和陆瑾分别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与学生联合会的委托，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分，向各国华侨及国际友人宣传抗日救国主张。1936年10月18日，他与陆瑾离开巴黎，赴伦敦，转美国，开始了环球宣传，阐述他的“世界一家，共同制止法西斯侵略”的主张。他会见的人有总统（如墨西哥总统梯乃尔）、公众领袖（如印度甘地）、社会名流（如泰戈尔、白求恩）、国会议员等等，也有专家、学者和普普通通的工人、学生；他在国外所用的几十本巴掌大的记事本里留下了数千个中外籍人士的姓名、地址，而这些人又往往代表着无以计数的群众。在这期间，陶行知以高昂的爱国热情为世界和平和社会进步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二、推进对日经济制裁运动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军队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之后，在世界和平大会号召下，各国抵制日货和对日禁运活动风起云涌。9月，陶行知路过美国德克萨斯州，见到好些地方废铁堆积如山，是运去日本的。他与美国海员工会总书记客尼弟一起去距休斯顿不远的港湾码头察看，陶行知对客尼弟说：“你看，它从太平洋搬

到日本，变成炸弹，变成子弹，结果是美国富翁黄金满堂，中国同胞血花遍地。”客尼弟表示：“我要向美国海员工人揭露这些事实，拒绝搬运输往日本战略物资。”在那段日子里，陶行知在美国各州各大学演说，都讲同一个题目：从经济上抵制日本，不给日本输血。他起草了一份抵制日货呼吁书，提出口号：“你买一块钱的日本货，就是帮日本杀中国人。”但他不以提出一般口号为满足，他联络了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胡敦元，还有林霖和林雨苓，共同组织一个“中华经济研究社”，同有关的机构和学术团体交流，掌握各国输往日本战略物资的资料。结果获得了这样惊人的数字：1937年，美国输给日本的废钢铁，占全世界输出给日本废钢铁的90.39%。日本从美国输入的军需材料，竟占54%。英国输出给日本的军需材料占17.4%。1938年2月10日，陶行知以中国执行委员的资格，出席了在英国伦敦翰温·嘉顿剧院及阿道夫剧院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执行委员会会议。12日又出席了世界援助中国抵制日货大会。这次大会有21国的1000多名代表参加，其中有35名中国人，包括中共旅居巴黎的领导人之一的吴玉章等。英国国会议员、大会主席贝克提出关于禁止战略物资去日本；实行对日海运封锁和不向日本贷款等议题，在几个专门委员会中讨论。陶行知参加了技术委员会的讨论。他列举了中华经济研究社所搜集的数据，证明对日实行经济封锁的必要，并且提出具体的实施意见：如美国监视巴拿马运河，英国监视新加坡港口，扼住出海的咽喉。他还特别强调，工人的力量正准备释放，要支持英国南安普敦码头工人拒卸日货的行动。如果重视发挥工人的力量，可以加快对日禁运的进程。大会结束，陶行知起程去爱尔兰自由邦，2月17日抵都柏林。当时只有200多万人口的爱尔兰是一个受大国长期欺负又极富于斗争精神的民族，奇怪的是它对于抵制日货一直持反对态度。在2月16日，即世界支援中国抵制日货大会结束才两天，爱尔兰又接受了日本购买废钢铁的订货单。陶行知到了爱尔兰，分头拜访有影响的社会人士，包括非安那国民党总书记西毛·大林、海员工人联

合会埃尼斯以及一些报刊的主编等。了解到他们的心态是仇恨英格兰,英格兰支持对日禁运,他们就偏不做。陶行知恳切地说明“中国与爱尔兰同是受压迫民族,你们要反抗压迫就要和别的被压迫者联合起来,互相帮助,才能成功。”爱尔兰朋友表示:“我们错了!我们立即发动抵制日货。”陶行知在英伦三岛打了一个对日经济制裁的胜仗之后,绕道荷兰、比利时,会见当地华侨,推进对日经济制裁运动,然后回到美国纽约。1938年5月4日,美国洛杉矶举行了反法西斯侵略大会,5000代表齐集会场,陶行知详细列举了中华经济研究社调查所得数字,总的数字是:美国对日本的军需材输出占日本输入总值的54.4%。陶行知大声疾呼:“这个数字说明日本在中国杀死100万人的时候,有54万人是美国的军火帮助杀死的!”此时,正当日本法西斯者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屠杀30万中国人的大血案,陶行知愤怒的呼喊震动着正义者的心灵。美国参议员司各脱激动地站起来,高举拳头说:“请记住,日本在中国杀死100万人的时候,有54万人是美国帮凶而杀死的。凡不愿做帮凶的人,请站起来。”5000人齐唰唰地站起来了!事后,美国100多家报纸刊载了这些数字,而且连《美国参议院公报》也登载了中华经济研究社的报告,美国人普遍提出一个口号:“不参加侵略!”这些数字给不参加侵略运动提供了重要依据。陶行知以政治家的胆略和学者的智慧,通过经济调查,以无情的事实,揭露了美、英政府在“中立主义”的面纱下恣意纵容侵略的本质,警醒了各国有良知的人起来为和平斗争!

三、拜会杜威,迎救“七君子”, 促进声援中国抗战

陶行知1914年赴美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是世界著名教育家杜威博士的学生。1919年,陶行知曾与同学胡适联名邀请杜威来华讲学,后来他又在实践中根据中国的国情把杜威关于“学校即社

会,教育即生活”的学说,翻了半个筋斗,成为“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使“生活教育”学说起了质的变化。陶行知此次出国宣传抗日,踏上美国国土不久,便重返母校,拜会杜威,并应邀在母校当年听课的怀特楼演讲。1936年11月21日,国内发生了救国会的领袖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史良、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等被捕的“七君子”事件,陶行知也在被通缉列。12月1日,《救国时报》披露了这一救国有罪的骇人听闻的事件,陶行知悲愤满怀,与陆瑾一起展开了营救“七君子”的活动,他写信向世界和平大会常务理事会呼吁,向各国的中国人民之友社呼吁,联络30多位华侨,联名发出《旅美华侨告海外同胞书》,随即有300多人签名响应。与此同时,陶行知多次拜访杜威,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宣布接受团结抗日要求的时候,他再次促使杜威博士伸出援助之手。终于,杜威要陶行知代拟文稿,联合16位社会名流学者,发出了致南京政府的电文,表示“我们以中国朋友的资格,同情中国联合及言论结社自由,对于上海全国各界救国会七位学者被捕的消息传到美国,闻者至感不安,同仁尤严重关切。”1937年10月5日,美国罗斯福总统发表演说,谴责侵略:“战争有如流行病,不管宣战与不宣战,它可以牵动远离战场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正在美国推进对日经济制裁运动的陶行知,抓住这一时机,再次促请杜威声援中国抗战。12月6日,杜威请他代拟电稿,向世界名流甘地、罗素、罗曼·罗兰、爱因斯坦四先生征求意见,请他们联名发出支援中国抗日,谴责日本侵略的宣言。结果,12月13日,杜威宣言发表。电文为:“由于日本肆无忌惮地摧毁东方文化,为了人类安全和平和民主,我们建议全世界人民自愿地组织起来,拒绝购买日货,拒绝出售日货,拒运战争物资去日本,停止在各方面与日本合作,不支持日本的侵略政策,尽可能支援中国自卫和救济的物资,直到日本从中国全部撤退武装力量,停止它的侵略政策为止。”这份世界名流的宣言载入了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史册。如果不是陶行知在出国日志中写下草拟杜威先生等宣言及致甘地等三人的信稿,后人还

无从知晓他为此所作的努力。

陶行知此次环球宣传抗日，五次进英，七次入美，六到法国，四访加拿大；分别三次进出德国、比利时、锡兰；二次进出埃及、印度、新加坡。到访一次的国家地区有：墨西哥、爱尔兰、瑞士、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希腊、巴勒斯坦、黎巴嫩、吉布提、爱登、安南、柔佛。这漫长的环球宣传费用，几乎全是靠他的讲学和稿费收入支付的，有时不得不做不准上甲板的四等舱客人。他唤醒海外同胞，他广交天下朋友，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不受政府派遣但正确地代表了中国民意的外交家。1938年9月2日宋庆龄女士在香港接见了陶行知，高度赞扬他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国际反法西斯运动所作的贡献！

1941年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 代表大会

袁武振 梁月兰

1941年10月26日至31日，在延安举行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是团结东方各民族人民共同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一次盛会。它把东方各民族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大会筹备会第一次会议

1941年9月29日，在延安和中国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东方各民族的代表，在延安桃林公园举行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筹备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发起、召集本大会的宣言，并决定有关组织事项。会议决定代表大会于10月下旬在延安举行；东方18个民族各选派5名代表，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妇女联合会、记者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商会、文艺界抗日救国会、华侨救国会等团体各选派1名代表，华北朝鲜青年学校、朝鲜青年联合会、中国台湾先锋队各派1名代表参加大会；欢迎民族学院、日本工农学校全体同志列席大会；聘请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发起人朱德、高岗、范文澜、吴玉章等为出席大会的代表。

9月30日，《解放日报》第3版发表发起、召集延安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的宣言。宣言揭露了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暴行，介绍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说明了召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的重要性，号召“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内东方各民族的一

切团体、组织，立即选派代表，准备提案，赶赴延安”参加大会。宣言强调：“今天，我东方各民族的紧急任务，是赶紧团结起来，集中一切力量，援助中国，援助苏联，击败日本法西斯向南向北的进攻，最后消灭一切法西斯强盗。”宣言指出：“我东方各民族的力量，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真正统一起来，还没有坚强的团结；如果没有这样的团结与统一的力量，要战胜强大的法西斯，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发起在延安召集东方各民族的代表大会，俾我东方各民族的朋友们，共聚一堂，商讨今后一切反法西斯共同事业的进行，并建立统一的组织。”^①

这次大会的发起单位是：日本人在华反战同盟延安分会、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中国台湾独立先锋社、越南革命同志会、东北救亡总会延安分会、中国回教救国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延安蒙古同学会、延安藏民同学会、延安彝民同学会、陕甘宁边区蒙古文化促进会、陕甘宁边区回族文化促进会、民族学院、边区妇联、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国际报导社、市青联、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延安分会、解放日报社、延安学联。发起人是：朱德、吴玉章、罗迈、贾拓夫、林伯渠、高岗、范文澜、萧三、冯文彬、刘春、托马斯、李涛、李初犁、马纳、叶华、徐忠义、何树声、郭戈奇、巴苏华、毕德文、阿里阿罕姆、柯庆施。

二、大会揭幕典礼

10月26日下午1时，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隆重的揭幕典礼。来自日本、犹太、印度、荷印（即荷属南洋群岛）、菲律宾、马来亚、缅甸、泰国、越南、朝鲜、台湾、蒙、回、藏、彝、苗、满、汉等18个民族的130余位代表出席大会，参加

^① 本文引文均见1941年9月30日、10月27日至11月1日《解放日报》。

会议的还有延安党政军学各界代表 1000 多人。

与会代表首先一致推选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季米特洛夫、台尔曼、爱尔科里、冈野进、甘地、尼赫鲁、戴高乐、爱因斯坦、萧伯纳、奎松、蒋介石、毛泽东、朱德、盛世才、麦克阿瑟、福莱赛、寇丁、宇素、阿木尔、达赖喇嘛、沙克都尔扎布、马鸿逵、马步芳、宋庆龄、何香凝、杨靖宇、金丸、斯坦布黑、陈嘉庚、司徒美堂等组成大会名誉主席团，推选朱德、林伯渠、吴玉章、高岗、罗迈、蔡畅、冯文彬、阿里阿罕姆、巴苏华、原清志、森健、乌兰夫、武亭、蔡前、马少长、梁金生、卜一夫、徐忠义、常阴清、郭戈奇、王占青、马寒冰、叶华、叶驼、天保、朱宝庭、柯庆施、贾拓夫、刘澜波、赵通儒、李介夫、刘春、李初犁、余光生、高克林、舒群等组成大会主席团，推定荷印职业革命家阿里阿罕姆为主席团主席、八路军敌工部副部长李初犁为大会秘书长。大会还推选出了提案审查、文电起草、章程起草 3 个委员会的名单。

主席团主席阿里阿罕姆用英语致开幕词。他指出：这次代表大会上“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讨论反法西斯，特别是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方法和策略问题……这是全人类的事情”；“组织东方反法西斯的力量，紧急援助欧洲的兄弟的斗争，这是我们的任务”；“虽然反法西斯有其严重的困难，但是我们相信在英、美、苏、华、澳、荷印的联合阵线下，定能最后摧毁日本法西斯。我们大会的责任在于讨论怎样团结统一东方各民族、各国家、各党派、各阶级、各宗教团体，成为一支无坚不摧的反日的统一力量。”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作为来宾代表讲话。他代表中国人民热烈庆贺大会召开，表示一定和东方各民族人民肩并肩、手携手，一起去打倒日本侵略军，不达目的决不停止战斗。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35 名学员在大会开幕式上宣誓参加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对他们表示热诚欢迎。他说：“八路军始终为了人类自由幸福平等而战争，八路军是人民的武装，也是为东亚各民族服务的一支军队，日本兄弟……的要求和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在共

同消灭法西斯匪徒后,中日两国人民将永久和平共居,共建人生的乐园,象一个大家庭一样亲密和友爱。”宣誓仪式后,延安有关单位举办晚会,表演了各民族歌舞,并演出话剧《佛手》。

三、各民族代表踊跃发言

10月27日至30日,为大会总报告和代表发言时间。27日下午6时,朱德受筹备会委托,作大会总报告。这个长篇报告的主题是号召东方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援助苏联、中国和其它各国,为坚决打败日本侵略者而奋斗。报告全面介绍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远东形势和日本国内形势,具体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性、贪婪性、侵略性,提出了东方各民族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法和策略。

大会总报告后,各民族代表踊跃发言。28日,日本代表森健、日本女代表原清志、朝鲜代表武亭、荷印代表毕德文(以西班牙国际纵队队员资格)先后发言。29日,大会发言的有越南代表黄振光、中国藏族代表桑吉悦喜、中国台湾代表蔡前、蒙古族代表乌兰夫、回族代表马寅、中国东北地区代表于炳然、荷印代表阿里阿罕姆。30日,又有泰国代表马纳、苗民代表沙瓦吉盖、彝民代表默罕、延安职工代表朱宝庭、犹太族代表叶华、桑柏格尔德女士及华侨代表在大会上发言。31日大会闭幕前,澳洲、印度、马来亚、缅甸、菲律宾等民族代表分别作了补充发言。他们在发言中都介绍了本民族及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情况,探讨了打倒日本法西斯的具体办法。他们一致表示:东方各民族代表一定要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坚决打死德日意这3只法西斯吃人老虎而不息战斗。

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领导人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10月2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吴玉章从数十里外赶至会场发表讲话,号召东方各民族消除民族偏见,“促成和强化东

方统一战线”。30日，中共领袖毛泽东冒雨到会讲话，代表们用力鼓掌热烈欢迎。毛泽东对代表们说：“大家的目的就是团结，促进各民族团结，共同打倒法西斯”；“现在中国就是因为是团结的，所以才能抗战……延安是专讲团结的地方”；“现在只要我们团结，把法西斯一只手一只脚的撕碎是不难的”。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有三条统一战线，一条是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条是东方的 ABCD 战线，一条是英美苏的联合行动，有这三条统一战线，法西斯一定会被打倒的。”毛泽东告诉大家：“在战争中，都有困难存在，所以同法西斯斗争还有一个困难时期，……我们这个会也是为的克服困难……我们要了解情况，克服困难，不要害怕，要有信心。革命的人民是活的，在历史上是有生命的，法西斯是会死亡的。人民大众的斗争，必须经过困难，才能走向胜利。”毛泽东最后说：“法西斯快要死了，我们人民正在青春少壮时代，今天全世界反法西斯需要实际工作，研究问题，加紧学习……甚至多种一点小米都是好的。不要夸夸其谈。法西斯是没有灵魂的，我们是有灵魂的，我们紧拉着手，团结起来，亲爱互助，那么就会把法西斯活活挤死了。我庆祝大会成功，讲平等，讲亲爱团结。”毛泽东历时 15 分钟的讲话，在全体代表起立、欢呼声中结束。

会议期间，大会收到了日本人在华反战同盟、朝鲜义勇队、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冀中区回民抗战建国联合会、八路军 3 纵队回民支队、大青山蒙古抗日游击队、东北救亡总会延安通讯处、陕甘宁边区蒙古文化促进会、八路军和新四军及华北、华中各党政民机关团体发来的贺电，充分体现了东亚及中国各族人民对这次大会的热情关注和殷切期望。

四、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宣告成立

10月31日上午10时，大会开始讨论代表提案。经过4小时紧张热烈的讨论，19个提案全部修改完毕，顺利通过。主要的提案

有5个,即(一)由代表大会产生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总部设延安,各地设分盟,以加强东方各民族之团结,而扩大反法西斯运动案;(二)号召组织东方各民族抗日义勇纵队(或称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义勇纵队),分发华北前线参加抗日工作案;(三)成立东方民族学院,以资研究东方各民族间反法西斯——日本帝国主义者诸问题,并大批栽培此类干部案;(四)应把这次大会的一切文件编译成各种民族的文字,以广宣传案;(五)用大会名义通电全世界各国,呼吁援助中国和苏联案等。

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宣告成立,是这次大会的重要成果,也是东方各民族人民团结抗战的光辉象征。经过各位代表的认真讨论,决定了联盟的简章。简章规定,成立该联盟的宗旨是:“团结东方各民族的力量,建立巩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援助中国、苏联及一切被德日意法西斯奴役压迫的民族国家,共同打倒法西斯强盗,为东方各民族的自由平等与解放而努力。”联盟总部设在中国延安,选举朱德、林伯渠、吴玉章、高岗、罗迈、蔡畅、冯文彬、阿里阿罕姆、巴苏华、原清志、森健、金茂岳、乌兰夫、武亭、蔡前、梁金生、卜一夫、常彦卿、郭戈奇、马寒冰、桑柏格尔德、马纳、桑吉悦喜、默罕、沙瓦吉盖、贾拓夫、刘澜波、萧三、余光生、李延禄、朱宝庭、高克林、刘春、李初犁、李介夫、柯庆施、赵通儒等37人组成联盟执行委员会。

大会应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岗的邀请,一致推选印度代表巴苏华为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的边区参议员。大会还通过了大会《宣言》、《告日本人民书》、《致蒋委员长、毛泽东同志并转国共两党与抗日将士及中国人民书》、《致苏联前线将士及全体人民书》、《告英、美人民书》等文件。作家萧三代表延安文艺界向大会致贺词,呼吁全世界文化界都动员起来,运用文学艺术的武器,致法西斯的丑恶灵魂于最后死命。

最后,朝鲜代表武亭致了热情洋溢的闭幕词。历时6天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充满团结战斗的气氛中,胜利地完成

了神圣的历史使命宣告闭幕。

五、“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10月26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开幕的当天，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高度评价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社论指出：这次大会的召开，“将奠定东方各民族的政治的组织的基础，将东方各民族反侵略的斗争和解放运动推上一个历史的新阶段”，“这在全世界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在这次大会上，东方18个民族的代表共聚一堂，相互通报本民族、本国家的情况，愤怒声讨德日意法西斯的侵略罪行，共同商讨打倒法西斯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东方各民族的解放和世界和平的具体办法，并组成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这充分显示了东方各民族空前广泛的伟大团结，为凝聚东方各民族人民的力量以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更大规模的侵略做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这次大会是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形势下召开的，有助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美、英三国积极商讨采取联合行动。9月30日前，16个国家组成的反法西斯国际联盟已在伦敦成立。9月29日至10月1日，苏美英莫斯科会议签订三国协定，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在这种形势下成立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不但是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且也为加强东方各民族反对日本法西斯斗争与欧美各国抗击德意法西斯侵略斗争之间的联系奠定了基础，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铺上了一块基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正式结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和亚洲的反法西斯斗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的召开及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为推动这一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次大会的召开还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战胜困难、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勇气和信心。由于日本侵略者残酷的“扫荡”和“清剿”，加上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华北地区又连续发生严重的灾害，中国解放区自 1941 年开始进入极端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发起召开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争取东方各民族人民对中国抗战和中国解放区的支持与援助。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表明东亚 11 亿人民都站在了中国人民一边，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坚强后盾，这就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加速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进程。

这次大会的召开，也进一步激发了在华日本人的反战热情。大会召开以前，有两位日本代表过度兴奋而失眠了，他们天天期望着大会开幕。几十个日本反战同盟成员为着能对大会赠送一点礼物，自愿到几十里外的荒原上收割马草，还有 3 位会议代表也参加了割草队。会议期间，曾有一个觉悟联盟成员化装成老百姓，混进日军侵占的保定城，去为大会宣传。大会闭幕后不久，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就收到来自山东支部、晋察冀支部和觉醒联盟总部及其冀南支部、冀鲁豫支部的贺电和贺信，他们热烈庆祝大会圆满成功，祝贺日本工农学校 35 名学员参加八路军，并表示要与中国人民一起并肩作战直至打败日本法西斯。在华北前线，还有很多日本反战人士争着参加战斗，在火线上高喊着反法西斯的口号。

总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虽然只开了短短 6 天，但它在中华民族抗战史及东方各民族人民团结友谊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应进行广泛的宣传和认真的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 外交活动大事记

王 真

1937年

7月7日 卢沟桥事变,全国抗战爆发。

7月8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的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7月23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宣言要求立即实行全面的对日抵抗,停止对日外交谈判,立刻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协定。

8月22日至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提出抗日的外交政策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意、日侵略阵线;联合朝鲜和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10月25日 毛泽东会见英国记者贝特兰,指出:“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

任。”

12月25日 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宣言》，其中提出要扩大国际宣传和增加国际援助。

1938年

1月 周恩来在武汉会见美国女作家、记者艾格妮斯·史沫特莱，向她详细介绍了中共抗日主张，赞扬其国际主义精神。

同月 周恩来同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会商后，经其帮助，在香港成立八路军办事处，以同海外华侨和香港中共组织联系。

2月11日 毛泽东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现在有三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还有一个是日本的统一战线，在日本有广大人民群众不赞成他们政府侵略中国，正在组织反侵略的统一战线。这三个统一战线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同日 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指出中国抗战前途是“先败后胜，转弱为强”，日本由于其国内和国际的矛盾，终必然走上完全崩溃之途。

4、5月间 周恩来领导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下属机构国际宣传委员会及国际宣传组，开展翻译出版、为国际刊物撰稿及同国外友人联络工作。

6月11日 共产国际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工作，任弼时、王稼祥等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指出中共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会议还通过一个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导人的文件。

7月2日 毛泽东与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雅德·傅路德、雷克难进行谈话，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关于边区性质、边区军队等问题。毛泽东指出，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这就是目

前中共的基本主张。

7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援助中国抗战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华民族反对日寇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博得了国际无产阶级及各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同情,号召国际各支部以及一切热诚拥护民主与和平的人,要用一切方法加紧国际援华运动。

9月29日至11月6日 中共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强调中国反侵略战争应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相配合,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

1939年

1月20日 毛泽东为英译本《论持久战》作序《抗战与外援的关系》,指出:在伟大抗战中,基本的依靠中国自力胜敌,同时也需要外援配合;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

3月2日 中共中央电贺联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指出社会主义的苏联是正在为了反抗日本法西斯强盗而进行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的中华民族的最真诚最可靠的朋友。

6月1日 毛泽东为英国援华委员会举行的“中国周”著文《中英两国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指出中国进行抗日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国家的独立与自由,为了全人类的和平和自由”。

6月10日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投降的报告。报告指出,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这种形势是由三方面因素造成的:(甲)日本诱降政策;(乙)国际的压力;(丙)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关于国际的压力,毛泽东说,英、美、法等国开始即鼓励日本进行战争,又声言援助中国,想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英、美、法策动的远东慕尼黑,现在已经接近到一个紧要时刻。

7月2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指出根据各方材料证明，英日谈判中，英国对日已有了重大的原则的让步。这种让步造成东方慕尼黑的可能的严重局势。我党必须用最大力量，推动各方共同起来，在舆论上、行动上表示全国人民对于英国张伯伦妥协派向日投降、牺牲中国利益的严重抗议，反对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

9月1日 毛泽东发表《关于国际形势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侧重回答关于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一协定是苏联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和苏联政府坚持和平政策的结果。它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投降派。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

9月14日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讲演。讲演认为，从英、法参战开始，战争进入新阶段，它成为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在战争新阶段，唯一可能的，就是苏联同所有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同所有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一道，建立反战争反侵略的统一战线。

9月28日 毛泽东为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2周年，应中苏文化协会之邀写《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文。文中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应该是抗日的外交政策，即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

9月8日 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七参议员发表《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对时局的意见》，其中外交方面的意见是：认真联合一切援助和同情我国抗战之人民和政府，力求其增加对我物质的精神上之援助；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政府牺牲中国以与日寇妥协的阴谋，坚持外交独立自主的方针；协助国民参政会、各党各派及各界群众团体，派遣各种代表团赴各国进行广大国民外交活动，以增强民主及和平力量对

我之援助。

9月 斯诺访问延安,毛泽东再度接受其采访,着重向他阐述了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的问题,以及新阶段国际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认为“在新形势下,可以参加世界革命统一战线的国家已经不再包括所谓民主国家里的资产阶级了。”从而把抗战初期试图联合的英、美等国排除在反侵略统一战线之外。

10月10日 毛泽东为党内写《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这场世界战争的性质,无论在德国或英、法方面,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战争。全世界共产党都应该坚决反对这种战争,反对社会主义民主党拥护这种战争、叛卖无产阶级的罪恶行为。

12月29日 正在苏联医治臂伤的周恩来在莫斯科撰写了《中国问题备忘录》,送交共产国际。备忘录报告了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该备忘录被译成俄文,以《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期和目前任务》为题,发表在1940年4月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上。

1940年

1月13日 毛泽东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成立题词:正义战争必然要战胜侵略战争。

2月20日 国际反侵略大会延安分会成立。

2月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组织抵抗日本的侵略斗争不论对中国人民还是对别国劳动者都有着巨大的意义,并提议共产国际各支部展开最广泛的同情和支援中国人民的运动。

3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苏芬协定的指示》,指出该协定严重打击了英、美、法的反动政策,对于中国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增加了中国抗战的力量,对于中国投降顽固派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6月26日 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目前

形势的估计》的报告,指出:法国投降与英国战败,造成了两个对立的帝国主义阵线之间的极大的不平衡状态,从英、美、法方面发动的东方慕尼黑的危险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至少可以说很大大地减少了。中国投降危险的主要来源,已由英、美、法移至日、德、意,而日本是策动中国投降的最主要的外来力量。

7月7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指出现在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中国抗战阵线中的一部分人正在发生动摇,而从国际方面袭来的阴谋,则有德、意的劝和政策代替英、美、法东方慕尼黑政策的可能。中国抗战的可靠朋友,是苏联与全世界人民。

同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指出目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三大阵线的斗争:第一个是德、意、日帝国主义阵线,第二个是英、法、美帝国主义阵线,第三个是苏联和平阵线。投降危险的来源,主要的现在已不是英、美、法的东方慕尼黑政策,而是日本的压力与德、意胜利对日本的鼓励以及可能的劝和政策。

7月17日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严重的抗议》,指出封锁滇缅路是英国政府对日寇的又一次让步,是英国政府又一次助长日寇侵略中国的举动。对英国这一举动表示严正抗议。

8月2日 中共中央致电南方局,指出目前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是德意日、英美法和苏联三个阵线的斗争,我们应把一般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与外交政策区别开来,既不要去鼓励美国的军备“迎头赶上”德意日,也不要再在英美改变对日华政策(即放弃远东慕尼黑政策)后去反对利用英美的外交。

9月5日 新加坡、爪哇、英、法、美等地归国华侨 170 余人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召开大会,决议成立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并通过简章,选举了执委。

9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指出两大对立的帝国主义阵线目前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使帝国主义战争

带有扩大、持久与准备决战的性质。英、美为了对抗日本南进，便由劝和中日的远东慕尼黑政策转到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政策。德国为了利用日本牵制英、美与利用中国市场增强德国经济，却正在准备劝和中日结束中日战争。国际形势中的可喜现象是苏联用其强大实力与正确政策贯彻了不作任何帝国主义工具与不卷入帝国主义战争漩涡的和平中立政策。

10月20日 《中宣部政策情报第六号》指出，英、美外交人员正在积极活动，企图拉拢中国参加英、美集团，国民党英、美派也正准备与英、美签订军事同盟。在此种情况下，阻止与援救国民党这一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错误方针，是我党当前的严重任务。

10月25日 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指出目前我们应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我们的对策是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向国民党及中间派及广大人民说明贝当路线与英、美路线两者的危险性，强调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

10月29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彭德怀、胡服（即刘少奇）、项英：“在七、八月间蒋介石确曾准备于重庆失守时迁都天水，准备亲苏和共与某些政策改良，至九月已动摇，至十月乃大变，这是德意日同盟与英、美对日积极化的结果。”

11月1日 德、意、日三国柏林协定签订后，周恩来分析形势指出：“蒋现在处于三个阵营争夺之中，他认为以一身暂时兼做戴高乐、贝当、基马尔最能左右逢源。故他自己躲在成都，让其夫人及英美派拉美，朱家骅、桂永清拉德，让亲日派谈和，让孙（科）、冯（玉祥）亲苏，让何（应钦）、白（崇禧）反共，以便他居中选择，并以反共为轴心来运用。”

11月2日 周恩来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谈话。潘友新认为“仅据现有材料尚难判定蒋介石已与日本妥协”，并认为“非新四军从江南撤退不能使蒋满意和停止‘剿共’战争”。周恩来将潘友新的

意见报告中共中央。

11月6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虽然我们也不应该提倡（因为它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

是年冬 苏联派以基斯林科中将为首的各兵种混合情报组来到延安，以加强东方情报工作。

1941年

1月14日 周恩来和叶剑英同苏联驻华武官崔可夫商谈。崔可夫建议皖南新四军主力“坚持北上”，江南视情况留一小部分干部和武装“埋在民间”。还说如国民党继续内战，他有权暂停援华军火于途中。

1月中旬 为使外国人士了解皖南事变真相，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周恩来组织力量准备了一批材料，动员外国记者分别带往香港、南洋和美国发表，并安排王炳南、王安娜、龚澎去访问所认识的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告知国民党袭击新四军事件。

1月底 周恩来写信给在纽约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你现在可以把你知道的情况公开发表了。”同时寄去中共重新组织新四军、继续打击日本人的文件。斯特朗据此很快撰写文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袭击新四军的罪行，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2月9日 周恩来电告毛泽东关于崔可夫转达苏联对皖南事变的意见：斯大林不愿听到国共两军冲突事；要团结抗战；武器不好不能取胜的观点不对。中共军队愈积极行动愈能发展；要继续抗战，起模范作用，并加以宣传；苏联接济的军火，中共也可向国民党要补给。

2月14日 周恩来会见本月7日抵渝的罗斯福总统代表居里,向他提供了国民党制造磨擦的材料,说明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将导致中国内战,而便于日军南进。居里表示:美国赞助中国统一,反对日本。如果中国分裂,美国将很难给予援助。

2月16日 周恩来将与居里会谈情况电告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

2月27日 周恩来在重庆会见供职于陈纳德航空队的罗伯特·华伦·巴尼特,告其国民党军队袭击新四军情况。

3月6日 周恩来电告毛泽东:居里要求中国与苏联疏远,但与中共维持关系,不要破裂到内战。居里来华任务是调查经济状况,调查政治是否民主和军事实力,要在中国建立空军基地,要求战后割让海南岛。国民党原则同意以贷款交换。

4月14日 毛泽东就《苏日中立条约》问题致电周恩来:“日苏条约使苏联彻底解除被攻威胁,对国际对中国发言权增高,使英、美利用三国同盟为反苏工具之幻想最后破产,对制止中国投降与反共危险有积极作用。”

4月16日 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认为这个条约的意义,首先在于巩固了苏联东面的和平,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发展;苏日条约没有限制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独立的正义的对日抗战;苏日声明互不侵犯满洲与外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苏日条约签订后,中国必须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

4月17日 毛泽东就《苏日中立条约》问题再电周恩来:“蒋介石历来认为苏联依赖他的抗日,他乃敢放手反共,日苏条约对蒋给了一个严重打击。”“在日苏条约订立、苏联获得自由之后,蒋投降与反共将更加困难。”

5月15日 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转告崔可夫提出的建议:速将八路军配合作战的行动计划报蒋介石;打击日军后即广为宣传,并要蒋速发饷弹等。

5月中旬 周恩来在渝先后会晤美国作家海明威夫妇和鲁斯

夫妇。他们表示美国反对反共内战，主张抗日，赞成实现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不满意国民党政府的武断和抗战无能。对中共的抗战态度和民主、经济、外交等政策表示关切。

5月16日 周恩来致电廖承志并报毛泽东：根据海明威等所谈，我们在外交上“大有活动余地”。建议在香港多选几人，“配合这种活动，活动方针须与重庆合拍”。

同日 周恩来向美国通讯社声明：外传所谓“八路军不抗日，打中央军”之说，全系日寇造谣中伤。

5月18日 《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指出目前国际形势的特点主要有三个：一是德国大胜利，二是中国发展着的抗日战争，三是苏联的和平政策。又指出，在远东、英、美正利用三国同盟内部的矛盾拆散东京柏林轴心，购买日本，再一次实行远东慕尼黑，这是一种新的危险，决不是完全不可能的神经过敏之谈。

5月31日 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社论《论时局中的暗流》。文章说目前战争局中出现一股暗流，在西方英、德妥协共同反苏，在东方则是日、美少数人企图以美国为中介来调解中日战争，日本对美的暂时缓和将是它发动武力南进的烟幕。

6月初 周恩来潘友新谈话，估计“东方慕尼黑”的危险日益增加。潘友新表示同意。

6月上旬 在周恩来领导下做国际情报工作的闫宝航，获悉法西斯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立即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迅速电告斯大林。

6月23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指出：苏德战争爆发后，“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这一决定还提出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的任务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

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6月26日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谈苏德战争爆发后的世界政局，认为苏联如获胜，英、美对日不让步，时局有可能好转。但根据目前日本国内酝酿倒阁、日军正由津浦路北调情况，如苏受东西夹击，国民党可能表面抗战，而实际对我方加紧压迫。建议对此予以极大注意。

同日 毛泽东在起草一份电文中指出：“英、美、华都站在苏联方面，现在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的对抗，其前途对苏对华有利。中国时局可能好转，我们方针是争取好转打击日寇。”

6月 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询问中共能否抽调若干旅或团摆在长城附近，牵制日军。毛泽东回电说比较困难，因为部队一集结目标即大，易遭围歼，且武器差无法进行大会战。

7月2日 毛泽东等致电彭德怀，指出日苏战争有极大可能爆发，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但此种配合是战略配合，是长期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

7月3日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估计美以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经济特权等为条件使日本不用武力南进的政策不易成功，“拖”的可能更大，压迫中国仍是主要的。

7月6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苏联战略有渐趋稳定之势，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英、美均同情苏联，国共关系有好转可能。“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是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不会错的。”又说：“对英、美主要是拉，批评可减少。”

7月1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通知，指出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和苏联保卫祖国的反德战争，是目前世界政治转变的枢纽，国际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我们的任务是全力拖住日本。如果日苏战争爆发，应配合苏联共同打击日本法西斯。

7月15日 毛泽东复电周恩来说,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还指出,7月12日缔结英苏对德作战协定将成为世界政治的枢纽,美国在政治上只能跟着这条路线走,亦将影响中国,促成中苏、国共好转。

7月19日 《中央宣传部宣传要点》对国际形势进行了分析,指出德国三个月内结束战争的闪电战略已失败,苏、英订立联合行动之协定后,国际形势对苏联有利。日本近卫内阁辞职,其以后趋向须看德苏战争结果与美国动向方能决定。

8月19日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指出罗、丘联合宣言及提议在莫斯科召集三国会议,乃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这不但是英、美、苏三国人民从法西斯威胁下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而且是全世界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同时也是我们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

8月 为扩大中共在国外影响,周恩来委托王安娜把毛泽东最重要的文章译成英文,并向她提供资料,请她定期给保卫中国同盟写报告。

9月29日 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筹备会在延安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宣言指出,东方各民族的紧急任务,是团起来,集中力量,援助中国,援助苏联,击攻日本法西斯向南向北进攻,消灭一切法西斯强盗。

10月19日 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社论《太平洋战争的新危机》。文中预言太平洋战争将要爆发,指出日本改组内阁后以武力建立“东亚共荣圈”的冒险方针是确定不移的,而挽救时局的关键是太平洋反侵略国家的共同奋斗。

同日 《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论东条内阁的动向》,指出东条内阁南进的可能性较大,并从日本与英、美矛盾,南进对日本的利益等方面分析了这种趋势。

10月26日 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开幕。参加大会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犹太、印度、印尼、菲律宾、马来亚、緬

甸、泰国、越南、朝鲜，以及中国蒙、回、藏、汉等族代表 130 余人。

10月30日 毛泽东出席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并在会上讲话，号召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指出我们现在有三条战线：一条是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条是东方的 ABCD（美、英、中、荷）阵线，一条是英、美、苏的联合行动。有这三条统一战线，法西斯一定会被打倒。

11月4日 《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美国决策的重要时机》，指出美国今天已处于东西煎迫时候了。一方面美德关系紧张，大西洋之危机益深；一方面美日关系紧张，太平洋上的新危机加速地发展着。在此严重的国际形势中，对法西斯侵略者的任何含糊、容忍、拖延以至妥协，都是罪恶。

11月17日 毛泽东发表广播讲演，指出目前全世界人类的任务是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而中国人民的任务则是团结起来反对日本的进攻，现在这两种团结都有大大加强的必要。讲演希望美国应毫不踌躇地向德国宣战，同时美国不应听信日本的阴谋，与日本订立任何妥协；美国应和中国及英国一道，以实力制裁日本法西斯，把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推向更高的阶段。

11月31日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谈英国要求同中共在琼崖合作的问题，建议：1. 对英条件要高，英是拉我，我应以同样条件对待；2. 在港设机关电台以秘密为好，因公开易受捣乱。毛泽东复电同意，嘱廖承志照办。

12月9日 中国共产党发表《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指出这一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了侵略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而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而在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则是为了保卫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指示说，英美及太平洋各国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解放战争，英美对日

的胜利就是民主与自由的胜利。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意义。中共在各种场合应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改进中国抗战状况。

12月12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通报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时局估计。电报说,在半年内,英、美均非日本之敌,英、美总的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而两方面苏联都将是决定力量。

同日 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执委会在延安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推选朱德为主席。会议决定拟用各民族语言向南洋广播,开办东方民族问题讲座等。

12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保护敌占区英美人员的指示》,指出英、美、日战争爆发,我党与英、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及对英、美外交开展之可能与必要日益增加,因此对敌占区英、美及其系统下的人士,不问其是否顽固,应多方设法欢迎并保护其到我区,或经我区退走。

1942年

1月1日 《解放日报》发表《元旦献词》,指出1941国际形势的最大变化,就是侵略与反侵略阵营的最后形成。1942年将是两大阵营空前激战的一年,中国应配合民主集团,在反侵略战争中奠定民主政治的新中国的基础。

1月4日 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宣言,共同反抗侵略,这标志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2月初 周恩来在渝应邀出席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离任赴苏任新职时举行的告别酒会,并指示《新华日报》发表《惜别卡尔大使》的社论。

5月下旬 周恩来在渝会见了随美国军事代表团来渝的埃德

加·斯诺,表示希望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去延安参观,并委托斯诺将宣传八路军、新四军作战业绩的有关资料带给居里,并附信一封。信中说中共不论在何种困难条件下都必将坚持抗战。

5月11日 共产国际联络员、苏军情报部情报员彼得·佛拉第米洛夫(化名孙平),以塔斯社记者身分来到延安,进行收集情报工作。

初夏 周恩来向三次前来拜访的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约翰·戴维斯表示中共抗日决心。戴维斯希望中共在侦察敌情方面给美国提供便利。周恩来建议美国派一个军官小组在陕西、山西建立观察站。

6月2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纪念“七七”抗战5周年的决定,指出此时正处在国际反侵略统一战线日益巩固的时候,而法西斯侵略者正日益接近失败和死亡、末路。要求在纪念“七七”时,要庆祝苏、英、美协定的签订,庆祝一切反侵略国的胜利,加强国共合作,坚持抗战到底。

7月7日 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5周年发表宣言,表示向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战友们致以民主的胜利的敬礼。宣言指出,中共拥护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宣言、苏英同盟条约及苏美协定,愿意本着这些宣言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各爱国党派协同一致,参加战后新世界与战后新中国的建设。

8月6日 周恩来致函居里,希望美国能派正式代表前往延安。

10月5日 周恩来在渝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代表威尔基。

11月20日 周恩来、林彪向美驻渝使馆范宣德、谢伟思提出要求,希望美国对国民党施加影响,改善中国政局,并将援华物资一部分拨给中共。

下半年 苏军进行斯大林格勒战役。此间斯大林两次致电毛泽东。一次要求中共抽调八路军一两个师的兵力到内蒙和外蒙边境地区,接受苏方提供的可装备一两个师的新式武器。毛泽东回电

此方案难以实现。二次来电问可否分批派出较小型游击部队到满蒙交界地区轮番接受较小批量武器,以加强抗敌力量。此方案也为毛泽东否定。

1943年

年初 斯大林来电,建议我党中央考虑调若干师团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以牵制日军。毛泽东决定把罗瑞卿、杨成武、吕正操等部调往此处,进可帮助苏联牵制日军,退可依托抗日根据地。

1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对战后形势的分析和当前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德、意、日打倒后,国际国内形势均会发生根本变化。这一形势是利于人民不利于独裁的,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

同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庆祝中美中英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决定指出:“七七”抗战的发动,全国军民的卓绝奋斗,使中国国际地位提高了,使中英美间不平等条约得到废除;中国要变成独立国家,要变成与世界列强列于平等地位与平等关系的国家,不仅有赖于对日战争的胜利,而且有赖于战后国家的建设。

2月4日 《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中国共产党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社论指出,中国共产党是认清中国所处的半殖民地地位及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第一个政党;废约成功是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废约和平等新约之订立还不是中华民族解放的彻底实现,只有彻底驱除日寇,中华民族才能真正独立解放。

3月中旬 周恩来向戴维斯再次发出希望美国代表于1942年8月访问延安的邀请。

5月22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当晚,周恩来会见外国记者,说明:(1)共产国际解散是国际七大以来的“自然发展,并非意外”;(2)中共在国际七大后“对本国问题一向

自主决定,并自己解决本身问题”;(3)中共中央将发表决定。

5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

7月4日 毛泽东致电董必武,告知蒋介石调集20余师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形势极度紧张,要董立即将上述情况向外传播,特别是要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发动制止内战运动。

7月21日 毛泽东致电董必武,指出此次反共高潮之近因,一是由于国际解散,二是由于相信日将攻苏,故蒋企图以宣传攻势动摇我党,以军事压迫逼我就范。电报要求中共中央南方局将《评〈中国之命运〉》一文,即译为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发,并搜集各方面对此文反应。

8月12日 毛泽东同周恩来致电董必武,要其在收到《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小册子后,速抄送史迪威处,及英、美、苏各使馆。

9月11日 毛泽东致函秦邦宪,请他在《解放日报》转载苏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文章,指出,这“实为我六年抗战中苏联人士第一次对于中国政府有系统的批评”,对抗战前途“庶有裨益”。

1944年

3月9日 周恩来致电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闻你们将来延安参观,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的委托,特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

5、6月间 周恩来召集延安党、政、军、民、学参加接待中外记者团的负责人和干部开会,介绍记者团的情况和参观的目的,交待

中共中央接待的方针政策。后又出席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全体干部大会，指出交际处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宣传出去，争取过来”，使他们加深对我们的了解，以利于进一步开展国内外统一战线工作。

6月9日 由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发起组织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由团长谢保樵、副团长邓友德率领，到达延安。

6月10日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在延安举行晚会，欢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叶剑英参谋长致欢迎词。他说这次记者团来延，对于促进国内团结将有很大意义，表示欢迎记者团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去参观。《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讲话，说延安之行可以帮助神圣的反法西斯工作；这个地方很久以来是被封闭着的，这次来到这里把一座关闭了很久的了的大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今后谁若再关此门，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6月12日 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参观团，对各位记者来延安表示欢迎，指出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取得胜利，也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

6月22日 叶剑英向中外记者参观团介绍中共抗战一般情况，指出自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实际成了中国的主要战场，截至1944年3月，中共军队抗击了敌伪军总数134万人中之110余万，即84%，国民党军队担负抗击的仅占16%。

6月28日 毛泽东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美军人员来延，请你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

7月4日 为庆祝美国独立168周年，朱德设宴招待在延安的美国侨民和中外记者团。

同日 周恩来出席延安各界庆祝美国独立168周年纪念大会并讲话，赞扬美国国内团结、民族团结的精神，希望到会的中外记者参观团成员把八路军、新四军关于在团结、民主基础上求得战争胜利的要求转达给国民政府。

7月14日 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参观团成员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斯坦因，回答他提出的问题。

7月18日 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参观团成员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武道，就政治科学、国共两党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交谈。

7月19日 周恩来就中外记者参观团情况电复董必武：中外记者来后，外国记者颇积极，愿意多看、多谈、多住并去前线，要求与中国记者分开行动；外国记者5人，现仍留在延安，拟9月回渝。

7月22日 驻华美军总司令部派遣的美军观察组首批成员到达延安，其中有观察组长包瑞德、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等9人。周恩来、叶剑英、杨尚昆等到机场欢迎。

同日 周恩来、叶剑英与包瑞德、谢伟思进行了会谈。

7月26日 毛泽东同谢伟思谈话，表示希望美国国务院有一位代表常驻延安，甚至在美国军事观察组可能撤走之后也驻在那里，其理由是美国在共产党地区的观察员将会证明是防止国共两党公开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

7月27日 周恩来同谢伟思谈话，就国共谈判问题、美军在太平洋的进展和美国未来对日战争以及中国大陆战场的重要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8月6日 周恩来致函王炳南，希望他多注意储备人才和同外国朋友埃德加·斯诺、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埃文斯·卡尔逊、约翰·范宣德等保持联络。

8月9日 第二批美军观察组成员9人到达延安。毛泽东、朱德、李鼎铭设宴招待全体成员，祝中美友邦增进团结和抗战胜利。

8月10日 外国记者参观团由延安动身去晋西北根据地参观。

8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对中共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国际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同外国交往的具体政

策等问题作了原则规定,指出这次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来边区访问考察是对新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国际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8月23日 毛泽东、周恩来同谢伟思谈话,指出:对于美国来说,赢得中国抗战的决定性胜利而又避免内战的唯一办法,是即支持国民党又支持共产党;中、美在战后要继续合作,两国的利益是互相关联和相似的。它们在经济和政治上交织在一起。

8月29日 毛泽东同周恩来电告董必武:8月20日美国空军第20航空队的一架重轰炸机在苏北盐城、阜宁上空爆炸起火,坠落在新四军建阳金家桥根据地内,新四军第三师和该地游击队立即出动营救。

9月7日 毛泽东电告晋西北、晋察冀:美军观察组上尉考林、中尉琼斯二人将于最近分赴晋绥边区及晋察冀边区,考察地形、建立情报网和了解爆破工作实施之范围等。

9月8日 周恩来致电董必武:根据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表示和太平洋作战任务的加深,我们有利用这次机会向史迪威、赫尔利、纳尔逊提出援助我们的必要,请董必武代表中共及军队表示欢迎赫尔利等来延安,并在适当的时候向他们提出说帖。

9月9日 毛泽东同刘少奇复电张云逸等,指出:机场筑好后,大批美军人员陆续飞来军部及各师,我们应表示欢迎;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

9月15日 毛泽东复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指出:关于美国物资分配,不管将来事实上之结果如何,我们应在原则上主张按照抗战成绩(我军打击敌伪六分之五)为标准,不应按照现有两党军队数量为标准,因此我们应主张至少两党平分援助物资,前电所说至少三分之一不恰当,请改正。

9月 周恩来起草致史迪威说帖。说帖说,中国正面战场目前溃败,完全是由于国民党实行法西斯化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造成的;与正面战场相反,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是节节胜利;坚决

要求制止内战危机，将全国力量投入抗战；中共至少应获得美国租借法案分配于中国的军火、物资的全数二分之一。

10月10日 毛泽东同谢伟思谈话，内容主要是国共关系。谢说国民党最终会邀请共产党领导人直接接受国民党政府的职位，也许是担任内阁部长。毛泽东认为这是没有用的，只能帮助国民党欺骗中国人民和外国舆论，共产党参加必须以彻底改革和政府改组为条件。

10月12日 周恩来同谢伟思谈话，评论蒋介石双十节演说，认为这是长时间以来蒋作的最反动的、最不让步的演说，因此眼前不存在国共谈判取得成果的希望。

10月17日 董必武、林伯渠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报告本日第一次同赫尔利谈话情况，说蒋允赫必要时去延安。

10月18日 董必武、林伯渠致电毛泽东，报告本日第二次同赫尔利会谈情况，说赫拟约张治中、王世杰同中共谈判，得出两党合作初步结果后，他到延安和毛泽东会谈，求得双方合作的基础。

10月24日 董必武、林伯渠致电毛泽东，报告23日同赫尔利会谈情况，说赫已告蒋，要马上行动，实行民主，释放政治犯，不能再等了。

10月29日 周恩来同戴维斯会谈，说中共进入城市后将派一些具备实践经验的人去美国学习技术，还将招聘一些外国专家和顾问，并在贸易方面需要大量在沿海航行的船只。

11月6日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了赫尔利来延安谈判问题。

11月7日 毛泽东同周恩来等到延安机场迎接赫尔利。

11月8日 上午，毛泽东同周恩来等同赫尔利进行第一次会谈。赫尔利说自己是受罗斯福委托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谈判关于中国的事情；这次来延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和批准，然后宣读了他的五点方案，并作了一些说明。

同日 下午，毛泽东等同赫尔利进行第二次会谈。毛泽东表示

欢迎赫尔利来延安,说中国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希望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能迅速改变,并对五点方案提出具体修改意见。

11月9日 毛泽东等同赫尔利进行第三次会谈。毛泽东提出修改过的协定草案,赫尔利看后表示这个草案是正确的,他将尽一切力量使蒋接受。毛泽东说 he 希望在赫尔利离开中国以前见蒋,并提出五要点在双方同意后应共同签字,公开发表。

同日 晚,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指出,同赫尔利三次会谈修改后的五点协定,没有破坏我们的解放区,却破坏了蒋介石的一党专政,如果蒋签字承认这个协定,就是他最大的让步。

11月10日 毛泽东等同赫尔利进行第四次会谈。毛泽东请赫尔利向罗斯福转达中共同赫达成的协定,说中共中央已授权他在协定上签字,告知今天尚不能与赫同去重庆,决定先派周恩来去。

同日 下午2时,赫尔利携带签字后的协定飞离延安,周恩来和包瑞德同行。

同日 毛泽东致函罗斯福,通报与赫尔利会谈情况。

同日 毛泽东致电罗斯福,祝贺他连任美国总统。

11月15日 周恩来会见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兼蒋介石参谋长魏德迈,商议成立联合政府问题。

11月16日 周恩来宴请美国新闻处驻渝广播记者福尔曼、《劳工报》记者爱泼斯坦、《纽约杂志》记者白修德。

11月18至19日 赫尔利与蒋介石会晤。蒋拒绝接受赫与中共签订的五点协定,并提出三点反建议。

11月19至20日 周恩来接待英国军官哈密士、英国驻渝使馆秘书赫戈登和赫尔利的华人副官伍汉民的来访,向其介绍解放区情况,着重谈成立联合政府的必要性。

11月20日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问是否反驳美《时代》杂志

发表的反共文章。毛泽东指示“请博古作文驳斥。”

11月21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时代》杂志谬论，可作文登《新华日报》辟之，似不必发表谈话。

同日 周恩来两次会见赫尔利。赫将蒋所提三点反建议交周恩来。周当即向赫指出，蒋一切以命令行事，中共如参加政府和军委会只是挂名，毫无实权，可见国民党无改变一党专政诚意。鉴于此，周恩来表示要立即返回延安。

同日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报告同赫尔利会谈情况。毛泽东在此电上批写：“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

11月23日 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国共两党谈判、国内形势等问题。毛泽东说：来一个协定，去一个协定，现在又来一个协定，我们坚持同赫尔利在延安签订的协定是有道理的，现在蒋介石不同意，要发动一个尖锐的批评。

11月26日 毛泽东电请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考虑可否将五条协定和蒋拒绝协定，约略透露给各党派和外国记者。

12月2日 周恩来会见赫尔利，告知毛泽东关于国共谈判问题三点建议：政府三项与延安五条距离太远；国民党态度至今未变；党中央必须召开会议讨论，请周回延安。

12月4日 赫尔利约见周恩来，劝说中共参加政府，不要先改组政府。周恩来指出，这样不过是做客，毫无实权，无济于事，政府必须改组，这是一个救中国的问题。

12月7日 周恩来同董必武、包瑞德飞返延安。

同日 周恩来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报告重庆谈判经过。

12月8日 周恩来致函赫尔利，说明不去重庆谈判的理由，并告赫将公布五条协定，但为击败共同敌人，愿同美方继续合作。

同日 毛泽东、周恩来同包瑞德和谈。毛泽东指出，蒋介石提出三点建议的首要之点是共产党军队必须服从全国军事委员会改编，这意味着把中共军队完全置于蒋介石控制之下，而交换条件是给我们一个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全国军事委员会席位，我们不能

接受。我们欢迎美国帮助我们进行军事训练,但我们不象蒋介石,并非必须要别的国家的支持。我们能够挺立着,象自由的人们一样自由地行走。

12月11日 王若飞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据包瑞德说,赫尔利得知我方将广播谈判条件而非常气愤。包认为我方不该使赫太为难,说弄决裂了,对我方不利。

12月12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王若飞,说明中共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并声明如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决不能干,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中共这样做。

12月15至17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叶剑英同美国战略情报局伯德上校就美军在山东半岛登陆后的军事合作问题进行磋商。

12月16日 周恩来函告赫尔利:国共谈判无结果是由于国民党拒绝五条协定。对五条协定草案同意暂不发表,为使人民便于督促政府,当在适当时发表。

12月21日 赫尔利复电周恩来,希望他来渝谈判,并说他相信中共建议的一般原则的成功机会将较以前任何时候光明。

12月24日 毛泽东电告赫尔利:周恩来正从事重要会议的筹备工作,难以离开延安。

12月27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同包瑞德会谈,就美方提出欧战结束后美军一空降师在山东沿海登陆时要求中共暂时提供后勤供应问题进行磋商。

12月28日 周恩来致函赫尔利,说明中共不愿在联合政府问题上抽象讨论,并向国民党提出释放政治犯,撤销对边区和华中、华南根据地的进攻,取消限制人民的各种禁令,停止特务活动等四项要求,托赫尔利转给国民党政府。

1945年

1月1日 中共中央设宴招待在延安的盟国友人并举行新年干部晚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团结一切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团结得越好,对敌人的打击也越有力量。

1月4日 周恩来草拟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等组织名义致伦敦英国职工会联合会总书记西特龙·菲利浦斯,并转英、美、苏三国职工代表会议电,要求允许以中国解放区名义派代表参加将于2月在伦敦召开的世界职工代表会议。

1月7日 赫尔利致函周恩来,告知他将陪同国民党代表宋子文、张治中、王世杰三人到延安谈判。

1月9日 毛泽东、周恩来请美军观察组代理组长克罗姆利少校转交给华盛顿信件,表示:如果罗斯福把他们看作“中国一个主要政党的领袖”而愿意接待他们,他们就决定访问华盛顿。

1月11日 毛泽东复信赫尔利,对他七日来信中提出的在延安召开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会议的提议,加以婉拒,指出这种会议不会获得什么结果,提议在重庆召开有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三方参加的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各党派应有平等地位和行动自由,如接受,周恩来可到重庆磋商。

1月20日 赫尔利致函毛泽东,说他相信国民党政府准备作出重要让步,建议再派周恩来来重庆谈判。

1月22日 毛泽东复电赫尔利,告知周恩来去重庆谈判。

1月23日 朱德经由美军艾芬士上尉向魏德迈申请2000万美元贷款,以供作战费用。

1月24日 周恩来飞抵重庆。行前声明:此次来重庆是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的步骤问题。

1月25日 周恩来同赫尔利会晤。赫提出组织所谓战时内阁，成立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各一人参加的整编委员会，整编中共军队。周恩来予以拒绝，并电告毛泽东。

1月28日 毛泽东复电周恩来：“你拒绝了赫尔利的两个补充办法是很对的。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是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

2月2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告知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正在开会，美蒋急于与我党妥协，故应加强与民主党派联合，强调非按我党所提条件办不可，否则我们不参加政府。

2月9日 周恩来会见赫尔利。赫告知王世杰关于政治咨询会议的意见。周恩来将党派会议协定草案交赫阅，表示不能同意王的意见。

2月10日 周恩来继续同宋子文、张治中、王世杰、赫尔利谈判，提议在召集党派会议前，改善环境，先实现放人等四项主张。赫提议发表共同声明，周拒绝。

2月11日 周恩来会见赫尔利。赫仍要周起草共同声明，并说将向罗斯福报告国共关系已接近。周说，如发声明，就要说明我方的要求和国共双方意见不同之点，以明真相，同时应将真相告知罗斯福。为避免赫尔利曲解，周于2月中旬写出一份声明给赫，阐明两党基本分歧。

2月13日 周恩来同赫尔利会见蒋介石。蒋称，不接受联合政府的主张，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周予以批驳。

2月14日 周恩来面告谢伟思，国共谈判又陷僵局，主要原因是国民党拒绝中共关于建立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的主张，并说在离渝前将发表声明，阐明中共立场。

2月16日 周恩来由重庆飞返延安。

2月18日 周恩来就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问题致电赫尔利，指出中国目前既无联合政府，而国民政府又完全是国民党独裁组

织，不能代表人民公意。因此，4月25日召开联合国会议决不能由国民政府派遣其代表出席。国民党代表只应占代表团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中还应有国民党民主派代表参加，此外三分之二代表应由中共及民盟派遣。赫尔利于2月20日复电周恩来，拒绝了这一提议。

3月7日 周恩来致函王世杰，告知4月旧金山会议，中共决定派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3人参加。

3月9日 周恩来将致王世杰函之内容通告已回国述职的赫尔利，要其转告罗斯福。后赫复电，要求勿作最后决定，等他来后商定。

3月27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发表我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会议代表团成员名单，其中中共代表只有董必武一人。

同日 中共中央致电王若飞，指出：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名单现已公布，为委曲求全，我们同意董老参加，但须告王世杰、邵力子，对只给中共一名代表表示不满。

4月1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会见谢伟思，指出：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寻求友好的美国支持，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共产党人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和了解，因为中国在战后建设时期需要它。美国是否与共产党人进行合作，只能由美国来决定。

4月5日 《新华日报》发表时评《我们的坚定而明确的态度——评赫尔利将军谈话》，指出：赫尔利4月2日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称美援只给国民党政府，攻击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阻碍了中国的统一，这种谈话“有助长中国分裂与内战的危险，有拖延抗战胜利的危险”。

4月12日 董必武偕秘书章汉夫、陈家康乘机离渝赴美，出席旧金山会议。

4月13日 毛泽东同朱德致电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就罗斯福总统于4月12日逝世之事，向美国人民及总统遗族表示深切吊

唁。

4月24日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论联合政府》报告，其中在外交问题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

4月25日 由苏、美、英、中四国邀请的联合国会议在旧金山开幕。中共代表董必武出席。

5月3日 毛泽东同朱德致电斯大林，祝贺苏联红军于5月2日攻克柏林。

5月8日 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5月11日 毛泽东、朱德等在延安宴请在此的苏、美、英等国朋友，庆祝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6月2日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上就中美关系指出：美国现在定下的方针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称霸东方，决不会退让。中共对美国的态度是，只要它打日本，就同它合作，要他们的最高统帅部派人来和我们谈判，订一个军事条约。美国只帮助蒋介石反共，这种政策是很危险的。

同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自赫尔利回美报告后，美国政策已决定全力扶蒋，不给我以援助，但因怕苏联参战助我，故尚不愿放弃对我关系，美国企图借此侦察我之对外关系。

6月1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美政策的指示，指出：美国政府目前的政策确是扶蒋抗日反共；我们反对内战，同时表示我们不怕内战，以压蒋之气焰，坚定同盟者对我之信心。

7月7日 中共中央发布纪念抗战8周年口号，其中提到：中国人民和东方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拥护克里米亚会议、旧金山会议的决定，加强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要求各同盟国政府

给中国人民抗战民主事业以有效援助。

7月10日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评论《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指出：蒋介石反共强硬，赫尔利撑腰起了决定性作用。赫吹捧蒋的“国民大会”，是要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从而破坏美国人民及其他盟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共处的利益。

7月12日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评论《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评论说，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明显地造成了中国内战的危机。赫尔利政策如果继续不变的话，就是与广大中国人民为敌，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以千钧重负和无穷祸害。

7月28日 周恩来根据美国战时情报处（美国新闻处）重庆分处处长菲思所提要求，起草复函，表示中共愿与美国在出版发行、邮政、无线电通讯等方面进行合作。

7月30日 毛泽东就美国大使馆劝告中共不要批评赫尔利一事致电徐冰等人，指出：美国报纸经常批评外国元首，为什么中国人不能批评赫尔利？赫尔利曾经批评中共，把中共和军阀并列，并且是当作整个党来批评的，为什么中共不能批评他？

8月9日 毛泽东、朱德致电斯大林，对苏联政府对日宣战表示热烈欢迎，并表示中国一万万解放区军队和人民，将全力配合苏军和其他盟国军队消灭日本侵略者。

8月11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指出我党目前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迫敌伪向我投降，将来阶段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外交方面，要求对美国被难人员仍应救护，对美军登陆仍应准备作双方有利的配合，对美国人民及政府中的民主分子必须表示好意，但要警惕斯科比危险。

8月15日 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发出致美、英、苏三国说帖，声明解放区、沦陷区一切抗日人民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下，有权接受被我军包围日伪军的投降，有权派自己的代表参

加同盟国接受敌国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的工作等。

8月22日 中共中央收到斯大林来电：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有被毁灭的危险。

8月28日 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由赫尔利、张治中陪同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8月2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其中指出苏联为维持远东和平与受中苏条约限制，必须将东三省交还国民党政府；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为红军坚决反对之事我必须照顾，不要使红军在外交法律上为难。

9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对美外交政策的指示》，指出我们目前对美外交极宜谨慎，方针仍是避免与美军冲突，对美国人民仍采取合作政策。

9月2日 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日本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帝国大本营在美舰密苏里号上签字投降。至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9月3日 毛泽东为《新华日报》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全面 沦陷时间考

宋 德 玲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发动了侵略战争,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军在1周内便占领了辽、吉两省的大部分地区,进而染指黑龙江。东北地区何时全面沦陷,以什么事件为标志,成为建国以来国内史学界众说纷纭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下述观点:

一、“锦州沦陷说”,以日军占领锦州为东北全面落入敌手的标志^①。

二、“哈尔滨沦陷说”,把日军侵占哈尔滨定为东北沦陷的时间^②。

三、日军在1931年内,占领了东北全境^③。

四、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就算占领了全东北^④。

笔者认为,东北全面沦陷时间应以东三省合法政府的消亡为准。日本侵略东北是由南向北推进的,黑龙江是三省中最后一个目标,因此,黑龙江陷落之日,即是东北沦陷之时,其标志是国民政府

① 高等院校试用教材《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上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7页。

② 《“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页;《“九·一八”事变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6页。

③ 《中国现代史稿(1919—194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4页。

④ 《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

黑龙江省政府的解散。下面笔者将以“九一八”事变后黑省政府经历的三个阶段为主线,对各种观点加以辨析。

第一阶段:从“九一八”事变至是年12月。该阶段的特点是:黑省政府率军抗战,力御强敌。

“九一八”事变时,黑省境内中国驻军约3万人,为防敌犯曾有所准备,但省政府涣散无力,难撑危局;而日本企图利用汉奸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叛军北犯黑龙江,组建傀儡政权,达到不直接出兵即取黑省之目的。紧急关头,10月8日,张学良特命步兵第3旅旅长、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为黑省代理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黑省副司令、军事总指挥职。得此消息,张海鹏立刻派3团兵力来犯,18日在嫩江桥南端被黑省军击溃。为阻敌过江,黑省军将江桥破坏3处^①,遂成为日军直接出兵的“借口”。

11月2日,日军集结泰来,4日发起攻击。黑省守军忍无可忍奋起还击,遂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由于敌强我弱,19日,马占山下令退出省垣,齐齐哈尔遂陷敌手。

21日,马占山率部抵克山,重新进行了军事布防。23日至海伦,即电北平及各地:“占山率同军、政两署人员移驻海伦,部队分驻克山、拜泉等地,敬待后命”^②,省府、党部委员及其他各机关重要职员先后到任。黑省政府得到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东北青年学生纷纷赴海伦从戎,组织起“学生团”;关内学生有“援马团”、“义勇队”,愿赴黑援马;肇东蒙古王公一军也听从马占山指挥;国内外的捐款纷至沓来。刹时间,海伦成为爱国民众向往之地和抗日中心。

日军占领齐齐哈尔后,即对海伦政权改用政治攻势。从11月底至12月底,日驻黑省师团长多门二郎致函劝降马占山,关东军

^① 有人指出:“江桥”系哈尔葛桥,非嫩江铁桥,在今铁桥西15步外;黑省军将江桥破坏,而非“炸毁”。见《“九·一八”事变资料汇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49—450页。

^②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83页。

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亦亲赴海伦游说,并怂恿张景惠进行诱降,致使马占山内心矛盾重重。但总的说来,这一时期马占山率领黑省将士予日军以重创,表现出中华民族绝不屈服于外敌侵略的英雄气概,为抗击日军树起了一面旗帜。

第二阶段:自1932年1月至3月。该阶段的特点是:马占山偃旗息鼓,苟且求存。

日军得手齐齐哈尔后,主力转南大举进犯锦州。沈阳失守后,张学良通电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锦州成为东北新的政治、军事中心。

自10月8日始,日军不断轰炸锦州,制造事端;而当地守军陆续撤往关内,未做殊死抵抗。1932年1月3日,锦州陷落,日军完成了对辽宁省的全部占领,获取了西侵热河、平津的最重要基地,辽宁省政府随之灭亡。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将锦州失陷作为东北全面沦陷的标志,因为吉、黑两省犹存。

吉林沦陷后,原省府委员诚允按张学良等人指示,于11月12日在宾县成立吉林省政府,与熙洽傀儡政府对峙。诚允代理省主席,节制军政;李振声代理吉林边防军副司令。为了保卫抗日政权,诚允上台伊始,改编了军队,进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扩大了省府的影响,集结了众多的爱国志士,加强了地方自卫能力。不到一个月,全省41个县中有29个县脱离熙洽而归附省政府。宾县省府对壮大爱国武装、抗击日军发挥了巨大作用。

此时海伦黑省政府,虽正值日伪诱降活动最频繁之际,但马占山尚未投降,广大爱国将士驻守着除齐齐哈尔之外的黑省绝大部分地区。

因此,锦州的失陷只能说明辽宁省全境陷落,而不是东北全面沦陷的标志。宾县吉省政府、海伦黑省政府是原中国国民政府吉林、黑龙江省政府的继续,是接受了张学良正式任命的合法政府,不是某个抗日团体或个人自发组织的政府;两省政府有自己的临时省会、军队、控制区域和地方政权,掌握着两省的大部分地区。

“锦州沦陷说”不仅片面地夸大了敌人的力量，而且事实上否认了诚允、马占山政府的合法性，是难以立足的。自然，“1931年内说”也就同样站不住脚了。

日军占领锦州后，掉头向北，欲夺哈尔滨，消灭宾县和海伦两省政府。东北军余部部分爱国官兵为保卫哈尔滨，先后与敌浴血奋战于双城堡、哈尔滨等地，终因敌强我弱，1932年2月5日哈尔滨失陷。当日晚，诚允等被迫退出宾县，到达巴彦境内。此后，诚允为促成各支抗日力量的联合，奔走于各义勇军之间。5月下旬，他入关敦请张学良出兵收复失地，未遂。吉林省政府实则随哈尔滨的失陷而夭折。

海伦马占山政权早在锦州沦陷后，便开始动摇。1月3日，张景惠在关东军的策动下，发表黑省独立宣言，自任伪省长。6日，马占山表示与张合作，张对马许诺：暂时进入省城，将来把省长职让予马。2月24日，马占山将军政两团迁入齐齐哈尔，就任伪省长，海伦黑省政府宣告灭亡。3月10日，马占山被伪“满洲国”任命为军政部总长兼黑省省长。

哈尔滨是东省特别区行政官署所在地，中东铁路的总枢纽，地位极为重要。虽然哈尔滨沦陷时，吉省政府随之夭折，海伦黑省政府行将灭亡，但也不能将此作为东北全面沦陷的标志。因为，第一，哈尔滨陷落后，哈尔滨以东的吉林省地区大部分控制在李杜、丁超、邢占清、冯占海、赵毅等人率领的抗日队伍手中，他们还在坚持对日作战。第二，马占山政府不光彩的一幕，是暂时的投降，前后仅一个多月。4月初，马占山又在黑河重建黑省政府，继续率部抗日。“锦州沦陷说”认定了锦州辽省政府的合法性，“哈尔滨沦陷说”实际上承认了宾县吉省政府、海伦黑省政府是合法政府，那么为什么对黑河黑省政府却避置不论呢？如果将哈尔滨失陷当作东北全面沦陷的标志，就等于否认了黑河黑省政权的合法地位，故此说不妥，难以成立。

第三阶段：自1932年4月至12月。该阶段的特点是：马占山

重整旗鼓，力决雌雄。

1932年4月2日，马占山反正。7日抵黑河，重建黑省军政两署，以韩树业、邹邦杰、周宝基、郎官普、李俊卿分任民政、教育、实业、财政厅长、警务处长。9日，马占山电告张学良，他已至黑河，“所有军政各机关，即时成立，照常办公”，并表示“一息尚存，誓本以身许国之初衷”^①的抗日决心。

马占山再举义旗，与张学良不无关系。3月底，张学良派原省税捐局长韩立如持函潜回齐齐哈尔，劝马占山反正，并仍许其省政府主席职。综上所述，黑河省府与海伦省府相同，“一切政务，秉承中央”^②，都是原国民政府黑省政府的继续。所不同的是，此时伪满洲国已出笼，东北主要城市基本被日军占领，斗争形势更加恶劣。马占山重举义旗，对推动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斗争，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一，黑省政府的重建，振奋人心，鼓舞士气，大大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马占山黑河通电后，各地的援马电报纷纷而至，有国民党要员、将领的，有61师、京沪和沪杭甬两路国民党特别党部及国民救国会的，还有上海各界人士的。他们表示“谊切同仇，弩为后盾”^③，“一致援助”，“互为策应”^④。上海组织起东北义勇军后援会，海内外爱国人士踊跃捐款。11月，马占山收到巴达维亚华侨捐款沪洋7万元及上海中国银行电汇洋9万余元的接济^⑤。以黑河省府为中心，掀起了新的抗日高潮。

① 马占山1932年4月9日佳电，载王鸿宾等著《马占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8页。

② 马占山1932年4月12日致国联调查团电，载王鸿宾等著《马占山》第254页。

③ “61师特别党部电慰马占山”、“沪各界电慰马占山”、“马占山将军电谢各方捐款”，分见《申报》民国21年5月20日、4月20日、11月27日。

④ 同上。

⑤ 同上。

第二,向国内外揭露日军的侵略暴行及日本制造伪满洲国之内幕,“发暴日之阴谋,正国际之视听”^①。4月12日,马占山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蒋介石、张学良、各省市党部政府、各爱国团体、各报馆和国联调查团,揭露日军“分裂我民族,割据我土地”,“藐视国际正谊惨无人道之行为”^②,通报了他“虚与委蛇”之日的行踪,记叙了日军挟持溥仪制造伪满洲国的详细过程,揭露日本混淆视听,强奸民意,“所谓共存共荣者,完全欺骗伎俩也”,所谓“东三省庆贺伪国成立之民意,均系日人伪造”^③;并抢占铁路、摧残文化,“以尽其消灭我民族之能事”^④。14日,李顿调查团收到电文,将此“作为调查重要参考”^⑤。马占山还致电溥仪,劝其俟国联调查团接见时,“据实详述”,哪怕因此牺牲,“我公英名,亦千秋万古,永为后世钦佩,较之身处樊笼因循坐误者,其得失不可以道里计”^⑥。

第三,重整军队,壮大武装,并联合友军统一行动,将抗日武装斗争推向新的高潮。因马占山一度投降,失去了部下的信任,纷纷弃之而去;但当他再举义旗,众望所归,兵力很快达到5万人左右,另有7万余人的黑龙江救国军推举他为名义总司令。4月3日,马占山与吉林自卫军取得联系,商定共同收复哈尔滨的作战计划。5月15日,他向全国发表誓师通电,并挥师南下,先后转战于呼海路、望奎、绥化、齐克路、兴安岭等地,多次重创日军。10月,马占山又联络苏炳文的东北民众救国军等各友军,会攻齐齐哈尔,但因敌强我弱而告失败。这时,日军麇集重兵,加紧了对黑省抗日武装的进攻,各支义军虽浴血苦斗,终遭挫折。12月初,马占山、苏炳文等

① 《申报》民国21年4月27日。

② 1932年4月12日致国联调查团电,载《马占山》第251—253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申报》民国21年4月16日、5月1日。

⑥ 同上。

被迫退入苏联境内。

12月13日,黑龙江省政府发布训令:“本省政府因情势关系,不能再行维持,兹由本月15日停止工作”^①。从此,黑省完全沦入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伪满洲国的统治之下,东北地区全面沦陷。

“热河沦陷说”认为,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就占领了全东北。笔者不敢说这种观点没有理由,但至少理由是不充分的,故不能苟同。

首先,从历史地理概念讲,东北系清代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辖地,1907年清政府废将军,置东三省总督摄政东北,建奉天(1929年改称辽宁)、吉林、黑龙江省,民国期间地理区划无大变化。可见,东北指的就是东三省,不包括热河省。热河清代归直隶总督统辖,1914年成立热河特别区,1928年改设省。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将热河划归东北行政区,后撤销。我们研究历史,应以当时的而非今天或其他某个时期的地理区划为标准。伪满洲国统治时期,疆域包括热河省,但我们不能以此为地理区域基准,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傀儡伪政权,其行政区域也是非法的。

其次,从传统的观念看,东北即东三省。30年代的报纸、宣言、文章中,都把东三省和热河分开来叙,东三省的陷落,即被人们视为东北的沦陷,这是符合当时的基本情况的,并非概念混淆。今人亦承认:“中国东北,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总称东三省(简称东省)”^②。

最后,从日军侵华的阶段看。自“九一八”事变至1932年12月,沈阳、吉林、齐齐哈尔三省政府被绞杀,锦州、宾县、海伦—黑河三省临时政府相继倾覆,黑河黑省政府停止工作,三省合法政府不复存在,东北主要城市和重要交通线已入敌手,标志着东北全面沦

① 《黑龙江历史大事记(1931—1945)》,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② 陈本善主编《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1页。

陷,日军的大规模军事侵略告一段落,遂将矛头转向华北。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同时还占领了长城上有战略意义的喜峰口等重要关口,完成了其侵略华北计划的第一步。因此,日军占领热河是侵略华北的开端,而非侵占东北的尾声。

救亡名曲《松花江上》的诞生与传播

宋 新 勇

一首《松花江上》的歌曲，以悲愤的韵调倾诉着三千万东北同胞的心声，激发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日御侮的激情，在西安事变之后，迅速传唱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1937年12月，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大学演讲时，高度评价说：“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伤心的人断肠。”^①

当时，北平学联油印的歌页上只署有“佚名”二字。很少有人知道歌曲的作者是谁？歌曲诞生于何时何地？有人猜想一定是东北籍的音乐家触景生情，悲愤而作。其实这首名曲创作于西安事变前夕的古城西安，歌词、歌谱的作者是西安二中教师、中共地下党员张寒晖。

张寒晖是河北省定县人。他先考入北京私立电气学校，在北京邮政总局当邮务生。受五四运动影响，后考入北京私立人艺戏剧专门学校、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深造，立志从事话剧创作与演出。1925年，他加入共青团，后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他和左明创办了第一个红色话剧团一五五剧团，提出话剧地方化和开创方言话剧的艺术主张。曾任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工人俱乐部和青年俱乐部负责人。

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家乡隐蔽。后赴北平大学艺术学校戏剧系任教一年，并加入北平“左联”，与党组织恢复联系。后任定县职业学校教导主任，积极开展党的秘密工作。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版，第89页。

1932年2月,张寒晖应邀赴西安,任陕西省第一民众教育馆总务主任。他和刘尚达创办了西安民众剧社,编导了陕西方言话剧《不识字的母亲》,组织了流动图书文库。后抱病回家乡休养。

在河北定县,他结识了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定(县)无(极)县委书记李德仲。李原籍山东黄县,祖辈为谋生闯关东,在辽宁盖平县落户。九一八事变后,李德仲离乡背井,漂泊流浪,后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德仲经常向寒晖介绍美丽富饶的东北,诉说三千万东北同胞在日本铁蹄下的悲惨生活。他们一起唱《五月的鲜花》等救亡歌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救亡之情在他们胸中激荡。李德仲对张寒晖说:“你能写能唱,首先要写我这个亡国奴嘛。战国公孙尼子说过‘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说得有些道理,这亡国之恨,亡国之痛,我是有切身体会的。”李德仲的一席话,萌发了他要创作一首歌曲,表现东北同胞对国土沦丧的悲愤心情。

1936年夏,寒晖应邀再次赴陕,在西安二中任教。在西行的火车上,他目睹众多逃难的东北同胞,倾听他们血与泪的控诉。在郑州车站,他聆听一位东北乡亲控诉哥哥和妹妹惨死在日寇刺刀和枪口下的悲惨遭遇,愤怒与救亡的情感流淌在他的心中。

当时,西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他和刘尚达创办了“西安实验剧团”,发表了《歌谣概观》。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为了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寒晖经常到西安的东北大学、新创办的东北竞存小学和东北新村从事抗日救亡宣传。他结交了一批东北流亡人士,倾听他们的控诉和叙说。一张张满是泪痕的面孔,使他一次次回忆起东北同胞凄惨的遭遇。那一年在北平。深夜。大街上。一位号啕大哭东北姑娘的凄凉、悲伤的声调使他想起家乡定县妇女哭灵时伤感的旋律。“我的娘啊……”“不!我的家啊!……”“家在哪里?”“在东北沈阳。”“不!松花江更富有魅力……”张寒晖沉浸在诗与歌、情为景、词与曲的旋律之中。

正巧南京剧专教务主任陈治策来到西安,住在二中教师院里。

为纪念二中校庆，学校课余剧团决定排演陈先生创作的三幕歌剧《鸟国》，张寒晖担任导演。此剧是顶着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写的，含义深刻。鸟国是个弱国，在鸟王的带领下，团结御敌，打败了兽国。

剧中有10多首插曲要重新谱曲，周围又没有作曲家，身为导演的张寒晖凭着爱好和积累，决心闯一下作曲关。

《鸟国》的第一支插曲是开幕后两只受伤的小鸟，从兽国逃回，彼此倾吐心中气愤：

恨！恨！恨！恨！

恨敌人太轻视咱。

污辱我同胞，任意肆摧残，

冷嘲热骂，看咱们漆黑一团。

豺狼都是野性子，

畜牲哪有心肝？！

讲什么“世界和平”？

说什么彼此相安？

砺我兵，秣我马，

大家都齐动员。

此耻不雪，此仇不报，不活天地间。

寒晖没有乐器伴奏，全凭嘴巴哼吟，迈出了正式作曲的第一步。他哼吟着，琢磨着，修改着，再哼吟着，“凑”成了歌谱。他悄悄地把扮演“鸟王”的学校事务员叫到一旁，给对方唱了一遍。“鸟王”听完高兴地跳了起来，连声叫好。就这样，寒晖踏进音乐创作的天地，用歌曲振奋爱国之心和救亡之志。

1936年11月21日，夜幕降临。在二中的大操场上聚集了3000多名观众。他们慕名而来。《鸟国》的剧情感人，插曲音调悲壮，催人奋发。预演成功，掌声震撼着古城的寂静。《鸟国》的演出成功，开创了大型歌剧创作和演出的先河。《鸟国》插曲的创作和演唱成功，给张寒晖的歌曲创作插上了翅膀、增添了勇气。

每天夜晚，当他批改完学生的作业，当人们已进入梦乡时，张

寒晖用手敲着桌子,打着音节,一句一句,一遍一遍在创作新的歌曲《松花江上》。白天上完课,他立在宿舍的窗前,眯缝着眼睛,唱一句,琢磨一句,反复哼唱,反复修改。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经历了多少次修改润色,《松花江上》歌词歌谱创作出来了。他虚心地向二中职员赵文杰、体育教师李一青、同乡孟华等人试唱,征求他们的意见,又精心修改。

1936年11月末的一天。寒晖得知有位学生骂东北学生是“亡国奴”。他上课时痛心地说:“东三省是我们祖国的大地,日本鬼子侵占了东三省,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耻辱……”他号召同学们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说:“我编了首新歌,给大家唱唱。”张寒晖第一次如泣如诉地演唱《松花江上》。泪花伴着歌声,全班同学沉浸在无比悲哀和奋起之中,恨不得拿起枪杆,上前线和日寇拼命。

诗言志,曲劲情。在东北军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孙志远和张寒晖是同乡。“双十二”事变前的一天,孙志远来到西安东城门楼上,找到张学良卫队二营学兵队的王林,说他的同乡张寒晖作了一首好歌,润了润嗓子,试唱一遍。歌声打动了他们的心灵。俩人商定在学兵队教唱。孙志远写了一个便条,让王林到西安二中要简谱。

王林请假来到北大街二中,见到戴着眼镜,穿着布大衫,和蔼微笑的张寒晖。寒晖谦逊地说:“这支歌刚编出来,还不成熟。你们边唱,边改吧!”说着,提笔,轻轻地唱着,把简谱记录下来。

回到东门城楼,王林把《松花江上》简谱交给徐瑞林。徐瑞林很快就爱上这首催人泪下的歌。他一句句地在学兵队第一连教唱,战士们是东北人,民族恨,血泪仇时刻挂在心头,因此他们学得快,唱出了悲伤、思乡之情: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

西安事变后,王林所在的学兵连改编为宣传队分赴东北军各

军、各师。于是,《松花江上》由学兵队成员传唱到东北军部队,唤起将士们的思乡和救国之情。张寒暉穿上军装,担任了东北军政治部二科游艺股股长。东北军学兵队俱乐部话剧队改名为一二·一二剧团,张寒暉任团长。他们在易俗社上演王林创作的话剧《在火山口上》,还到东北军和红军中演出。

王林还把《松花江上》的简谱悄悄地寄给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黄敬。北平学联歌咏队又从黄敬那里得到歌谱,马上组织演唱,并印成歌页散发传唱。《松花江上》立即在北平流传,并传唱到全国。崔嵬和张瑞芳在北平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时,选用《松花江上》为插曲。通过戏剧、电影插曲,这支歌家喻户晓,人人会唱,成为集会、文艺演出、抗日救亡宣传的必唱歌曲。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张寒暉随东北军辗转邠州(即彬县)、蚌埠、淮阴等地。1937年6月,一二·一二剧团被遣散,他回到西安,参与抗战宣传,和李敷仁创办了《老百姓报》。后应邀到凤翔担任东北竞存中学教导主任,党内职务是中共竞存中学特支委员兼教师支部书记。1941年到陕甘宁边区,不久任陕甘宁边区文协秘书长。在抗战八年中,他先后创作《抗日军进行曲》、《游击乐》、《老百姓抗日歌》、《竞存中学校歌》、《军民大生产》等60多首抗战歌曲和话剧、秧歌剧等。1946年3月,张寒暉因病在延安逝世,但他创作的爱国主义歌曲流传至今,经久不衰。

1964年,张寒暉创作的《松花江上》和《军民大生产》两首革命历史歌曲被选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是他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外国朋友则誉称《松花江上》为中国的思乡曲。1992年,这首名曲被选入《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如今,这首名曲不仅在国内继续传唱,而且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常常淌着眼泪演唱,他们想念祖国,以歌声表达爱国之心、民族之情,这表明《松花江上》这支当年的救亡名曲有着深厚的民族凝聚力。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五十五辑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